

人生路短话往事

——新加坡 PAP 五十年代“夺权真相”

陈贡元

于二〇〇九年十月八日完稿

人生路短话往事

目 录

感言.....	1-3 页
（一） PAP 应时而生.....	3-6 页
（二） 话说武吉的吗.....	6-15 页
（三） “亲共”、非共的实质.....	16-24 页
（四） “亲共” 和非共是历史的必然.....	24-33 页
（五） 时过淡忘的史实.....	33-41 页
（六） “夺权” 之说受关注.....	41-45 页
（七） 为团结委曲求全.....	45-49 页
（八） “奎笼” 聚会的真相.....	49-61 页
（九） 中委选举一分为二.....	61-69 页
（十） 揭开“夺权”的秘密.....	69-74 页
（十一） 8-22 狂风扫落叶.....	74-76 页
（附一） 不会遗忘的记忆	77-86 页
（附二） 怒对镇压行动.....	86-89 页
（十二） 市议会大地回春.....	90-92 页
（十三） 狱中的期待.....	92-97 页
（十四） 被驱逐出境的一幕	97-102 页

(十五) 船上黑道掀凶浪·····	102-107 页
(十六) 在中国领海议国籍·····	107-113 页
(十七) 接受锻炼 坚持马籍·····	113-119 页
(十八) 遥盼佳讯回祖国·····	119-126 页
(十九) 新中友谊现曙光·····	126-132 页
(二十) 调往北京受益多·····	132-137 页
(二十一) 在北京的日子·····	137-142 页
(二十二) 往事如云·····	142-145 页
(二十三) 小结·····	146-149 页
深藏心中的话·····	149-151 页
评李光耀·····	151-161 页
悼战友—林清祥同志逝世十周年·····	161-163 页
补充 1——回答老朋友的询问·····	163-171 页
补充 2——护李还是倒李·····	171-177 页

人生路短话往事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五十年代“夺权真相”

感言

我写《人生路短话往事》，自认是件不自量力的事，但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为说明事实，澄清误会，揭开真相，又有何惧？半个世纪以来，我浪迹天涯，萍踪他乡，既没有参考资料，又没有记录保存，要想重拾尘封已久的往事，只能择其要点，略述一二，以解历史真相。因此，这篇文章全属记忆和评述，甚缺史料记载，历次事件发生日期、报导消息、采访谈话、各界评说、政要发言，几无引用。全是自记自写，其中有些观点和见解，涉及到 PAP 内部领导思想各异的事实和李光耀秘书长的独特个性，恐会引起质疑和误会。但事过留迹，绝无虚造，记得起的事就写，认为错误的事就批，不实的事就驳，诬陷的事就揭，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我是一个不善舞文弄墨的人，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补充在 PAP 内一段非常短暂但又极其重要的“历史空白”。当年我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由于历史的需要，成了昙花一现的“政治领袖”。担任 PAP 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到副主席十八天，我自认那是完全和自己的资历不相称的。但在人民的拥护、党员的支持下，使我不得不随风而上，之后又飘然而下，也就不足为怪了。但令我一生感到最难忘的是：他像一幅彩画，一片大海。有美丽的回忆，有

苦难的遭遇，有经受社会考验的奋进人生，有在险境中看到光明前路的召唤，有历尽不同时代的转变和更新，一幕幕，永远铭刻在我脑海里。

很早以前，PAP 党刊（1954 年至 1979 年）有刊登王邦文兄（时任内政部长）的一篇不实文章，把第四届党中委选举前，中宣委及支部在裕廊“奎笼”渔棚商讨援救党陷于危机的正当活动，说成是“夺权的共产党秘密会议”。布下了阵阵疑云，使无数人信以为真，误导了整整一代人，造成了对历史的曲解。此事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着，我要把这段历史真相向在世的同代人和后辈作个说明，不要被歪曲事实的历史所蒙蔽。

前段时间，阅读了文灵兄赠送的大作《田流回忆录》。文中叙述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进步青年满怀激情的投入到反殖斗争行列，其中涉及 PAP 党内因政见分歧产生矛盾而导致“激进派夺权”的讹传，给 PAP 初期历史造成极大混乱和严重失实，让我们这一代亲历其事的人不能再长期缄默下去，任由那些毫无根据的抨击和无中生有的指责，继续混淆视听而无动于衷。我们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要求，更不会无视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而推卸我们应该承担的任何责任。我们敢问心无愧地说：我们从 PAP 成立前到 1957 年 8 月 22 日被林有福傀儡政府无理逮捕，这段极为艰难的时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党和人民无私的奉献，是对得起 PAP 从反殖斗争开始直至取得完全胜利的整个历史进程的。

我们在 PAP 成立、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中（1954 年至 1957

年)所担任的角色,就是沿着 PAP 建党纲领所提出的反殖反帝斗争和争取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和平,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理想而奋不顾身的工作。不管其间发生了多少惊涛骇浪或是内外的冲击,我们都没有退缩或背离自己的立场和离开自己的岗位。

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这个理想,从不发出任何怨言或动摇自己的意志,任何观点上的不同或政见上的分歧,都视为社会群体组织内部的正常现象。PAP 是新加坡广大人民群众寄予希望的最大政党,也不例外,自成立以来,党内不同派系的意见分歧就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无论是左派内部、右派内部,或是左中右各派之间的矛盾,都不断地在发生、调和、斗争中得到解决,而后又不断地重复出现,循环不止。我想这是所有政党、社会团体,或是群众组织普遍存在的现象和发展的必然规律。

《人生路短话往事》是针对那些将党内不同意见的内部矛盾提升为“夺权”的敌我关系而写;是针对把正常的内部争议演变为一场党内的生死之斗而写;是针对那些为亲者深感厌恶的历史谬误而写;是针对那些伪造历史的颂歌,不顾事实而写;也是为说明事实真相而写。虽然那是一段短暂的人生经历,但对于负有历史责任的人来说是不可逃避的。

(一) PAP 应时而生

1948 年 6 月 20 日英国在马来亚颁布紧急法令。五年后,即 1953

年，新加坡人民从黑暗的血腥压迫中，开始冲破殖民统治的防线。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社会上一些民间团体以不同的形式开展各种各样的带有反殖色彩的宣教活动。1954 年海港局的罢工、福利巴士车工潮和各行各业的大小罢工，互相支持，打破了工会之间的隔阂。而新加坡中学生为反“服兵役”发起全面性的联合抗议行动，把社会上各阶层不满英国统治的怒火掀起来。已在工会中初露头角的李光耀律师，在这场学生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是学生运动的辩护律师，又是后来学生会的法律顾问。他仗义执言，公开谴责英殖民政府为继续延长其在马来亚（新加坡）的统治残喘，把正在求学的青年学生送到前线去充当炮灰。李光耀的言词，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赞同、支持和热烈响应，李光耀成为这个时期的反殖代表。

至此以后，在华人社会的各个阶层，李光耀名字大震。谁都认为李光耀是敢于维护正义和对抗英统治者暴政的名律师。学生、家长、工会、群体组织，多请其当任法律顾问。李光耀乐于接受并愿为之义务奔跑。因此，李光耀得到各界的称赞。

在此同一个时期，英国以“还政予民”的美丽承诺，宣布在新加坡实施“林德宪制”的政制改良，为新加坡从自治走向独立作准备。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新加坡殖民政府统治下的原有政党和政客都发出同声赞同和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新加坡一些进步的有识之士，以李光耀律师为代表的受英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进步人士、积极分子，其中法律界、知识界、学生、工人代表，他们对“林

德宪制”的欺骗性不断地揭露，并准备采取抵制的行动。亦有主张不同的人经常走动于李光耀律师楼和到他府上进行接触，联合一些志同道合者不断地和李光耀律师共商成立一个能够代表全马来亚（新加坡）人民最高利益的政党，以取代殖民政府那些唯英国利益是从的庸碌无能的投机政党。而李光耀胸有成竹，他早已和一些在英伦求学的同道者谋寻新马争取民主独立的道路。恰是时机到来，成立新政党正是民众政治运动的诉求。通过短暂时间的筹备，1954年11月21日，广大新加坡人民所拥护的新型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宣告成立了。唯多利亞大会堂就从这一天开始确定了PAP的历史地位。闪电发出的光亮，引导着人民从反殖斗争走向胜利、走向建国、走向经济发展，不断地向适合时代的宏伟目标求进、探索和发展高科技的道路。

PAP的成立，预示着反殖斗争走向新的起点。广大民众从怨声载道和恐怖黑暗的沉默中发出震动山河的怒吼，散乱在暗角中的哀民积压在心中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地暴发出来，在苦难中挣扎求生的弱势人民势不可挡地走向街头，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反殖大军。那些长期忍辱负重的有识之士为独立、民主、自由，自发地投进这股反殖的洪流，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旗帜上写下新的标志——以宪制斗争为手段，迫使英政府交出政权。

一场独立运动的宪制斗争转移了人民群众对马共武装斗争的期待。但马共的武装斗争始终是英统治者的最大威胁，也是最有力量的冲毁英殖民者统治的基础。英国的军事行动变得更加疯狂，马共

武装斗争的反击更进入长期、艰苦、残酷的对峙状态。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人民群众只能用声势浩大的队伍开展各种形式的和平抗争行动，迫使英殖民者和他的代理人做出一步又一步的退让，最后取得内部自治再走向完全独立的道路。

发起和参与 PAP 筹备建党的可敬先辈，不少人已辞世作古，但也有不少亲历其事的人还活着。他们不会忘记，缔造和参与 PAP 活动的每一个人。在 PAP 史册上有英雄，但也有被忽视的人物，他们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一分子，他们已为党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的功绩是不容否定的。

（二）话说武吉的吗

武吉的吗是新加坡一个区域，也只是 PAP 一个地区的支部。从 PAP 整体活动来说，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不足于小题大作。

但 PAP 建党伊始，群众运动的星火遍布新加坡各个角落，武吉的吗是学生、工人和求职者最聚集的地方，燃烧起来的群众运动烈火较其它地方为猛，从党干部的组成和群众参与的活动，是 PAP 最先考虑筹建支部的对象之一。林德宪制立法议会提名竞选，PAP 派出四名党的候选人，林清祥是代表党参与武吉的吗竞选最受欢迎和最有影响力的人选，为 PAP 的反殖斗争打开新局面，也为 PAP 后来取得反殖胜利写下历史的一页。

基于这个原因，把“话说武吉的吗”作为此文的特写内容放在

前面，先为自己参与党成立时期的出处作个交待，为揭示党内问题和确证所作评述乃亲身经历的事实。

PAP 成立不久，就迈开大步走上林德宪制立法议会的竞选舞台。为了在各选区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由党中央和候选人召集所有参与党成立工作的重要骨干，开会讨论成立选区支部，以配合党竞选的各种宣传活动。我是裕廊支部、武吉的吗分部（后改为支部）的筹办人之一和主要负责人。

武吉的吗律是新加坡直向北部进入马来亚的交通要道，从市中心东陵到牛顿汽车花盘旋转处直往武吉的吗律到新柔关口全线约十六英里，过了关就是马来亚。这是新加坡通往马来亚直至泰国唯一陆路的主要交通干线。武吉的吗律一路上有几个交叉口，从三英处有往植物园、汤申律区域，六英里的荷兰律直至巴士班让，七英里的裕廊律至十八英里柔佛对岸，九英里路段起为武吉班让，十英里有往葵厝港大路口，从十一英里到新柔边站为兀兰律、杨厝港、三巴旺，直达军港。这区域的总面积占了新加坡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分布各处，居民大部分是华人，也有不少马来族和印度族，大家和睦相处，无发生种族冲突的严重事件。

武吉的吗、裕廊、武吉班让是 PAP 开展群众运动的火车头。尤其是武吉的吗，这里有着华文最高学府——华侨中学、马来亚大学和邻近的南洋女中，以及大大小小的中英文小学，在裕廊还有新办不久的南洋大学。在当时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武吉的吗、裕廊已是学子众多的集聚地，也是学生运动的急先锋。此外三地相连的

不同区域有着更优势的群众基础，那就是这里大小工业林立，橡胶厂、橡胶加工厂、爆石场、汽车修理厂、汽车厂、机械工程和铁工程厂、纺织厂、电池厂、鞋厂、由政府控制的日军留下的 BOD 大仓库综合厂、罐头厂、食品饮料厂、咖啡厂、碾米厂、酱料厂……共有产业工人数万人；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手工业、小商、小贩、店员、司机、菜农、果农、渔工、渔民、自由职业者，还有大批的无业青年，人数也不少。武吉的玛、裕廊、武吉班让这三个地方都是 PAP 作为选择建立支部的重要目标。

我从三岁开始，就一直住在武吉的玛和裕廊交界处的七英里。在这里，熟人很多，朋友不少，难兄难弟，劳苦大众，无不对我有所认识。PAP 要快速建立支部，我的好朋友——裕廊区的郑清江、陈岳英，还有参加武吉的玛区立会竞选的林清祥，在华中的同班同学谢奕田、陈世鉴等都约我一起先在裕廊协办成立支部，继之在武吉的玛建立分部。我们四处走动，联络志同道合者，把积极进步的青年发动起来，并组织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分头到工厂、乡村、学校、居民区、小商小贩集聚地进行宣传和游说。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讲马来话，凡马来人居住的地方，只好放弃。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成立了裕廊支部，与此同时武吉的玛分部也在一片欢乐的歌声中宣告成立。

林清祥是 PAP 在武吉的玛立法议员的候选人，他的出现，就像一股催枯拉朽的巨风席卷着全新加坡每一个角落。人民拥护他，爱戴他，支持他，把他当作英雄式的人物来崇拜。裕廊支部和武吉的

吗分部承担着这重要历史时刻的主要角色，所有负责人和全体干部、积极分子、工人、小贩和邻近的学生群，倾巢而出，不分昼夜地为选举工作付出精疲力尽的无私贡献，把广大群众潜在内心的火焰燃烧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殖声势，为武吉的吗立会竞选取得选票最多的一席。林清祥被视为是 PAP 的人民代表，他的身份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和猜测，英殖民者、林有福傀儡政府、马来亚东姑阿都拉曼都怀疑他是马共地下的高级领导，甚至党的亲密战友李光耀秘书长也不例外。林清祥成为全新加坡的风云人物。武吉的吗区被看作是“马共最活跃的红色区域”，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这块充满反殖活力的地方。

作为 PAP 武吉的吗支部的主要负责人，面对有人制造“红色恐怖”的危险讯号，并不觉得奇怪，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武吉的吗支部和中央的关系一直存在某些隔阂。李光耀带着有色的眼光留意着武吉的吗支部的每一项活动，但并不直接深入了解支部的实际情况，从群众运动的表面现象看，免不了被那种势不可挡的反殖大军有所吓坏，认为只有马共的声望才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因此武吉的吗支部被列入“亲共”的红名单。

武吉的吗支部为配合立会选举的需要迅速成立。组成的班子是：主席：陈贡元 副主席：陈世鉴 秘书：谢奕田 副秘书长：贝道南 财政：叶绍栢 副财政：陈延生 执委：曹素云（后改名“曹煜英”）、陈福生、陈满娘、方韶琴等。支部领导层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和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在立会的选举中全力以赴地参加

竞选群众大会，布置会场，书写标语，张挂布条，印刷和散发竞选传单。当竞选结束以后，支部进入正式的活动程序。不少有中学程度的知识青年自愿请缨，成为支部办学习班、文教、娱乐和书写板壁报的自愿军，在那段日子里，支部可说是进入火红的狂热时期。

1956年初，支部秘书谢奕田调往中央补缺中委席位。在他临走之前，他介绍朱秀兴来接替他的位置。两个月后，马绍尔率团赴英进行宪制谈判，失败后无颜续任首席部长，由第二把手林有福接任。为了讨好英伦主子，他上任一个多月，就首试屠刀镇压几位知名的群众领袖，谢奕田就在这次行动中被捕。他是 PAP 第一位被捕的中央委员，是武吉的玛支部建立的筹办人之一，并担任支部第一任秘书。

支部第二届的组织班子没有变动，只有秘书朱秀兴代替了谢奕田。谢被捕后，支部的正常活动并没有受到影响。中央和支部的关系没有什么变化。直至 1956 年秋，林有福的镇压行动变本加厉，激起了全新加坡九五工团强烈的联合抗议行动，人民群众的怒火被燃烧起来了。一场对付反殖运动、策划已久的内部阴谋终于如愿以偿，导致 1956 年 10 月 25 日晚至 28 日连续几天的大戒严，逮捕了工运中最得人心、最具威望的领袖以及学运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还有大批被无辜逮捕的活跃分子，共达二百多人。新加坡已陷入了白色恐怖的包围中。

PAP 在这次的镇压行动中几位主要中委被逮捕。他们是蒂凡那、方水双、曾超卓、林清祥（前副秘书长），他们都是工会的主

要负责人，被指与 PAP 无关。虽说 PAP 各支部没有受到大冲击，但白色恐怖的魔影赶走了支部的人群和一部分工作人员及执委，支部显得冷冷清清。武吉的呜支部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只有少数人敢冒着被捕的危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之后，形势稍微稳定，各执委才陆续回来，积极分子和群众也开始恢复原先的活动。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支部班子只有一位曹素云（曹煜英）执委未见踪影。

曹素云(曹煜英)，他是我很早认识的邻居加朋友，他住在裕廊七英里半的大路口，一间破陋不堪的木板屋，背后是大片黄梨山，前面是南顺厂。他读书不多，家里很穷，木工出身，有很好的木工手艺，支部的木凳、桌子、黑木板都是在他带领下自己动手做的。他在政府控制的 BOD 综合厂里当木工技工，工资微薄，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包括母亲在内）的生活。我和几位老朋友非常了解他，关心他。他和我们这些单身未婚人不同，他已有家室和两个孩子，还有高龄的母亲，他要担负全家生活的重担。如果他落在英国人的手里，他就有家毁人困的危险了。对于他不再涉及支部的活动，我们是非常理解的。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是我的老朋友，又是出身贫困，是受压迫和被剥削的最底层，是天然的反抗者，没有理由也不相信他会从此缩步。

为能使他复出继续担任支部执委的工作，我、朱秀兴、叶绍栢和几位好朋友多次亲访、慰问和关心他，答应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大家会各尽所能地帮助他。他心里明白，朋友的热心、诚恳是非常真

挚和可贵的，但他对家庭的责任心，对自己有可能随时被捕的危险感到很害怕。他坦言告诉我们，他有家庭，有后顾之忧，不是单身汉，不能像我们那样冒被捕危险……在我们力劝之下，他勉强接受有时间到支部走走，待时机好转之后再回支部。谈不成事，我们只好尊重他的决定。

1957年3月，李光耀代表 PAP 第二次参加宪制谈判代表团，赴英伦取得半独立的自治权，引发出新加坡政局的极大波动。各方政客和左翼队伍中的某些人想乘机搞垮李光耀和削弱 PAP 的领导力量，不断离间李光耀和我们的关系。武吉的呜支部早已看出端倪，先巩固和加强支部内部的领导核心，以适应新宪制内容规定的自治政府议会选举。组织班子由原来的十一人增加到十三人。其中增加了一名副主席田英，代替空缺的陈世鉴，还有另外两名执委，他们是陈文蛟、陈英杰，曹素云继续保留支部执委的职位。

1957年8月，我作为 PAP 第四届中委会成员，与朱秀兴秘书、田英副主席担负起支部的领导工作。8月22日，我和朱秀兴一起被捕，支部以后的情况一无所知。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接到支部几位执委寄来的信，他们都说起改名为曹煜英即曹素云的为人，及他如何说谎和用不择手段骗取党中央组织秘书王邦文的信任，进而成为武吉的呜区的立法议员。从信上看，曹煜英已不是往日的穷木工，也不怕会被捕，更不忧家庭的生活。在他面前，已经有了 PAP 掌权人的保护，随时向不明支部情况的李光耀总理吹嘘讨好，就可走向光明大道，步步高升，无所畏惧。

1971年，我已移居香港。不久，曹煜英和他的太太到九龙观塘我住的仅有四十平方米的小楼房看我。我报以热情的招待，久别重逢的老友应有长叙情谊的无限感慨，但我们只寒暄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有疑云纷尘的闷气。他此来的目的，并无私人感情成份，只为公务。我租了一部的士到沙田吃海鲜，他问我有什么打算，可代我向李光耀总理反映。我揣测他的来意，直接了当说出四句话：第一，转告我对李光耀总理的问候；第二，向 PAP 全党的老朋友问好；第三，继续保留我 PAP 的党籍；第四，我希望无条件回新加坡。他回答我，会尽一切可能去促成这项工作。晚上，他还约我到太平山顶旋转餐厅赏景。当我到达餐厅时，意想不到见到黄循文次长和他多名的随员，包括几位政治部人员，走来和我热烈握手，亲切有加，客套有异，事不平常。我想，这是 PAP 政府对我在香港居住和生活的“重视”和“关注”。

一个月后，我接到曹煜英的一封信，他告诉我，李光耀对我要求无条件回新加坡的事不置可否，只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1980年初，友人寄给我一本 PAP 二十五周年纪念党刊，内有一篇由时任国家发展部曹煜英次长署名的万字长文《党早期活动的回顾》，并附有一张小字条，写着“可耻谎言”四个字。我急于知道其内容，一口气把它看完。文章段落凌乱不堪，内容荒唐透顶。我怀疑这篇文章是出于曹煜英的口，不是出于他的手。他是在编造故事，而不是讲事实。他把光荣的武吉的玛支部备受关注的生气蓬勃、火热朝天的早期活动变成虚构的谎言故事，通篇文章没有一句真

话。就如中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为打倒那些捍卫真理的领导人一样，编造假历史、假材料、假故事、无中生有，极尽污蔑、中伤之能事。还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和勇于捍卫党利益的忠臣。这篇文章只能作为历史谎言的可耻见证！

有一次，我回新加坡探望母亲和朋友。清祥兄约我一起吃饭，谈及武吉的吗支部早期活动的一些概况，免不了说到曹煜英的为人。他不知道曹煜英原名曹素云，他问我对此人是否认识，我告诉他，不仅认识，还是老朋友，老邻居。我问他，在他写的文章里，有一段提到社阵秘书长亲自找他谈条件，要用二十万元收买他弃政从商，是否有这回事？他笑着反问我，你看我是否有这么多钱，他是不是那么值钱，那么重要？说完，我们相对而笑，另转话题了。

武吉的吗支部是 PAP 的重点支部，十一名支部执委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没有个人利益，没有得失矛盾，更没野心和权力之争，只有共同的敌人——英殖民者和他的代理人。每天数以百计的穷人来到支部学习或是接受反殖斗争的宣传。我们的出发点是组织和壮大 PAP 的群众力量，为 PAP 的和平宪制斗争作好准备，为取得全面胜利打好基础。我们的工作，除了冒被敌人逮捕的危险之外，并没有任何好处，经常在失业、半失业中挣扎着生活。形影不离的困难是我们献身 PAP 的信念。“亲共”、非共或是反共，只要他们是反殖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这里，从没有派别之分，或是“亲共”、非共、反共之争，反殖是大家的共识。李光耀秘书长是非共的主脑，他最关注的是 PAP 的既定方针——走非共民主社会主

义道路。各支部从未闻有“亲共”和非共之争，只有反殖的共同理念。曹煜英文中自称自己是武吉的吗支部非共的代表，我真是为之称奇。一般而言，支部很少有不同政见的纷争。对反殖的认识和斗争方法有不同意见，乃是思考的深度和看法的广度之间的差异，有较为激进和温和两种现象，但并不影响大家之间的感情。李光耀从来没有说过“亲共”和非共在各个支部都存在或发生斗争，只说“很多支部已受亲共分子所控制”。在李光耀眼中，基层组织中的广大穷人都是“亲共”势力。曹煜英若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作出识时务的选择，恐怕自己也逃脱不了“亲共”的嫌疑，他哪有一点非共的味道？完全是在自欺欺人。

我作为武吉的吗支部的创办人，并担任主席职务直至被捕为止，支部成员和我本人自然地有对马共好感的一面。但我们都不曾和马共有过来往。马共是一个不公开活动的地下组织，我们不排除马共有能量放射到我们的支部，但我们更清楚，我们必须和他们划清界线，站在 PAP 一边，不与他们有任何关系，才能保证 PAP 支部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凡有兴趣参加支部活动的各方人士我们都表示欢迎。对那些反殖的广大民众更是大开方便之门，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五颜六色的人物都可成为支部队伍的一员。说他“亲共”也好，非共也好或是反共也好，只要他不是破坏分子，我们从来不理。李光耀的误会，或是怀疑，或是片面加重对立关系的看法，我们除了解释之外，为反殖斗争的大联合决不会做出影响团结的行为，武吉的吗支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

（三）“亲共”、非共的实质

PAP 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以反帝反殖为号召，以建立一个有高度经济发展，类似西方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为理想。他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殖目标是一致的。马共凭其长期反帝的威望，深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实现共产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并不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同样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也不是人民能够理解的。但两者之间都作出诱人的承诺——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和剥削人的公平社会。共产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广大人民是很模糊的。他们并不热衷于去追求、去实现可望不可及的未来。最重要是把直接压迫他们的英帝国主义赶出去，建立由自己掌握命运的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因此，马共和 PAP 在反殖斗争的道路上不约而同地走在一起。但马共长期抗英的武装斗争与英帝结成死敌，在血刀残压之下只能隐蔽于无形的地下斗争。PAP 是公开合法的政党，他遵照英国宪制的规定，走议会斗争的道路，和平争取新马独立。两个反殖政党，一个处于地下斗争的党，另一个是得到合法地位的公开政党，两者有殊途同归的目的（争取民族独立），但也有各自为是的大道目标——各有不同主义的理想。

马共不能公开活动，但他要领导和指挥这场反殖斗争，除武装斗争外，隐蔽渗透到合法政党和群众组织中去是不争的事实。PAP 不得不为这个事实有所警惕，李光耀非常当心 PAP 会成为马共借以公开活动的保护伞。因此，他从一开始，就视马共为一大威胁。但

党内大批优秀的同志，坚定反殖的精英领导都是群众运动的火车头。李光耀既需要他们，又不喜欢他们。在不同阶段的合作道路上不断出现党内纷争的不正常现象。围绕这一纷争的核心问题就是“亲共”和非共。

“亲共”是一股强大的反殖力量，但并不代表马共的势力。“亲共”有不同思想差别：第一，亲马共的反殖斗争；第二，亲他们的坚定性和革命性；第三，是马共的信仰者，即少数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忠实信徒。三种思想，只有第三种思想才是马共的支柱，其它两种思想大部分是属于非共的“亲共”。认识“亲共”，听他们的言行，不足以判定他们的思想，最重要的是看他们对 PAP 的忠诚和所作的贡献。

不分“亲共”的性质，是非共的误区。抛弃“亲共”中的非共，却是 PAP 的损失。这已成为历史，一切功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两者之间的实质关系。

PAP 中委会被人为地分为非共和“亲共”两个派系，而各支部却被指为受“亲共”分子所控制，使党在反殖斗争的道路上无可避免地受人以柄，进退唯艰，无法摆脱英统治者的迫害。“亲共”和非共为反抗外来统治，站在一条战线上，本是同根生，相煎必自焚，这是简而易明的道理。但非共认为，那些受华文教育、说华语、讲方言的激进思想者都是“亲共产党”或是马共分子。并指他们有野心“夺权”，不断把矛盾扩大化、对立化，陷党于重重危机的边缘，使党不断地受到伤害，置党于无法自拔的境地。

共同的反殖，处于共同的利益和目的。在非共指控“亲共”，“亲共”无可耐何之下，党并没有因此倒下去，而是站起来继续战斗，走向胜利。因为有无无数愿意为党作出牺牲、付出代价的人。

当非共把“亲共”看作是篡党夺权的对象时，两者的合作性质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的是非争议已被转移到敌我的对立面，人们已把注意力放在党内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矛盾上，由此而生出一个“夺权”的历史怪胎，被定为一宗党史中的政治大案。

事过五十多年了，我们这批曾为新马独立事业献出宝贵青春的“当今老人”，对五十年代 PAP 内部发生的强“地震”——被喻为党内“夺权”大案，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真相的一面并没有被揭开，指责“夺权”的一方除了对事件本身的失察之外，大部分都是人云我云的瞎猜或是别有用心地作为政治诬陷的手段，以吻合当时形势的需要。“夺权者”是一批最无辜和最不幸的背罪者。五十多年来，忍受着来自不明真相的种种指责和误解从不吭声。为什么？因为执政的 PAP 已为新加坡社会的繁荣、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幸福立下众口皆碑的功绩。对于被屈为“夺权者”，个人所蒙受的历史罪责和损害已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由衷地高兴 PAP 政府继续为她的政绩再创辉煌。

PAP 从创立到领导人民反殖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党内政见分歧是促成团结统一、共同对敌的重要因素。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中能得以生存。“政见分歧”是代表着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派别的强大组合和存在的政治观点，代表着共同利

益又存在不同的意见，所有这些不同政见者只要在为共同的目标而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一定能发挥巨大的凝聚力，冲破一切障碍而取得最后胜利。PAP 就是这样一个由各种不同政治力量组成的最强大的政党。

PAP 内部存在的政见分歧都被反殖斗争的统一目标所化解。在曲折和充满荆棘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并无后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已发挥出其巨大无比的威力。

政见分歧在一个政党内纯属正常现象，若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两种势力的对立，那就是矛盾的转化，性质的改变。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大不智行为。

长期以来，PAP 从未停止内部政见分歧的激烈争论，但并不构成对党反殖斗争、争取独立的威胁。最为严重的是把这种争论转化为非共和“亲共”之间的斗争，成为互不妥协的矛盾焦点。

“民主社会主义”是 PAP 建党纲领，非共是表明自己的立场，决不受任何怀疑，而“亲共”是客观现象，也代表大部分华人的思想，但不是 PAP 全党反殖斗争的主流，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胜利和国际共产阵营日益强大的必然产物。它牵引着一批追求理想主义的华族青年，迷上美丽的征途，但不明白走向终点之后的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只有非共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才能扮演主导形势变化的重要角色。

非共和“亲共”并不是天生的仇敌，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共存或是对立。共存是在统一利益的基础上互相依赖的，对立却是

在利害关系发生严重冲突下产生的。因此，要由客观现实所决定。

PAP 李光耀秘书长把“亲共”视为洪水猛兽。从一开始，就把党内的左翼力量看成“亲共”或是共产党的潜伏分子。在统一反殖的合作过程中，始终采取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少数言听计从的左翼人士，李光耀也不会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总之，在李光耀眼中“亲共分子”的存在，就是对他最大的威胁，PAP 的反殖斗争就不可能一帆风顺。

因此，PAP 内部的主要矛盾，一切党内的斗争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进行的。遗憾的是：好好一个非共政党却被人为地一分为二。

PAP 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外围组织，她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组织纲领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反殖斗争的道路上有许多与马共相似的要求，并不等于就是马共的同路人，这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马共是否借用 PAP 的外壳来遮掩他们的活动，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相信，李光耀对马共的了解比我们多，而且对“亲共”思想了如指掌。担心 PAP 会被“亲共”分子控制，转而成为马共的地盘。英国和他的代理人会用他们的力量，最后把 PAP 毁了。

英殖民主义者对马共的长期武装斗争付出了巨大生命和财力，不得不改变“还政予民”的软性策略。但它并没有改变削弱和剪除马共的决心，对马共的镇压和军事行动更是血腥和残酷。

人民同情和支持马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以各种不同形式反抗英帝的统治，成为马共领导抗英的群众基础。

PAP 领导的反殖斗争空前膨胀，党内的左翼力量代表着全社会最广泛的劳苦大众，提出的口号和诉求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受到各个阶层和不同民族的大力支持。从而也勾起英殖民者和他的代理人的不安和仇视，合谋要把这股力量消灭在他们的魔掌之中。并把这股力量转移到马共身上，用“亲共”影射马共，嫁祸给 PAP。

“亲共”是一种思潮，马共是一个政党。思潮可以改变。马共是改变不了的。PAP 本可以把“亲共”争取到自己的旗下，变“亲共”思想为亲 PAP 思想，也就是非共思想。强把“亲共”思想推给马共，有助长马共之声势，大帮马共之忙。所谓“亲共”，实则是一批坚定的反殖分子。

李光耀对“亲共”领袖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这批职工运动的优秀领袖，碰巧具有“亲共”的思想。”这里所指的“碰巧”，不正说明“亲共”不是主流思想，只是应势而立。因此，怎样对待“亲共”思想，是极为重要的。

非共是主动的，“亲共”是被动的。“亲共”面对非共施加的种种压力，除了极左派的干扰，从无对抗行动。他们始终是 PAP 的捍卫者。对非共的指责和攻击他们不作反驳，他们只会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或向非共作出妥协和委曲求全的让步。其实他们本身就是“亲共”中的非共，与马共的斗争哲学大不相同。“亲共”是一种思想倾向，马共的地下组织正利用这种思想倾向选择精英、发展对象，成为反殖运动的骨干，但毕竟不能公开，起不了大作用，真

正能起作用的只是非共的“亲共思想”。

李光耀不愿准确地区分这种关系，对不顾安危的左翼队伍一再排斥和提出警告，把非共中的“亲共思想”置于对立面，流露出他对马共渗透 PAP 的忧虑。他同样不顾一切地要把“亲共”和非共划清界线，为 PAP 洗脱“亲共”罪名。

从此以后，PAP 把“亲共”视为党内的主要危险，但谁是“亲共”，谁是非共？“亲共”中有非共，非中共有“亲共”，也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一个共同反殖的总体。马共有“亲共”的群众，“亲共”不等于就是马共。他们是在惊风骇浪中游泳，在没有到达彼岸之前，不会有太多群众追随马共的。李光耀把讲华语和方言的华人都看成“亲共”，这是表面化。实际上，只有左右之分，“亲共”和非共却是含有政治上的阴谋色彩，因为它是合法和非法的代名词。

李光耀把党的基层组织、工会和绝大部分受中文教育（凡是讲华语和方言的华人）的民间左派团体都归入“亲共”的队伍，把他们和马共等同对待，深怕这股力量会给 PAP 带来灾难和痛苦，因为它已被列入带有非法性的活动嫌疑，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英国及其代表猎取的目标。

所谓“亲共”队伍，实际上是一群最受压迫、最受剥削，最有觉悟和最迫切追求解脱苦难命运的勇猛之士为正义而集聚在一起的反殖大军。“亲共”只是对马共反殖斗争的强烈支持，亲和不亲决不是一个绝对化的概念。

直接参与 PAP 活动的左翼人士，在感情上、思想上是与 PAP 分不开的。因此，与其说是“亲共”，不如说是亲 PAP 更为恰当。

党内某些“倾共”思想的言论和行动，那只是倾向马共反殖斗争的坚定性，如何实现马共的最终目标，是与 PAP 完全无关的。PAP 只要沿着自己的既定方针——民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事实上，PAP 就是一个地地道道反殖的非共政党，活跃于党内的领导和干部是一批最忠实、最优秀的精英分子，大家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为了保护这个利益不受到别人的侵害，有不同的意见和发生激烈的争论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指责对方是疑犯，那是制造家庭悲剧的行为。

李光耀认为，“亲共”分子一旦控制 PAP 的领导权，就等于马共实际上控制了 PAP。马共就可实现他夺取政权的合法性。这样的设想并非无道理。但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英国和马来亚的强大军事力量足以阻止马共的妄所欲为。“亲共”分子若掌握了新加坡政权，它不可能打碎国家机器，引火烧身，施政方面只能按 PAP 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改良政府机制，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安定社会为出发点，对社会各个领域部门进行完善的改造，决不可能由共产党的意志所左右。即使马共拥有武装力量，想制造社会的乱局，发动在反殖时期类似的群众运动。但人民的需求已进入新的期待，不再希望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更不会接受马共的煽风点火。因此，在得不到马来人、印度人、受英文教育者及广大人民的支持下，

那是自取灭亡的道路。如果马共再不识时务，与民为敌，那么“亲共”会抛弃自己的思想转为非共，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同非共领导走在一起，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而奋勇前进，李光耀将会成为众望所归并获得永世英明的杰出领袖。

（四）“亲共”和非共是历史的必然

“亲共”和非共是一个论不完的课题。我在谈到“亲共”中有非共，非共中有“亲共”，提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见解，有可能会被误会，或被认为是奇谈怪论。实则这是现实中的现实，是无可争辩的客观存在。

PAP 是一个非共的政党，从领导层到各个基层的主要骨干，分为几种不同的思想。有亲英思想、亲华思想、亲巫思想，也有亲印尼、印度的思想，甚至还有亲各种不同宗教的思想。归结起来是国家、民族感情和信仰引发不同思想的必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很早以前就确立了以马来亚为祖国的观念，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他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就必须尽自己公民的责任，义无反顾地为这个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新加坡（马来亚）早成为帝国主义争夺和掠夺的对象。从葡萄牙占领马六甲起到日本法西斯三年八个月的侵略占领、马来亚（新加坡）一直是英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下的殖民地。马来亚（新加坡）人民从抗日战争中得到血的教训：对任何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只有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把他们赶出去。因此，当英帝重占马来亚

（新加坡）并施于苛政酷律的统治铁腕，马来亚人民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暴发了一场长达 50 年的武装斗争。马来亚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开始就高举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马来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青史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史册上。

马来亚共产党是领导人民反帝的先驱。他在马来亚（新加坡）人民的心中早已扎了根，威信如日中天，任何反共的言论和行为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敌方挑衅，所以形成广大人民的“亲共”思想。

这是历史形成的必然产物，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在 PAP 出现之前，马共是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希望。

在这之前，也有不少标榜反殖的政党出现，实际上都是一些机会主义政党，他们以不损害英国利益为前提，走向英国为他们设计的舞台，乔装人民的代议士，转移人民的视线，打击和削弱马来亚共产党的抗英力量。

马来亚（新加坡）人民早就识破了英帝的阴谋，他们对这些机会主义政党嗤之以鼻，视为是英帝蓄谋刻制的傀儡，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人民仍然把希望寄托在马共身上。

PAP 以一个真正反帝的崭新面目出现在新加坡的政坛上。那时，正值亚非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大好形势，中国和亚非各国建立了国际新关系，坚决支持亚非国家和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大大地把反帝反殖的斗争推向势不可挡的高潮，动摇和摧毁了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

PAP 是由具有不同思想,但有反帝的共同目标的人组合而成的。来自受不同教育的各族杰出人物,不分彼此,不分等级,不分贵贱,他们抱着一个共同的信念,要把英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连根拔掉,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和公平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由受不同教育、不同阶层的各族反殖人士组成的 PAP,提出以和平宪制斗争的手段争取马来亚独立,不主张暴力革命,以此和马共发动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划清界线。作为公开合法政党的组织开辟新的反殖阵地,高举民族主义旗帜,接受英国一手策划的宪制安排,开展一场连英国也意想不到的反殖高潮。PAP 成为震撼英庭的一股新力量。

领导 PAP 的核心人物,李光耀是代表受高等英文教育的开明派领袖,他的资历、英明和才干造就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同他共事的有受华文教育的工运领袖和反殖的先进人士。为了反帝反殖的共同目标,他们摒弃思想障碍,不作无谓争论,和衷共处,并肩作战,团结一致,矛头对外,通过宪制斗争取得政治上的突破。

英国人不想也不愿被人民的斗争夺去他们统治新加坡的权力。当 PAP 强大到足以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时,他们就会马上伸出黑手,制造无中生有的借口,把反殖的坚定分子污蔑为马共颠覆政府的嫌疑犯,制造分裂和互相猜疑,全面进行血腥镇压,延长他们在新加坡的统治寿命。

英帝的无形黑手和公开的施压,党内开始出现了恐共思想。原

来的 PAP 在反殖斗争的策略上存在着左、中、右各种不同看法，换言之，就是激进与温和两种看法，折衷的中间派是党内的和事佬，不足以影响大局。那么，党内思想的纷争只能说是左右之间的不同意见。

李光耀确实相信英方的宣传和污蔑，加上他本人长期和左派建立起来的反殖强劲，深恐自己会被卷进和马共脱不了关系的旋涡里，遭受牵连。因此，他要表白自己，提出了“非共”和“亲共”的分水岭。非共是在合法的政治规范内受到法律的保护，“亲共”则是以合法身份来掩饰非法的地下活动，随时都要面临被镇压和被捕的危险。

为什么 PAP 会有“亲共”和“非共”这样一个十分新奇的名称呢？英国和他的代理人乐意听到这个来自 PAP 发出的声音，他们大有机会为非共清洗“亲共”在 PAP 内部的强大组织，削弱 PAP 的有生力量，为那些傀儡政党走向议会权力机构铺平道路，继续强化他们的殖民统治。

不可否认，PAP 从中央到支部的大部分干部和参与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或多或少都有“亲共”的倾向。卫马抗日的残酷战争史已为马共写下光辉的一页。人民没有忘记，马共以实际行动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为马来亚的民族独立死战到底的决心，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壮举。因此赢得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亲共”也就是由此而来。PAP 如果没有这股力量的支持和拥护，他和其它被允许公开活动的傀儡政党又有什么两样？但“亲共”

必竟是一种思想，他不是马共的化身，没有理由要把这种思想的人赶尽杀绝。

马共闪耀着时代的光辉是日本法西斯和英殖民主义者一手造就的。外来的统治结束之后，掌握国家机器的新主人到底是谁？人民会作出自己的选择。马共是否有条件，由多元民族和不同文化、信仰、宗教、习俗组成的马来亚（新加坡）所要走的道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不能适应国情需要的政党只能离开现实舞台。

有“亲共”思想的 PAP 党员和干部，他们大多数是非共的。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其外围组织抗英同盟的成员，只有无形的影子，也许其中有极少数人会相信共产主义理论中所畅述的理想社会，但大部分人对共产主义甚缺认识或毫无认识。他们参加 PAP，迅速投进反殖队伍，为的是不满现实社会的黑暗，对英帝统治的种种罪恶作出强烈的反应。这些“亲共”的非共党员，是 PAP 争取独立走向胜利不可缺少的主力军。

李光耀以不亲共的非共理念排斥“亲共”，事实是因恐共思想的阴影作怪。在这之前，他需要“亲共”力量的支持。他不断从受华文教育者当中物色才智兼备的反殖精英分子为 PAP 开路。他强调非共，但他也有“亲共”的时期，以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他的转向。如果英帝不对马共进行血腥滥杀，肆意逮捕和镇压，引起恐惧和忧虑，PAP 的非共也必然带有“亲共”的色彩。至于不同思想的矛盾、对立、冲突或分裂在反殖的大前提下有可能减少或避免发生。

PAP 内部类似李光耀受高等英文教育的反殖领导，他们不避嫌

地同被视为“亲共”的领导和骨干建立良好关系。他们知道，所谓“亲共”，恰恰是一批有崇高思想的正义人士，是党最忠实、最可靠的坚定反殖力量。他们更清楚，这是英帝借用“亲共”分裂 PAP 的阴谋，也是为他们策划镇压 PAP 找到最好的借口。无论如何，他们一清二楚。对反英他们不能表现激烈，对非共的“亲共”，他们不排挤，但不能不提防受到牵连。任何时候，他们都有“亲共”和不亲共的表现。

事实上，非共和“亲共”是合法和非法的代名词，为镇压的需要，扣上“亲共”罪名，自圆其说，胜之图穷匕见。政党内的左中右思想被转为非共和“亲共”绝不是正常的现象，他要变激烈的反殖运动为温和的反殖妥协。

党内的激烈派领导 TT 拉惹也是受高等英文教育的大律师，他和受华文教育的反殖人士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他并不把他们视为可怕的“亲共”分子，相反的，他是真正成为反殖队伍中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的勇士。

另一位是李光耀的亲密战友王永元，他从温和走向激烈，他从反共走向“亲共”。他当了市长之后，他知道温和反殖是不得人心的。他用激烈的行动，把象征殖民地权威的权仗搬出市政大厅时，支持的群众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王永元至此以后的一段日子，他以“亲共”的激进言论（方言）搏得广大人民的支持。

权力使人腐败，也可以使人疯狂，利欲熏心已失去控制理智的能力。王永元不会被视为“亲共”分子，只会被视为野心家，因为

那是真正的权力斗争。

当反殖胜利在握时，权力已成为争夺的对象。在利益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各种不同的思想都会因势而转变。最后会出现什么局面，谁也无法预料。

我不愿预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大敌当前，反殖是首要任务，非共和“亲共”不应该也不允许搞分裂。左派内部有更激进的极端思想，但他不能左右大局，不是代表反殖的大方向，他只会损害党的团结和统一，削弱党的斗志，把党内一批反殖的、良好的温和派迫到避之为吉的地步。

李光耀因恐共而提前和“亲共”划清界线，间接助长了英国借口对付马共的镇压行动。PAP“亲共”中的非共党员受尽迫害，但并没有对PAP构成威胁，因为“亲共”的非共党员始终是PAP最忠实和最可靠的中心底柱。

PAP内部有马共党员和抗英同盟的成员隐蔽活动也不奇怪。PAP是公开合法的民族主义政党，他的成员是来自各个民族的不同阶级。党初建时期，党员不需经过审查，只需有人介绍或个人自报申请，都可立即成为党员。党的性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工人先锋队。

这个党的广大党员，特别是高层领导和主要骨干，在马共的眼里只能说是他们重视和团结的对象。马共对吸收党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出身成份是主要条件，经受考验是重要的一环。PAP的左派领导是否有马共成员，说不清，怀疑，没有根据，不怀疑，似成盲

目。因此只能用“亲共”代替马共，加罪予 PAP，殃及整个反殖队伍。

作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左翼政党，党的领导层都沾有资产阶级的色彩。在马共眼里（除了有关系的成员外），他们是需要受到真正的考验，否则是没资格入党的。充其量他们只能是被争取和统战的对象。

左翼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有追随马共反殖斗争的意愿，但只能是非共的群众。只知有马共，却看不到马共的影子。他们要反帝、反殖、反压迫、反剥削、反黑暗，马共是不能公开领导的。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可以代替消除他们长期隐藏在心里的愤怒，转而积极支持和参加 PAP，他们带有“亲共”的色彩，但他们是推动 PAP 成为新加坡反殖运动的主轴核心。

PAP 这支新的非共反殖大军，带有马共从抗日战争唤起民族觉醒的遗风走到群众中去，继承反帝的传统方式，宣传和动员人民群众组成反殖的强大队伍，动摇了英国的统治地位。英国不甘于败在这股有觉悟的“亲共”又是非共的冲击之下，竭尽全力援救他垂危的命运，不惜借用最无耻的谎言，说什么马共利用 PAP 的保护，进行颠覆政府活动，制造社会不安和混乱，新加坡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威胁……，隐约地发出他们预谋已久的镇压讯号。

无数“亲共”的非共民族主义者就这样被加上马共的罪名，无辜被捕、坐牢、驱逐出境和遭受最残酷的迫害。

政治集团内部大小的争权夺利和互相倾轧，古往今来已是司空

见惯，不足为奇。PAP 在没有执政之前，面对着是刺刀指向我们的凶残敌人，我们没有理由不一致合力对外，共同对敌，把一切内部矛盾都化为对敌斗争的火力。

PAP 尚未执政，“亲共”的非共领导从未有争权的野心，党内不存在利益的冲突，李光耀心里明白。但他要为 PAP 的未来打算，作未雨绸缪的准备。他打出非共的招牌，压制抗英情绪，取悦英国的欢心，顺利地 from 英国手中接收从自治走向独立的政权。

反殖的民族主义政党本来就是非共的。“亲共”、非共、恐共、反共，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突出“亲共”，打击“亲共”，恰恰说明马共的威慑力震毁了英帝的心肺。它无法抵挡马共从四面八方的进攻，担心来自各方联合的反英力量加速马共争取民族独立的胜利。长期以来，对付“亲共”不需证据，只要怀疑就可以摧毁和削弱一切反殖力量，阻止马共势力的扩张。

李光耀从短期的“亲共”到恐共的非共是由他的思想意识所决定的。没有任何怀疑，李光耀是不会长期和“亲共”合作的。一旦合作，他就会产生怀疑、担心、顾虑、甚至害怕，进而强烈反对。因此，他不会吝惜牺牲自己队伍中“亲共”的非共同志。

为了换取英国人的信任。“亲共”必须承担牺牲，英国人才会顺理成章地在宪制谈判将新加坡的自治权交给李光耀管理。如果没有“亲共”这股力量的存在，新加坡恐怕会出现另一种局面。

总而言之，“亲共”中的非共是 PAP 的主力，非共中的“亲共”是随大流而游移不定。英帝及其代理人以对付“亲共”中的非共为

借口，打击、分化和削弱各族反殖阵线的统一，使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在退出马来亚（新加坡）政治舞台之后，其庞大的掠夺资源和利益能继续得到保护。

（五）时过淡忘的史实

党从成立到 1956 年 10 月 26 日，英殖民者和他的代理人林有福政府向新加坡人民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之前，PAP 依靠工会的组织力量，领导全星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的反殖斗争，一次又一次地迫使英殖民者作出无奈的微小让步。同样的，英殖民者和他的代理人也一次又一次地向 PAP 施加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和迫害。当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抗争，统治者凭借他们强大的统治机器，占有优势地把被统治者压下去，但他们不可能安享其成。PAP 的反殖道路，正是循着这个反复运行的规律发展的。

从 PAP 的成立到反殖运动受到血腥镇压短短的三年间，对每次所发生的震撼事件都成为历史的空白，略作记载的文叙也只是避重就轻或是回避事实之虚假宣传，令人读之心酸！

短短三年时间，是 PAP 最具生命力的年代。她打开了黑暗地狱的大门，带领着大批被压在最底层的人民冲向光明之路，看到前进的方向，看到美好的希望，不顾一切安危地向着统治者血刃冲去，倒下去了，爬起来，前仆后继，挺直腰杆，没有任何压力可以使他们屈服！

PAP 就是这样为被压迫者杀出一条血路，走向胜利的舞台，扮

演着自己重要的角色，开创了新加坡历史上最辉煌的新篇章。

人们并没有忘记：一切胜利成果的背后有着大批付出代价的人，历史的颂诗决不可能少掉他们的作用和抹杀他们的功劳。

他们是一批不求名、不求利、不求任何回报，愿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可敬人士和 PAP 的优秀干部。他们从不公开自己所作的一切，寂寂无闻地从事一些实际工作。只要这些工作能为反殖斗争发挥作用，他们二话不说，迎风破浪，力挽狂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这些人，有很多是被人民所熟悉的党的杰出人物和工运领袖，参与反殖的各界志士前仆后继的英勇精神更令人永远难忘。他们为推动反殖前进和走向胜利，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是不应该被淹没的。

这段历史是不会被遗忘的，新加坡被挤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王国之后，对前段反殖斗争的历史，尤其是和“亲共”有着良好并肩作战的历史故被淡化，被轻描淡写，或是掩饰事实横加涂污……总之，涉及要害伤口，不提或是少提为妙。

五十年代的反殖浪潮中人才辈出，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人物，李光耀、杜进才、王永元、蒂凡那、林清祥、方水双、陈维经、陈维忠、曾昭卓、TT 拉惹、王邦文等一批党政领导人；乌哈尔、詹密星、布都遮里、林振国、陈国伟等工运领袖。此外学生界的孙罗文、教师界的陈广风、新闻界的易润堂、妇女界的陈蒙鹤、学生家长代表吴彩唐，还有农会、小商、小贩、自由职业者的前线活跃分子都是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我不可能罗列出所有名单，但数以千计的勇

猛之士并不为人们所遗忘。

PAP 从六十年代开始爆发党内正式分裂危机之后，共同反殖的不同政见者另组“社会主义阵线”分庭抗礼，为时不久就遭到 PAP 灭绝性的镇压。于是新加坡反殖历史的前期已显得暗淡无光，一个合而分治的马来西亚被迫走上独立建国的新加坡，集中力量地启动新的历史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反殖已降为其次。事实上，这已不是反殖的时代，而是全力投入建国、发展经济、解困民生的时代。虽然她还要周旋于马来西亚和英国之间并尽量避免引起矛盾、冲突，但它更需要向世界表明，PAP 政府是一个完全有能力应付来自各方挑战并有成效的完成她的建国方略。

五十年代的历史是新加坡人民从沉睡中猛醒过来的历史；是马来亚人民长期反帝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历史；是英帝国主义在马来亚统治一百多年后即将崩溃的历史；是星马人民不屈不挠走向胜利的历史；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战斗史歌。李光耀不愿意“亲共”分子分享反殖战绩的功劳，也不想闻到这些血腥的味道，PAP 内部更是噤若寒蝉。在所有有文字记载的书籍、文章、刊物、报纸和一些传播媒体中对这段历史都视而不见。多少回忆录的作者，只写建党之初的简篇，轰烈悲壮的一幕却只着重于党内的斗争，不提共同反殖的并肩作战。

党初建伊始，为筹建基层组织，参于建党的无数优秀青年，废寝忘食地日夜忙碌。自愿捐钱献力，自我牺牲，在破陋不堪的旧房屋底下，在酷热潮湿的空气里，在买不起公办桌椅的困境中，一切

文具用品，包括纸张、笔、本子、办公所用的东西，能捡则捡，不能捡才买。为组织群众，扩大队伍，四处奔走，三餐无定，木凳当床，通宵小睡。天天有人办公，晚晚有人活动，书写文章、标语、口号、通告、宣传，分析形势，揭露黑暗，提高知识，启发觉悟。开展学习，大办康乐，联络感情，争取群众。凝聚所有反殖力量，全部投进 PAP 领导下的人民运动，为党取得宪制斗争的全面胜利创造条件。

为迅速建立支部，广泛组织和动员群众，培养干部吸收党员，党的主要干部是发展支部的原动力。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党中央和基层干部举行不止百次以上的大小会议，充分表现出党团结一致的反殖热诚和衷心合作的共同愿望，为组建和发展支部奠下了良好基础。

林德宪制选举前夕，李光耀、杜进才和部分中委以及那些最先参与 PAP 活动的骨干共二十多人到傍俄淡宾尼士吴秋泉的家开会。讨论在各选区迅速筹建支部以应对竞选问题。我和谢奕田从武吉的玛前往参与讨论，并在会上作了发言。我是穷人出身的讲华语者，言出直接，语气偏激，带有倾共思想，即场受到李光耀关注。会议结束，他嘱咐我到另外一个房子谈话。房间里，他和气地带着笑容，用清楚的华语单刀直入地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答说不是。他问我在哪间中学读书，我告诉他，小学还没有毕业。他似乎不相信，认为我是马共培养的人。他没有说反共，也不提“亲共”，只说马共是英国人追捕的对象，但他不会出卖马共。从短短的接触谈话中，

看出李光耀对马共的政治敏感，但他没有忽视把支持和拥护马共的这股力量争取到自己身边来。他聪明绝顶，他知道没有这股力量的支持，PAP 就很难建立起声势浩大的群众队伍，就不可能有发展和取得宪制斗争竞选的胜利。

他有非常顽强的战斗力，他坚定自己的立场，看准了方向，敢与受华文教育的左翼进步人士合作，周旋于英国和各种反共势力纷纷向其施加政治上的压力而不动声色。他以深遂的谋略把左派倾共分子引到反殖斗争的大潮流。他以这种通天盖世的本事赢得各方的掌声，奠定了他走向成功的基础。

李光耀和左翼力量并肩反殖的同志关系，在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期进入了最佳状态，谁不对李光耀抱着非常好感、尊敬和信任的态度？左翼力量乘势攻破了英国在新加坡统治的堡垒，势不可挡地发展和壮大了人民反殖队伍，成为新加坡后来走向自治、独立的开路先锋。这段不能忘记的历史篇章却失去了踪迹，令人感到无限的慨叹！

林德宪制立法议会选举，党派出候选人参加竞选。空前激烈的竞选活动，所有党员和干部倾巢而出。中央和支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不计个人得失，在共同反殖的旗帜下，汇集了各民族的力量，注入了做人尊严的启蒙原素，组织和动员他们参加各种群众大会，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党的杰出候选人：李光耀、蒂凡那、林清祥、吴秋泉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矛头直指英统治者及其代理人，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反殖，党成为各族人民群众寄予希望的大靠山。

让其免受马共渗透。1956年下半年，英国和他的代理人试探性地先后逮捕一些稍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对左翼工会施于威迫和警告。工会已知道即将来临的大风暴，他们以声势浩大的联合行动组织九五工团，在羽毛球馆和其它地方举行了多次的声讨会和抗议行动。PAP和他们站在一起，李光耀也为他们申张正义。不管英统治者要出什么阴谋手段，PAP 仍然是团结一致地全力反殖。

英国已忍受不住，1956年10月25日，一场残酷大镇压终于发生了。当天下午四点钟，党中央在武吉的玛美世界大草场举行群众大会，抗议英国人和林有福政府变本加厉地镇压左翼力量，磨刀霍霍地准备向工会下手。大会还呼吁在华中集中的学生冷静离开现场，结束抗议（为孙罗文被捕一事）行动。到会的群众近万人，我是武吉的玛支部主席，当然是仪式上的主持人。杜进才主席、李光耀秘书长、王永元、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王邦文等都有出席，他们都讲了话。六点钟大会结束以后，出席的中委都各自离去，群众也分散回家，但还有不少人，群情汹涌地涌向华中去支持学生的行动。就在这一天晚上，从华中开始发生了骚乱，很快蔓延到全新加坡。林有福政府在主子的指挥下，宣布全新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全面戒严。乘机引用“公安法令”，把我们党的发起人蒂凡那、方水双、曾超卓和党最杰出的领袖林清祥等无理地加以拘捕。形势严重恶化，逮捕行动继续，白色恐怖笼罩，失去领导控制的对抗行动变本加厉，局面一片混乱。理智地反省，收拾残局和重建信心已是刻不容缓的急务，但事不由己，党外不明人物的干扰，党内矛盾严

重转化，英方背后染指，国际反共势力兴风作浪，各种媒体的宣染和无中生有，PAP 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此严重关头，党的捍卫者别无选择，挺身而出，冲着逆境而上。

PAP 在新的形势下可以改变反殖斗争的策略，但决不能动摇自己已打下的群众基础。社会上出现的复杂现象，不能从党内寻找根源。一切良好的愿望就是团结反殖，争取独立。非共、“亲共”只是现象，不具实际。不能强加罪名，模糊视听，造成混乱，自我削弱党在人民中的威信。

PAP 内部，由非共、“亲共”之争说起，对时局的不同看法，对反殖争取独立的对策、对团结统一反殖的认识以及某些偏激的言论带来的不利影响，都是贯穿着这一历史时期的党内矛盾。不少着墨者都不愿意旧事重提。他们知道，PAP 不是执政党，非共、“亲共”是党内爆出来的矛盾，不是执政者用来对付颠覆政权的专政手段。李光耀是反殖的战友，不是英帝的帮手。“亲共”是他依靠的力量，但又被看成是威胁他的领导权力。自相矛盾和权衡利弊之下，他突出“亲共”和非共之间的矛盾，让“亲共”去面对敌人枪口，让倒下去的同志为 PAP 写下颂歌的风采。也就是为日后消除共产党的影响作好准备。

正因为如此，落笔触及的是敏感要害的伤口，写下真实的历史是要付出痛苦的代价，人活于世已是非常不易，又何苦多管闲事？因此，PAP 的这段难忘的真实历史只能由时间的飞逝悄悄带走，换来“难得糊涂”的逍遥自在。

历史的真实可以直言，敏感的要害是不易治好的，涉及在内的不幸人物冤沉大海、杳无踪影。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例比比皆是，等待伤口的治愈，那是历史在新的条件下重生。

淡忘或是摒弃早期那段具有意义的反殖历史并不奇怪，分享功劳的任何痴心妄想只会适得其反。一场欲加之罪的“夺权”虚传却在党内政治史上刻下深印，把并肩作战、同舟共济的重要史迹转移到“夺权”的对立面，成为全社会和世人关注的焦点。

（六）“夺权”之说受关注

一段受人关注的 PAP “夺权事件”，被渲染得极其“神秘”和传奇，世人信以为真，无辜者如吃黄莲，半个世纪以来，“夺权”事件，一直成为悬疑。

解开悬疑，一直是我心中一个结。事过半个世纪，有十年居住中国内地，到港澳已逾四十年，一心经商，无意过问政治。偶尔有故知送来佳作和一些名人所写的五六十年代反殖作品，读后心有不平、焦虑和不安。历史的发生、经过和实质的内在关系，多不作调查，就把它写得面目全非，将涉及事件的人物说成有“野心”、“夺权”、与地下共产党有关，企图把他们推向灭顶之灾。

多年来有不少老朋友到大陆参观，顺便到澳门见我叙旧。每谈到五十年代的事，大家都非常关心发生在 1957 年 PAP 第四届中央选举的“夺权”一事。他们不了解内情，不想胡作推测。他们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想对新加坡那段历史有正确的认识。这些善意的提

问，使我深为感动，我感谢他们对“事件”的关心。我相信，解开这个历史的结，一切的讹传、诬陷和是非曲折，将会逐渐被纠正。

四年前，新加坡海峡时报高级选稿员梁荣锦先生到港澳，特约我和才安兄（已故）见面。向我了解 PAP 五十年代第四届中委选举“夺权”事件的全过程，为选写一部庆祝 PAP 五十周年纪念册。他请我们讲述当时“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我毫不犹豫地将所知道和自己经历的一些情节，通过不完整的回忆，记多少，说多少地向梁先生作了介绍，当然也提出不少自己的观点，但所有的事实，在梁先生的潜意识中是否已得到认同，我尚未读到梁先生选写的文章。

无论如何，朋友们对“夺权”之说的关心，梁荣锦先生对“事件”的专题采访，说明“事件”本身在 PAP 和新加坡反殖取得胜利的历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页。在这方面，我能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将事实真相作一回忆，算是了却一个心愿。

“夺权”之说，只是在 PAP 第四届中委选举后才被宣染成震惊世界的重大新闻。小小的新加坡，最得人心、最有组织、最具影响力的 PAP，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夺权”大事，怎不引起国人和全世界的关注？我们这些被牵涉在内的无辜者，顿时成为充满疑团和众议纷纷的对象。

追溯“事件”发生的原因，那是在 1956 年 10 月底英殖民者和林有福政权血腥镇压反殖运动之后，在白色恐怖统治的形势下，被围剿的左翼剩余力量，在群龙无首的困境中力求重新组合。来自工

会、学界和其它团体的活跃分子不顾一切地冲向社会，企图打破白色恐怖的包围。他们批评 PAP 软弱，李光耀向英国让步，再不能成为反殖的领导。他们声言：在新的形势下，应有新的反殖斗争策略，不能无原则的妥协。他们渗透 PAP 基层、工会等组织，亲访前首席部长马绍尔和名声不佳的吴光明及民主进步党主席许春风“商讨合作”。提出恢复和筹组新的组织。企图削弱 PAP 的领导地位和打击李光耀在左翼队伍中的威信。他们的一切活动，不管动机如何，左翼队伍中的严重分裂已是不可挽回的事实。

大镇压后不久，PAP 中央各支部主要负责人前往丹絨巴葛总部开紧急会议。李光耀秘书长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并针对左翼运动遭受镇压后的新加坡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提出新的反殖对策，强调预防重蹈覆辙，避免过急行动，表明 PAP 是“非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不是亲共的外围组织。坚决反对马共的暴力革命，主张和平宪制斗争。还有争取和马来亚统一等等，李光耀的讲话，与会者大多认同，并无争议。

李光耀的讲话，经各报刊登和发表之后，引起社会上一股激进的反对声音。有人认为李光耀的反殖对策，已一改过去的强硬态度，什么“非共”、“亲共”，什么“过急行动”，什么“暴力”、“和平”、“统一”等等，全是软弱妥协的自白，对英殖民者和林有福当局的残酷镇压阴谋及目的不作揭露，不敢发出严重警告，不敢继续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殖斗争，放弃争取独立，削弱和压制人民反殖斗争的积极性。

这股反对李光耀的激烈言论在左翼队伍中起着极其不良的影响，在社会上被那些有机可乘的人加以利用，工会和 PAP 的基层组织也有少数人被模糊，摇摆于正确和错误之间。形势一片混乱，李光耀决不容忍对他的攻击，他怀着极大的愤怒，严厉谴责“亲共”分子盲干，并指责左翼工会和党的基层组织已为“亲共”分子所控制，声明：PAP 决不作为共产党活动的保护伞。他非常清楚，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只有在英国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取得，不和“亲共”分子划清界线，不强调“非共”社会主义，不向英国作出妥协，不取得英国的信任，不得到马来亚人的认同，通过统一取得独立或是争取独立，那是艰辛和遥远的事。

“亲共”和非共已成为不同意见者争论的焦点，激进言论的刺激掀起了一场左翼内部误会重重的风波，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卷进去，但总的来说，PAP 基层的主要干部和党员以及工会中的多数派是站在李光耀一边的。他们为顾全大局充当夹心人物的角色，为维护 PAP 的团结和捍卫李光耀在党内的威信，更重要的是为反殖统一不受破坏，周旋来自各方不同声音的围攻，他们是一批后来被屈为“夺权”派的忠诚之士。

不能否认，激进言论的散播者有被怀疑是来自英国的阴谋，或是马共地下一些极左分子所为。强把我们说成是“亲共”，并和他们混为一谈，那是完全错误的。

据知，马共内部组织长期以来就不断地发生路线斗争、派系斗争、互不信任的各种残酷斗争，马共内部的不同思想在 PAP 内部得

到充份的反映。极左分子是马共内部路线斗争的通病，PAP 深受其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七）为团结委曲求全

李光耀听到左派队伍中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多，1957 年 3 月第二次宪制谈判之前，他频频召开中支联系会议，在会上不断摊牌，并对支部负责人的发言不屑一顾。他怀疑、不信左派有人对他的忠诚。任何解释、赞同他的非共主张，他都认为这是“亲共”分子的权宜之计。因此，采取不合作主义。

1957 年 3 月，李光耀随代表团赴英参加第二次宪制谈判期间，PAP 中宣委和支部主要负责人再三强调：“一定要团结，不要分裂”。我们决不允许任何搞分裂的活动。在此期间，中央和各支部主要负责人频繁地接触，总部组织秘书王邦文和主席杜进才对各支部反映的意见和传达的讯息，常有误会，并把各支部负责人看成是“亲共”的同路人。不久，王邦文组织秘书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武吉班让支部召开中支紧急联系会议，商讨宪制谈判进展和党内出现的问题。是年 3 月 31 日，杜进才主席联同中委提前抵达会场，各支部到会者众，但多有来历不明的人参加。约 400 多平方尺的支部办公室，挤满一堂，一张可坐 30 人的长方形桌子，主席杜进才坐在中间，围绕在长桌周边的是各支部主席和秘书，大厅的空间都坐满各支部的积极分子和临时参会的生面孔。会议一开始就充满着疑云重重的气氛，没有过往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

会议上，杜进才主席崩着不快的脸色，语气十分沉重地介绍李

光耀秘书长在伦敦宪制谈判的态度，并指责党内“亲共”分子正在配合社会上反 PAP 势力向党发动攻击。他的讲话引起与会者少数人的强烈反应，他也感到极不耐烦和不满。

会议期间，有来自不明身份的人穿梭走动，向各别支部的主席和秘书窃窃私语，说什么不得而知，但从发言中可以推测，他们是在出谋献策，要求杜主席明确表态，向在伦敦宪制谈判的李光耀施加压力，争取新加坡完全独立。

这次会议，除了李光耀赴英参加宪制谈判外，大部分中委都有出席。他们和往时一样，发言不多，说话不长，唯一不同的是态度严肃、表情凝重，似有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那些不明来历的各路人马，在会议上跟 PAP 杜进才主席等部分中委对着干，把会议的注意力分散到被视为“亲共”的中委和各支部身上，杜进才主席错误地认为：“亲共”中委和各支部要为此次会议承担责任。

这次会议，还有一小段插曲不为与会者注意，那就是连续担任两届中委的神秘人物——潘铁人。在会议上，他显得比平时有些活跃，他坐在我旁边，用速写记录着会议的内容，他没有发言，但却非常欣赏这次会议“气氛的热烈”。他问我对会议的看法怎样，我只说了一句“抒发己见，很好。”他大表赞同，并表现得格外友善。

说起这位潘中委，很少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他大约当了两届中央委员，无论在什么场所，他只是穿着灰黑色的短裤和咖啡色的短袖衣，留着一撮羊胡须，说话声调清晰洪亮，看似小说中的游侠，刻画中的工人形象。他的公开身份是市政厅清粪工人，但实际在哪

个部门工作并没有人知道，只凭传说。我对他的印象，开始是敬重，以后是怀疑，在这次会议上，我觉得不宜接近为妙。

会议结束后，留下的是重重疑虑和误会。PAP 部分中委和支部多数主要负责人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关系，由 PAP 部分中委和支部主席、秘书组成的中宣委负起劝说和抗拒那股反李光耀、杜进才等极左思想的责任。召集各支部所有委员和干部举行各种形式的会议，商讨对策，并委派重要成员对他们进行劝说和陈述反殖的利弊关系，强调反李就是破坏反殖，孤立和反 PAP 就是为虎作伥，PAP 绝大多数人和全星的左翼队伍决不会支持这种冒险行动。中宣委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们不放弃反李、反 PAP 的一切活动。

李光耀从伦敦回到新加坡，带来此次宪制谈判取得的某些成果，向各中委和支部作了报告，其中涉及新加坡力争完全自治所受的阻挠、PAP 的态度，以及认为新宪制内容有进步，可以接受，但 PAP 并不会放弃继续争取完全独立的决心。并一再强调，新加坡要通过和马来亚合并取得独立。新加坡一定要成为马来亚独立国家的一员，统一是唯一的出路。他话锋一转，即对武吉班让中支联系会议发生的不正常现象作出愤怒的指责。他把是次会议的一切责任归咎于“亲共”分子所为。矛头直指部分左派中委和各支部主要负责人以及左翼工会集团。

李光耀一直认为 PAP 支部与工会乃是一丘之貉，任何诚意都是“亲共”分子的阴谋，不宜相信。这就是由政治偏见引发出误会的

中宣委
的成立

扩张，一切善意和努力都不易被接受。

不久之后，李光耀突然辞去丹絨巴葛议员身份，以试探性测试民意对他在英伦宪制谈判取得进展的拥护和支持，来提高他在党内的威望。他以辞去的席位重新宣布参加补选，角逐者为前首席部长马绍尔，在补选过程中，有不满李光耀的少数极端分子投向马绍尔，向马绍尔示好，并企图利用马绍尔、许春风和吴光明筹组新政党对抗 PAP。他们四处游说，在工会、PAP 支部都有他们的影子，但并不起作用。李光耀补选取得完全胜利，马绍尔中途退出补选，许春风、吴光明自动消声沉寂。筹组新政党胎死腹中。极端分子并不死心，仍在顽强地进行新的尝试。

李光耀怒不可遏地大骂左翼集团的背叛，把极端分子在补选中的活动，错误地归咎于各支部、中宣委和左翼工团。他为自己补选中获得完全胜利感到充满信心，认为人民是支持和拥护 PAP 的。

“亲共”已不足为惧，但不放心，必须划清界线，为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 PAP 纯洁党的队伍，把党的核心权力控制在非共领导的手中，才可以避免英殖民者和林有福政权的横加镇压，PAP 才有条件在新宪制下取得执政的机会。

毫无疑问的，李光耀这一构思在当时极其不利的形势下是有他的道理的，但他把罪责归于左翼集团的背叛，这也是另一个极端。因此，形成党后来的严重对立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只能说一句“痛心疾首”！

为了党的团结反殖，为了消除李光耀对左派日益加深的误会，

左翼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主动找李光耀作解释，并向那些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进行严肃的斗争，但不见有效。情势越变恶化，极端分子变本加厉，不作妥协。李光耀强烈不满，对抗加深，左翼队伍中危机重重，只有那些顾全大局的人，全力以赴地充当吃力不讨好的“说客角色”，把统一团结反殖的重要工作视为己任。委曲求全，决不允许分裂 PAP 的活动在党内兴风作浪。

（八）“奎笼”聚会的真相

1957 年 7 月间，中宣委和各支部在花拉柏支部举行联系会议，商讨如何化解支部和中央的误会，如何促成李光耀对各支部的理解，以及如何应对极端左派在 PAP 和整个左翼队伍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参加者也包括极左派的代表，他们只是列席，但在会上仍然固执地坚持己见。与会者只有极少数人附和他们的看法，但中宣委和支部主要负责人始终坚持原则，站稳立场，拒绝向他们作出妥协。

极左派分子的活动，混淆了左翼集团内部的关系，引起社会上各方势力的关注，舆论界连篇续载散布不实之词，别有用心者乘机煽风点火，英方和林有福当局极尽挑拨之能事，分化 PAP，打击 PAP，置 PAP 于死地不可。令人怀疑，极左派中暗藏的“神秘人物”有可能就是英方派遣的特务，以“反殖打反殖”，在 PAP 内部做到无孔不入的地步。

为了突破这一局面，我们的工作：消除误会，求同存异，解除矛盾，加强团结，力促统一，防止破坏，共同反殖，争取胜利。

中宣委和各支部负责人在花拉柏支部会议上约同有列席会议的两
位极左派代表，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继续讨论双方存在的
严重分歧。我们以为，他们是代表马共的反殖策略的极左思想，我
们必须予以区别，并彻底消除他们的干扰。

讨论地点不宜在公共场所，参加人数只限于中宣委成员（支部
主席、秘书，多是中宣委成员），时间决定在中央第四届选举前，
务必做到 PAP 不受到任何分裂者的破坏，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中宣
委和支部负责人以说服对方为出发点，愿为团结做出努力。如果不
涉及原则问题，决定做出适当的让步和妥协。总之，不能让 PAP 继
续分裂下去。

选择聚会地点，我因与裕廊十八英里渔业工会负责人陈国勤、
陈秋扬（PAP 裕廊支部负责人）是好朋友，也经常被请到离岸几英
里外的渔棚（俗称“奎笼”）吃免费海鲜，对“奎笼”留下深刻印
象。因此，我建议大家到“奎笼”做一次野餐式的聚会，大家非常
赞同。在那宁静的海上渔棚，可尽情畅谈，抒发己见。不同看法，
不同声音，全可保留。但有一个规定：必须保证以不损李光耀的形
象和 PAP 中央委员会的团结统一为前提。

中宣委、支部委员和三位极左派代表约定于 7 月 6 日上午十二
时前往裕廊渔村泊船码头集中，乘搭机动小船到离岸几英里外的
“奎笼”聚会。中午十二时正，所有约定的人都已到齐（朱秀兴同
志有事没到），我们像平时参加野餐一样，准备住一两个晚上，带
足饮食用品，如同度假。丹絨巴葛支部要员钟文灵同志还领着他的

女朋友徐绿娣小姐（现夫人）一起相随，更增热烈气氛。这样一个队伍，公然坦荡，兴高采烈，没有丝毫秘密，更无半点算计，只为一个善意走在一起，要把一切错误的、有害的、不利于团结统一反殖的秽物统统丢到大海中去！

小船开动了，从码头到“奎笼”的海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微波泛起，海浪拍打船沿两边，水珠滴在身上，轻风微吹，格外清凉。我们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抵达“奎笼”海面基柱，向渔工打招呼，然后逐个上棚（实际上是水上木屋）。当徐绿娣小姐走近梯格时，被渔工发现，他们即阻止徐小姐上棚。按照他们的习惯，女性上棚是不吉利的，会坏他们捕鱼收获。要求徐小姐乘原船回去。我一听急了，再三恳请渔工通融，经过诚情的感化，渔工答应先烧香拜神敬佛之后，再行上棚，事情终于顺利解决了。

上了“奎笼”后，如身处另一个天地，这是一间面积不小的海上木屋兼作坊，屋内、屋外分作两个部分，屋内有亚答叶遮顶，除进出之大门外，还有通风窗口，面积约 400 尺，地板光滑干净，衣食住用品简单卫生，排列整齐；屋外同样木板铺地，上无遮盖，面积也有 600 至 700 尺为作业坊，周围用木条建成走廊，宽约 4 英尺，渔工在走廊走一圈又回到原来起点，方便之极。走廊中间，放置着一张大渔网沉入海底，到了一定时间，渔工就把它拉起来，在鱼盛产时节，一网可捞上几百到千斤以上，渔业丰收，渔民欢跃。投资“奎笼”的老板更是笑颜逐开。

必须承认，这种打渔方法，比起旧法划船撒网捕鱼要先进的多，

一间木屋式的“奎笼”，建在离岸几英里外的海面上，确实匪夷所思。它的建造技术，并没有高楼大厦那么复杂，它是以密集纤维的棕榈树干作屋基。这种树干，不怕海水浸浸，耐久而不易腐蚀其身，悍然直立深入海底，不打桩，不用沙石水泥，横放竖起，交叉捆绑，便能长年稳住阵脚，不怕风吹浪打（台风除外）。屋顶是用棕榈叶、亚答叶遮盖的，十分技巧牢实。在新加坡岛的离岸周围，都有“奎笼”分布，马来亚靠近新加坡的南部东岸——丰盛港，此地鱼产丰盛，“奎笼”早已存在，但狂风恶浪一来，多被摧毁。因此，在其它靠海地方，很难见到类似的“奎笼”。

离岸几英里的“奎笼”，都是零星分布在海面上。各“奎笼”遥居相望，互相照应。某“奎笼”突遇大量鱼虾涌入其棚网之时，该“奎笼”彩旗飘起，红灯高悬，急向邻近“奎笼”求助。各“奎笼”一见彩旗、红灯齐升，击鼓作气，高呼呐喊：海阔天空，喜气洋洋。小舢舨齐往助运，把丰收的鱼虾一箩箩般到舢舨上运往岸上市场，交给鱼老板。完毕之后，大餐招待，比过节还要兴奋。

“奎笼”是一间用棕榈树干搭建起来的海上屋子，内外面积共有1000余尺，但周围占海面积很大，整个面积达到5000尺以上。为了把鱼引到棚中央的网陷阱，用棕榈柱排列了两排几百米长的引路线，鱼会欣然地沿着引路线进入陷阱，成为“奎笼”的网中物。

参加奎笼聚会者是来自中宣委和各支部要员，他们是丹絨巴葛陈志诚、刘彼德、钟文灵和当今的夫人徐绿娣女士，武吉班让的黄巩元、许荣华，武吉的吗陈贡元（朱秀兴缺席），花拉柏的王才安、

戴秋声、段文华，巴耶里峇陈木庭、卓中华，女皇镇邢福源等，还有中委吴文斗、陈从今，对方是林戴伟、吴宗泽等三位，若大一个“奎笼”，二十几人聚在一起，仍是绰绰有余。

大家站在“奎笼”走廊和作坊上，海风吹拂，神怡气爽，身处海景中间，心无杂思，一片汪洋，看不到我们登船的渔村码头，宁静的“奎笼”，伏着一个善念——希望经过此次大家聚会之后，换来统一思想的美好收获。

在还没有进入主题活动之前，大家要先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海上魅力。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奎笼”。对这里捕鱼的“奎笼”建筑、设计、布局感到非常有兴趣，还有对那些捕鱼器具和捕鱼技术感到十分新鲜。大家分散游览，各自观赏海上渔屋的诱人美景。遥望远方，前无阻挡，后无障碍，预示着我们这次聚会是顺利和成功的。

观赏完毕，即得到渔工热情招待，他们把捉到的鱼鲜用简单的煮法摆开便宴，请我们大享口福。鱼鲜从海上捞起，生猛活跃，即行加料煮熟，食之味香留齿，感受无穷。不是渔民，恐一辈子也无福品享，我们总算口福不浅之人，得以尝此海上珍品。对渔民盛情招待，我们由衷感谢，至今不忘。

饱肚之后，睡意甚浓，自选休闲。下午六点钟，大家在渔棚屋内，围坐在一起，由我负责主持，摊开所有要商议的问题，征询大家发表意见，不作记录，不作决议，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其次，此次聚会纯属中宣委和支部要员一次愉快的欢聚，商讨的问题，不

涉及任何秘密，为了取得聚会的效果，我们把它当作野餐式的商讨会。

代表极左派思想的林戴伟首先发言，大家意想不到的的是他把这次聚会当作讨论成立新政党问题。大意是说：自 1956 年 10 月 26 日以后，以李光耀为领导的 PAP 已变得软弱无能，对李光耀不能寄予期望。他还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建立一个适应反殖斗争要求的新政党，以取代 PAP 的历史使命。他语音未完，就遭到 PAP 成员的群起反对，激烈的辩论就此拉开序幕了。

聚会序幕拉开之后，中宣委和支部委员，大多数都有发言，意见一致，言出有料，道理充足，对时局的分析，对李光耀个人的影响及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对左派团结的重要性，对他们搞得那一套危害全局的严重后果都作了透彻的说明和严肃的批评。总的来说，对方仍是强词夺理，自以为是。

他们说，筹组新政党不是搞分裂，是反帝斗争重振力量的正义行动，是群众运动被镇压后处于低潮时来一次死而后生的冲击，是要李光耀和 PAP 内部保守派看到人民力量的强大。总之，如果不重建新政党，就要对 PAP 进行一次大手术，注入新血，淘汰旧疾，向李光耀和保守派敲警钟，让他们清醒过来。只有做出果断的决定，才能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左派才会有希望。

对于这些口号式的歪理，决不会是单纯的政治冲动或是表现无知的糊涂，背后有没有黑手，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马共的主张，我们不会理睬。但可以断定，有一股反 PAP 的暗流，在左派的队伍中

翻滚不息，这是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信号。

PAP 建党近三年，一直是新加坡左翼运动的主导力量。不管是李光耀等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界，还是受中文教育的政治领袖或是觉悟青年，他们都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是一个整体，代表着全星人民为摆脱殖民统治而凝聚在一起的强大组织，是英殖民者和他的代理人最感头痛的威慑力量。因此，他们用尽一切政治阴谋从四面八方进行攻击和分化 PAP，为巩固他们的统治不择手段。

讨论继续下去，组织新政党的倡议遭到中宣委和支部负责人的严厉反击。中委吴文斗指出，新加坡左翼力量遭到镇压之后，能挑起反殖大任的只有 PAP。李光耀在新的形势下，提出带有妥协性的对策，是策略上的转移，并不是 PAP 本质的改变，成立新政党无疑是向左翼力量开刀，斩乱左翼力量的团结，挫伤自己。凡真正维护左翼力量的，怎能做出如此令人痛心的事。

中宣委和支部与会人员都提出指责，极左派搞分化，破坏反殖大局，想利用马绍尔、许春风、吴光明建立他们操纵的新政党，摆出强烈反殖的姿态，动摇 PAP，打击李光耀，把反殖斗争推向新高潮，这是一厢情愿的梦想。在当时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谁都躲不过被捕的命运。统治者非常清楚，“10-26”血腥镇压已让反殖队伍付出重大代价：工会已被打乱，左翼力量群龙无首，PAP 内部出现分歧，但不碍大事。如果有人趁机制造对抗，那是统治者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此可以一网打尽。

反对新政党，我和大家一样，首要考虑的是 PAP 的团结，任何

外来的对抗，都予以无情的回击。PAP 成立时，我就是维多利亚台下的一员，而且还带了几十人参加，直至林德宪制选举，我和陈岳英、郑清江协办成立裕廊支部，同时由我和谢奕田、陈世鉴全面负责筹建武吉的吗分部，性质和裕廊支部一样，后改为支部。PAP 从成立到第四届中委选举，我一直是该支部的主席，秘书谢奕田后调补中央委员，由朱秀兴代任。林德宪制选举时，林清祥被推出为武吉的吗候选人，分部筹建尚未完善，就投入火热的竞选活动。林清祥以他的无私奉献精神感动广大劳苦大众，感动了所有热爱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新加坡人。他终于被选为 PAP 武吉的吗立法议员，作为武吉的吗分部（后改为支部），怎不为此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呢？

我和 PAP 一开始就有着如此密切之关系，把党视为是被压迫者寄予的希望。因此，对分裂党的任何企图是决不会无动于衷的。所以，我也作了发言。

指出：首先，成立新政党是不智和带有分裂性的行为，后果十分严重；第二，新政党的对象人物，是政坛上的投机政客，是著名的政治垃圾，与之合污，必遭其害；第三，PAP 的反殖作用，依然充满生机，党员和人民是支持 PAP 的，李光耀不会改变他反殖的一贯政策，他只会改变他的公开立场；第四，被镇压后的左翼力量，需要养生求息，静观形势，排除干扰，以存异为忍，以团结为重，要把顾全大局放在第一位；第五，英国虎视眈眈，林有福摩拳擦掌。李光耀被迫与左翼力量摊牌，英国趁机而入，林有福再施毒招，局

势会变得更乱；第六，第四届中委选举结果，关系到对李光耀重建信心的考验；第七，左翼力量遭受严重打击之后，重振旗鼓已不容易，一切分裂 PAP 的言行，必须予以制止……

我言犹未止，对方已知道成立新政党无望，即刻改变口气，要求保留意见。但有新的建议，就是向 PAP 动大手术，改变 PAP 领导层，把大权掌控在左翼手里，为主导大局发挥作用。

很明显，他们可以放弃组织新政党，但必须改变 PAP，把 PAP 变成新政党的模式，使 PAP 操纵在所谓左派的手里。这是一场变法的游戏，但从表面看，似是有所让步。

既然是要向 PAP 动大手术，我们只能迎接挑战。他们要当医生，我们不接受。他们提出每个支部派出两名候选人，确保第四届中委不落在保守派手里，我们更坚决反对，又是一场无休止的争论。最后，中宣委和支部要员果断决定，在物色人选方面，不许外力参与，只能在各支部择优而任。以资格最老，工作能力最强，有群众基础，在李光耀和中委会所熟悉的老党员中选出，其他意见可以保留。

人多势众的决定，对方只能默许认可，中宣委和支部委员即行推举三名候选人参加第四届中委选举，他们是陈世鉴、王才安和陈贡元。三位候选人面对极左思想一再给 PAP 制造困难而挺身说话，在不同的场合发出共同的心声，批评或回击一切破坏活动。成为捍卫 PAP 的中间支柱。因此，受到中宣委和各支部的信任、支持，在犹豫不决中，做出不辜负大家重托的决定，敢以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第四届中委选举。这就是中委候选人推出和产生的实质及过程。

为了缓和左翼队伍中极左思想的干扰，我们并没有对原中委的人选有异议。三个新的候选人并没有把握一定会中选，PAP 对非共领导的去留都非常关心，王永元是理财能手，但和基层组织关系一向不好。有不少人认为王永元不宜再被选为中委了，但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

经过一天一夜的相聚，吃、喝、玩、乐，生活小事，反殖大业，无所不谈。当然，任何怡情的兴高采烈都会为我们面对的坦然大事让步。我们没有忘记“奎笼”聚会的深刻意义，中宣委和各支部重要成员一定会更加团结在以李光耀为领导的 PAP 内部，发挥左翼力量潜在的反殖优势，取得宪制斗争的彻底胜利。

第三天午饭后，我们把没吃完的自带食物和饮料都留下来，不是作为回报渔民的礼物，我们感谢他们的招待，内疚地打扰了他们一天一夜，深深地向他们致以歉意。

船慢慢地朝着原来的水路回归，各自回家，谁也没想到这个聚会日后竟然被污为一次马共地下的秘密会议，又是政变夺权的阴谋。这是历史的笑话，也证明历史可以编造、可以无中生有。

“奎笼”聚会决不是什么秘密会议，它是公开的，坦诚地，无私的，有人把它神化为共产党的地下会议，是一次有组织，有阴谋的夺权活动，这是错误的，是虚构的，是别有用心的。有缘于该次聚会的老朋友，尚有人在。以明哲保身，回避不谈，情有可原；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极尽挑拨之能事，则另当别论。那些不明情况的人，都是人云我云，信口开河，误信他人，误导自己，还要污染

别人的思想。那是无知和可怜的应声者。还值得一提的是被李光耀封为“马共全权代表”的方壮壁先生向李光耀说的一句话：“他们搞的那一套（指“奎笼”聚会），我们是不赞成的。”这句话，印证了“奎笼”聚会是 PAP 内部名正言顺的座谈会或称为商讨会，与任何政党和组织无关，无需局外人参与，也无需外人赞成或不赞成，方先生已作古，我不能在此多加评述，只略作回应。

更为滑稽的是抗英老前辈余柱业先生在他的口述回忆中以马共前中委身份作了极不负责任的指责，说他们“不同意我们的夺权行动”。还说我们是“愚蠢”的，是所谓“自称左派”……他忘记了 PAP 是一个反殖的独立政党，不是马共的外围组织。PAP 内部政见的分歧，是必然和长期性的，马共不是左翼阵线的全权代表，他是马来亚（新加坡）人民崇拜的偶像，因为他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

余柱业先生身为马共前中委和新加坡抗英同盟的领导出言如此轻率，他没有权力指责我们是“夺权”、是“愚蠢”，也没有理由说我们“自称左派”，他凭什么身份信口开河，轻蔑 PAP 反殖左派的献身精神。我们的愚蠢是力促反殖团结，我们的左派不是自称的，他是客观存在的一股强大的反压迫力量。他所说的“自称”是指我们是假左派，他才是真左派。马共内部有真假左派，而 PAP 只有激进及温和思想，李光耀把党内的激进思想看成是“亲共”，是左派中的左派，决不会有假左派或是“自称左派”。余柱业不作调查，不明情况，把“奎笼”聚会的良好动机和取得共识的成果说成“愚

蠢”，把陈贡元和吴文斗说成是“夺权”的主要负责人，又说陈贡元是客家人……

我（潮州人）不禁感到好笑，余柱业被公认为是反帝斗争的老前辈，竟然也会罔顾事实、胡说八道，更何况是其他人。余柱业先生在北京时，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访过我几次。那时，他自称姓章，是沙尔玛先生的好朋友，他想听听我对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马盟）驻京公开活动的意见。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只是闲聊，当作是马共接近我的一种方式。我不认识他，直至他回新加坡，报刊上有他的相片，我才想起他就是余柱业先生。后来沙尔玛先生和他的家人也证实章先生就是余柱业。我们有这段机缘，却不能开诚布公说真话，要在别的场所发表无中生有的看法。还有人说，这是“搞政变”。所谓“政变”，指的是夺取政权。PAP 当时不是执政党，只是反对党，党内领导层的更换，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大家所面对的是残暴的统治者，共同的敌人，受威临危，饱经迫害，手中无权，又何来政变？

事实根据是：第一，“奎笼”聚会的参与者全是中宣委和支部的重要成员；第二，这些成员均担任 PAP 支部的重要职位，在不同的岗位上大家都有密切工作联系，是党内公开合法活动的同志；第三，参加聚会的成员除有讨论 PAP 的事外，多抱着观赏海景和联络感情的心态畅所欲言；第四，三名极左人士不是 PAP 党员，他们是局外的活跃分子，不可能在 PAP 内部起作用；第五，所谓马共高级领导的重要地下秘密会议，全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马共自转入

地下后，一直处在白色恐怖包围下，PAP 中宣委和支部重要成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反殖者，谁也不会也不敢公开自己是马共人员；第六，党内搞政变决不会是秘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我暴露岂不是自投罗网？任谁也不会当傻瓜。

再说代表极左思想的三位人士是学界的活跃分子。林戴伟就读华中，五七年高中毕业，离校后就参与工运，始于全星，后于泛星，PAP 面临关键时刻，他积极活动于工会与支部之间，他想改变 PAP，但他无能为力，他想推动组织新政党，但没有市场。1957 年 8 月 22 日，在大逮捕中被捕，1958 年 9 月 16 日被驱逐出境。另一位吴宗泽，是南大生，没有听说参加任何活动，但对 PAP 颇有看法。在讨论会上，他是主张向 PAP 下重药，对组织新政党乐而不疲，还有另一位记不起他的名字，也不知其详。但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同属反 PAP 的。在大逮捕中，吴宗泽和该不知名人士并没有在逮捕之列。

（九）中委选举一分为二

“奎笼”聚会之后，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筹备第四届中委会选举的工作中，中宣委和各支部并不理会极左思想的干扰，照着 PAP 规定中委选举的方法开展活动。这时候，有一些不太熟悉的人分别到各支部申请参加 PAP，为他们提供中委候选人的资格或力促中委选举的“顺利进行”。言词诚恳，目的不纯，多数支部婉拒他们的要求，不遂他们达成心愿。

另一方面，李光耀对中宣委和各支部维护 PAP 内部团结、统一

的诚意和决心一直持怀疑态度。他以非共、“亲共”一分为二的辩证机械论定性，使中央和支部的误会越来越深，一直发展到中央选举当天出现不正常的场面，有舆论宣传 PAP 为“亲共”的激进派所控制，作出如此挑拨性的报导，其目的就是制造分裂，把李光耀推上与“亲共分子”彻底决裂的边缘，削弱统一反殖的力量。

其实 PAP 建党三年多，一直被视为新加坡左翼运动的中坚力量，是英殖民统治者最为担心的“马共外围组织”，他倾注全力，除了血腥镇压之外，以左治左是最有效的方法。一般而言，党内意见分歧、思想矛盾，并不构成党内分裂的危机。1956 年 10 月 26 日后，左翼力量受到摧残，工会、群众组织、社会团体的大部分领袖被捕的、被捕，躲避的躲避，PAP 有三位中委被捕，但并不影响 PAP 反殖斗争的持续性。为了在混乱中得到养息，党的统一团结就是党的生命，捍卫党不被分裂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惜的是：左翼队伍中尤其是工会方面出现了不少新面孔的积极分子，他们是这个时期最敢于冲锋陷阵的“勇者”。1957 年 3 月底，他们以工会代表的名誉纠集了十几个人到 PAP 总部向党主席杜进才和中委责问党的立场，以要胁的口气促 PAP 中委表态。组织秘书王邦文把他们这次的行动称为“是向中央施加压力的亲共分子所为，”并把事件经过向正在英伦参予宪制谈判的李光耀秘书长汇报。李光耀回星之后，大发雷霆，决定与“亲共分子”划清界线。不管在任何场合，他不放弃对“亲共”的指责。在争取民意支持新宪制的补选大会、中支联系会议、接见记者的采访、举行记者招待会、

接见外国访客和各种活动的讲演会等场所，“亲共”是他攻击的主要对象。其目的是要把 PAP 控制在其认定的“非共”手里，将“亲共”分子从第四届中央选举中踢出局。

PAP 第四届党员大会订于 1957 年 8 月 4 日在羽毛球馆举行，按照常理，在大会召开之前的半个月，各支部都会收到中央发出的党员入场证。但我们武吉的支部一直到大会召开之日，仍没有收到一张入场证，连我作为此次大会中委候选人，也不见入场证的踪影。到底怎么一回事？潜伏在支部里的特务？内奸？别有用心者？种种迹象显示：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开始时，我还以为，我是中委候选人，不需入场证的。后来支部的党员都来找我，我才开始警觉，这是一个阴谋。那位后来成为国家发展部高级次长的武吉的支部执委曹煜英先生所说的选票被“亲共”暗中控制，发给支持自己的人——党员和非党人士。我感到奇怪，他为何如此断言，莫非为自己之所为欲盖弥章。

我在会场门外，看到不少我认识的支部委员，他们的情况和我一样，徘徊在会场外，都说没有接到入场证。此时，我看到李光耀秘书长和杜进才主席正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我即刻走上前和他们握手，并告诉他们我没票进场。李光耀即刻叫我跟他一起进去。这时候，我才真真正正地进入会场，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看到周围并没有坐满人，但基本上场面还是热闹的。再往台上看，那里坐的是李光耀和第三届所有中委，随后，杜进才主席主持大会，宣布第四届全党大会开幕，并宣读参选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候选

人听到呼唤自己的名字，就直上主席台的一边站着。当主席宣读完毕后，我即感到形势不对，参加中委竞选的新候选人有 20 几位，有多位是我不认识的。我已意识到这是 PAP 中委决裂的前奏。我不希望自己在本次参选中获胜，我希望自己能置身度外。

“奎笼”聚会达成维护 PAP 内部团结的共识，并没有真正得到极左派的支持，大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新候选人面孔，很多是我们不认识的。从今、文斗、才安、世鉴和我过后一提起此事，都感到内有蹊跷，值得深思，但李光耀和杜进才等人混淆了我们内部的另一面，等同视之，不问青红皂白，指责我们是“夺权派”，这是大错特错或另有用意。

第四届中委会选举结果，王才安、陈世鉴和我都中选了。王永元、潘铁人等被除名，另一位中选的新中委是妇女部主席陈翠嫦同志。第二天，本地各传媒和国际上各大通讯社都突出报导新中委名单，并把他们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两个阵营。PAP 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分裂危机。我们将首当其冲地去迎战一场暴风雨式的残酷镇压，但我们不逃避也不放弃用宪制斗争的手段去实现新加坡的独立。

PAP 被人为地分为两个阵营。在第四届中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前，也就是新中委选出之后，各地传媒记者到处找我们采访，我们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也尽量避而不见他们。正是为了不给他们有机会制造 PAP 内部分裂瞎想。我们不认为一个具有强大组织、有广大群众基础的 PAP 会被一班各怀鬼胎的外界搞到天下大乱？PAP 内

部存在政见上的分歧早已发生，但不影响整个反殖大方向。这次出现的局面，已不是误会那么简单，而是矛盾的升级。但是我们还是以诚恳、避嫌作努力，使矛盾尽可能化解于无形之中。因此，我们积极地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持不同政见的中委频繁接触，进行沟通，向各支部大力宣传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并同个别有影响力的工会知名人士，如市政局工会主席黄国光先生联络。黄国光是黄循文的父亲，长期以来和 PAP 各方面保持良好关系。由他出面，消除误会，是好人选，但是，我们的良好愿望落空了。

第四届中委会第一次会议在丹絨巴葛总部召开，全体中委都有出席。会议一开始，李光耀二话不说，即提出不担任该届秘书长职位。接着杜进才也提出相同的意见，并建议由 TT 拉惹、陈从今、吴文斗三位原中委和新当选中委陈世鉴、王才安、陈贡元担任新的重要职位。这突如其来的、意在公开分裂党的团结和另有所谋的大行动，使 PAP 的上空布满了滚滚乌云，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全党的团结，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我们当场宣布：李光耀和杜进才是党的创始人，他们在党的领导地位、领导才华、威信和声望是任何人无可代替的。我们坚决拒绝在党内担任领导要职，力劝李、杜二位为党的全局利益考虑，为反殖统一思想而抛弃一切政治偏见，继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目标而作出贡献。我们的劝说引来对方的怀疑，错误地认为我们没有他们的保护就必然会变的更加紧张。李光耀说：“PAP 不能成为亲共分子的保护伞”。直言不讳地把新中委和

原三位中委说成是“亲共分子”，使我们的处境更加被动。

“亲共”是带有非法性质的代名词。只是“亲”还不完全是“共”。但已成为共产党的近亲，株连所至，近亲必遭其殃。

但我们仍然以大局为重，李光耀态度强硬，我们却以妥协的诚意千方百计地缓和党内突发性的紧张关系。我们表示，只要李光耀同意继续出任党的秘书长，我们愿意接受他提出的任何条件。但李光耀意有所决，坚持己见，决把 PAP 划分为“亲共”和非共两个阵线公诸于众；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李光耀此举，令人感觉到他是在出卖自己同志，或是借用英殖民者和林有福傀儡之手来清除党内异己，为纯洁非共队伍扫清道路。

不少人认为，李光耀是利用林有福政权为自己打开清理门户的障碍，8—22 的大逮捕行动正是英国人借机出手代劳的阴谋。李光耀虽背上这个黑锅，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主要原因应是非共理念转为憎恨“亲共”的思想，把“亲共”视为马共的替身；其次失去一位最信任又能干的亲密助手王永元先生而感到自危（后来成为他的政敌）；第三是“亲共”势力的离心表现是他所不能容忍的；第四是不与“亲共”划清界线，迟早逃脱不了被共产党利用的“罪名”，也许会一起遭殃。不如早作决定：“春花秋水两分明，要为冬夏见寒暖”。这就是李光耀当时坚决不肯出任秘书长的内心思索。

第二次中委会议继第一次会议之后不久举行，地点仍在丹絨巴葛总部。主要议题是继续讨论推选中常委和确定党今后的工作方向。在继任方面，我们所显示的诚意，李光耀终于说出他的感受，

他说出拒绝继任秘书长的原因，主要他失去一位有力的助手，他不可能把王永元再请到中央来。说到这里，我即行表态，愿退出中委由王永元补上。但李光耀反对，认为这是党员大会的决定，要尊重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不能随意改变党员大会通过的决议；还说由新的中常委领导的 PAP 将会焕然一新，也许会对党务的推进发挥更大的作用。李光耀话中的意思是要我们出来收拾残局，成败兴衰，他心里有数。杜进才和其他被视为非共中委也明确表示赞成李光耀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双方各执己见，但又不能不解决。我们以党的团结为出发点，向李光耀表明：我们可以担任党的中委重职，但党的主要领导工作还是要靠大家集体领导，尊重李光耀和杜进才的意见。最后，终由会议选出第四届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是：

主席：陈从今

副主席：陈贡元

秘书长：TT 拉惹

副秘书长：陈世鉴

财政：王才安

副财政：吴文斗

委员：李光耀、杜进才、吴秋泉、陈维忠、陈翠嫦、

阿末依不拉钦

中委会有了结果，但我们已有面对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的预感。因此，我们即向中委会提出尽快完成以下各项工作任务：第一，努力做好各支部的团结工作，在未设立支部的其它选区积极筹备建立和发展更多支部，以应付即将举行的市议会和立法议会选举；第二，我们会以实际行动消除与李光耀之间的深刻误会；第三，重大

的对外事务由李光耀继续发挥关键性作用，我们会尊重他的意见。我们为党的奉献诚意深深地打动了在座的其他委员，但李光耀并无所动，他作了简短的发言：希望新领导做好工作，以党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纲领为目标，以和平的宪制斗争，为实现星马统一独立而奋斗。最后又强调：他要与“亲共”划清界线，不愿成为共产党人的保护伞。

很明显，他在重申自己的立场。但我们必须严正声明：反帝反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的理想。什么是共产党或是“亲共分子”，我们都沾不上边。PAP 队伍中有哪些是共产党人？有什么特征？谁是领导？谁又是被领导？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言论、行动，是不是和共产党有相似之处，我们也不明白，但我們是最忠实的 PAP 党员。

确实，共产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更成为与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势均力敌的抗衡力量。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和人民翻身解放的希望。共产党的威信像潮水似的高。我们是火热青年，追求社会的改变，要求进步，反对压迫、剥削，要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解除贫困，实现美好理想社会，是我们强烈的愿望。因此没有理由不对共产党寄予希望。

PAP 的成立，发表宣言、纲领，和亚非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是有许多共同之处，都受到国际共产主义有力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马共长期坚持的反帝武装斗争早已在新马人民心目中树

立了英雄形象，但她不能像 PAP 一样公开地进行活动。人民把支持马共的倾向转移到新生的 PAP 身上，成为 PAP 拥有庞大群众支持的坚实基础。PAP 的“亲共”力量就是来自人民长期支持反帝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先进人物和中坚分子。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政治部滥捕和追杀，迫得他们更加隐蔽自己的身份。亲共思想确实存在，但共产党员不会现身示众，一切号令不可能成为“亲共”思想的统一行动，而亲共思想也只是历史的产物。

在担任 PAP 中委的十八天里，我们虽做了一些工作，但不值一提。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并没有做出任何损害党的团结和利益的事。相反的，我们全力以赴地推动支部的发展，避开所有传媒的追踪，建立互信、团结的统一新章，主动和自觉地阻止了误会的深化。当我们被迫接受中委领导之后，记者们不断打电话和涌向 TT 拉惹的办公室，要求我们接受访问，还希望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和宣布我们今后的任务和行动。TT 拉惹和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并权衡再三，认为接触记者透露党内情况或作出任何草率的决定都会给党制造混乱。我们认为，党领导的更换绝不是党的分裂。我们决定不见记者，继续保持沉默。我们不是怕见记者，而是不想给他们有机可乘，利用我们的讲话，散播不实之词，制造误会，深化矛盾，使 PAP 陷入永无休止的分裂状态。

（十）揭开“夺权”的秘密

接任 PAP 中委领导，工作还没有开展之前，新闻铺天盖地横加

报导和各种捕风捉影的消息接踵而来，令人“神往”的是那些想像丰富的老编评述。把 PAP 内部出现的小变化描写的天花乱坠，神笔一挥，一场触目惊心的阴谋故事让读者眼花缭乱，大感困惑。什么“奎笼会议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高层会议，图谋夺取 PAP 最高权力”；什么“亲共夺权政变成功”；什么“李光耀和夺权派划清界线”；什么“激进派将会倾注全力推行亲共政策”……如此报导和评述，正合李光耀之意。实际上，李光耀并不认为这是党内不同政见引起的分歧，而是“亲共分子”蓄谋已久的“夺权”斗争。公然宣布：“夺权派”要为其冒险行动自食其果。

我们的良好动机是无可怀疑的。说我们是“夺权派”，为什么我们拒绝接受担任党的要职和自愿退出中委名单？为什么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为什么不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的主张，提出和党相左的意见？为什么不通过社会舆论为“夺权派”制造声势和影响？为什么不从巩固和加强已夺到的权力成为事实考虑而大作宣传？为什么要向被夺权的党内领导作出十分恳切的挽留努力？为什么“夺权派”在最关键的时刻不忘党内团结统一的重要性？为什么对李光耀多方指摘只有解释而不作反驳？多少个为什么？不管从哪方面说，都看不出有蛛丝马迹的“夺权”野心。

再说，“夺权”是要有条件、能奈和本钱，我们没有这个资源。我们凭着是一股热情和善意，党内有争议、分歧、误会，我们以妥协的谦让，力求缓和、化解，努力促成共同对敌的统一思想。

我们不会把李光耀看成敌人，我们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战友和朋

友。除了极左派和那些极端反动的邪恶势力外，没有人会反对或打倒李光耀，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李光耀是一位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对事物也有超乎常人的看法和思想的人。正常发生的事都有可能成为他追踪的“异象”，而且会把想象中的“必然”作为他的定论。

职业性的无敌律师是建立政治功业的雄厚资本。无论是办理案件或是涉及自身的社会活动，他都不背离主观定位的原则。

李光耀的聪明超过了他反对“亲共”的局限，他能把矛盾转化为引起虚假性的猜测和错误的历史视线，把“亲共”化为激化矛盾的“夺权派”。将矛盾提升到对抗的深层次而成为历史上正反两面的分野，清楚表明企图夺权的“亲共”冒险主义者在历史上永远不得翻身，不管你曾经为党作出什么贡献，你无法在党的历史上清洗被涂上的污点。

回顾一下历史的事实，“夺权派”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PAP 是在殖民政府的“民主宪制”下公开活动的政党。党的领导机制是通过党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任谁也没有权力做出废弃党员的决定。PAP 虽存在不同的政见分歧和思想斗争，但民主政治产生出来的中委会都是代表全党的利益的，谁能夺谁的权？唯一可能的就是占有优势的一方把自己认为是异见分子清除出去，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再将“夺权派”的罪名套在无辜者的身上。

PAP 中委会一直是以李光耀秘书长为核心，由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精英组成的。党内有不同观点和政见是正常的现象。“夺

“夺权派”一词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许多人信以为真，不少人受尽蒙骗，可见发明“夺权派”这一招数的高超和政治效应的深远意义，不管李光耀出于什么想法，那些图谋不轨的却另有思处，人们都会认为：第一，化“亲共”为“夺权派”，突出党内矛盾，有助英国和林有福当局向左翼“亲共”开刀提供方便；第二，以“夺权”为借口，清除党内持不同政见的忠实者、分裂党的统一组合，建立和强化对党的权威性控制；第三，虚构“夺权”罪名，突出党的正面形象。重新整合党的组织，统一认识，加强团结，严控再次出现新的反对力量；第四，制造猜疑与误会，一劳永逸地消除左翼“亲共”势力死灰复燃；第五，“夺权”就是对抗行动，PAP的成功历史将会把这些反面人物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要他们承担一切反殖的错误。

简而言之，虚构“夺权派”之事是政治手段的一项阴谋。那些不分青红皂白、随意附和的人士请不要忘记，墨写的谎言终究掩不住历史的事实。

一个政党内部不可能会有完全统一的意见，分歧、矛盾、甚至是分裂和分道扬镳，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PAP内部不同政见者的关系是统一在一个共同反殖的信念上，大敌当前，并肩作战，全力以赴，义无反顾。英帝的魔爪，代理人的血口，随时要把我们吞噬。在此恶浪的环境中，党面对的是共同敌人，“夺权”之说，全无根据，诬陷之实，一目了然。

李光耀认为“亲共”是和受中文教育分不开的，是那些讲华语

和方言的华人占绝大多数，受英文教育的马印民族和占有优势的殖民地官员，他们是不会认同“亲共”的。我们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通过宪制斗争的各族人民一定要有统一的共识，才能从英国手中和平接管政权。所以我们对受英文教育的中委是尊重和寄予厚望的，并不是什么排斥、“夺权”之类的虚说。

第四届中委选举结束后，中常委的组成是在大家互让的气氛中产生的，谁也没有“夺权”的野心。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亲共分子要夺权”的一段记述，提到他们“不当党内要职”，我们“变得紧张不安”。这是对我们的误会和轻蔑。事实上，我们非常清醒，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不惜牺牲自己，敢于承担责任，避免党内不同意见变为对立，防止那些对 PAP 诸多非议的极左思想干扰，以及英方和他的代理人从中破坏。我们决定立场分明地维护 PAP 的稳定大局，同李光耀保持一致，同党的统一行动保持一致，共同反殖。什么“夺权”？什么“野心”？什么“不安”？完全没有关系。中委会是 PAP 的最高决策机构，李光耀请辞不继任秘书长职位，部分中委也自愿跟随，我们却费尽心力恳切挽留，自愿退让，寻求共识，试问，世上有如此谦恭的“夺权”吗？有这样善良的“野心”吗？

李光耀认为我们没有他们的“掩护”，我们就会紧张不安，忧虑被捕。这是对我们的错误判断。我们是 PAP 建党时期的参与者，决心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奉献一切，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不顾个人的安危，在参与反殖的历史时期，我们没有什么忧虑和不安。我们最担心的是 PAP 领导层会被镇压，党的领袖被捕坐牢，党的组织被

削弱，反殖运动倒退，甚至被破坏，劳苦大众又陷进水深火热的苦海之中。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我们最大的忧虑和不安。

我们被诬指为“夺权派”，是对我们人格的伤害；污辱我们的尊严；扭曲我们的正义心；抹黑我们对反殖事业的忠诚；否定我们的贡献。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鸣冤喊屈也无济于事。但我们的清白是抹杀不了的。在我们那个时代，在那短暂的历史时刻，我们无愧于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反殖斗士，我们永不言悔！

（十一）8-22 狂风扫落叶

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镇压行动，由英殖民者及其傀儡林有福政府早已布署完备，只是在等待时机和选择最佳的时间下手。PAP 内部被宣染成两派分野，正好中了他们的胃口，但他们仍取观望态度，不及时行动，继续注视着我们的“表演”。

包括李光耀在内的被形容为温和派的中央委员心里都很清楚，所谓激进派的新中委正在努力为党的团结奔跑和做大量工作。但他们认为这些工作是“亲共分子”为壮大自己势力和巩固领导地位的必要行动。这种怀疑和偏见在他们心中早已是根深蒂固，任谁也不能改变。被指为“激进派”的新中委无可奈何地去接受这个“事实”，期待着傀儡政权在强大的反殖力量面前不敢轻举妄动，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消除党内存在的误会和矛盾，有信心地促进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为已经取得自治的宪制斗争，在即将到来的市议会、立法议

会的选举中做好一切工作准备。

与此同时，受最严重镇压，处于群龙无首的左翼工会经过重组之后已恢复了正常活动，以泛星工联为主力的强大工会组织非常活跃。他们不断地扩大左翼工会队伍，还对由劳工阵线一手扶植的新加坡职工总会进行争取团结的工作，有意把他们统一在左翼工会的旗帜下，把林有福政府唯一的“群众基础”争取过来。左翼工会的强大攻势是林有福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一方面，他私约拜把兄弟职工总会主席李友成伪装“诚恳”和泛星取得某些默契；另一方面，他迫不及待地 and 英方主子密谋，策划对那些被指为“亲共”的 PAP 中委和支部要员以及左翼工会的主要人物进行全面性大镇压的部署，阴谋来个狂风扫落叶的大行动。

1957 年 8 月 22 日上午十点钟以后，政治部人员手拿着一叠叠“黑名单”，分批分队地守在工会附近和通往 PAP 支部的路口，堵截被列入逮捕名单的人物。我于当天下午七点半在一个不显眼的隐蔽路口被突然袭击，几名便装大汉不由分说地把我包围起来，问了姓名之后，就强行把推进停在一边的小汽车里，朝着僻静阴森的汤申律方向奔驰。一路上，静无人影，难见有车，夜色笼罩，一片漆黑，我犹如被绑架似的在路上转了几个小弯，才到了汤申律警察拘留所。我一到达拘留所的大堂就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全是 PAP 中委和支部要员以及工会领袖。他们都比我更早时候被捕。看到他们，我已意识到一场新的大镇压行动开始了，反殖斗争的左翼进步力量又要经受一次严重的浩劫。思想上还来不及冷静思考其它问题，分

批分队的政治部人员似乎都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一个又一个的被捕者接踵而来，直至凌晨六时，才把大家分别押走。大部分都被送往漳宜监狱，我和吴文斗、林清如、林戴伟等被关进中央警察署，这里是制造恐怖和血腥的人间地狱。

一间只有六十平方尺的小房里，墙角上有个不到一平方尺的小窗口，挂着一盏小灯泡，略有微光，可以看到窗外是白天或晚上。看不到天和地，不知晴和阴，感觉上，地球似乎停止了转动。房里阴森恐怖，湿气笼罩，冰冷的墙壁和地板，水泥粗糙的睡床，只有一尺半宽，五尺长的面积，睡在上面，小个子尚可摆动，大个子翻身不得，冰寒水泥的石墩，没有枕头被单，空无一物，卧身而眠，躯如贴冰，冷冻的蜷缩一团，难以入睡。

在这人间地狱的小房间里，我是独囚的“重犯”，但又有 PAP 副主席的“光荣衔头”，我没有受到肉体上的折磨，但却受到精神上的虐待，如“享受”着来自各种恐怖的尖叫和凄惨的哀嚎，听到穷凶极恶、恐吓、辱骂、施刑和击打的残酷声音，“分享”着与世隔绝、原始孤静、不知外界世事的精神苦脑。关在这里，门锁紧闭，留一活动小方孔，由狱卒看到房内的动静。吃饭、大便都在房间里，每到下午，有 15 分钟可在走廊自由活动，俗称“放风”。在这人间地狱的小房里足足呆了一个半月，不提问，不接触，不给探监，不给书报，体重从 170 磅激减至 127 磅，足见这是个最好减肥的“天

(附一)

不会遗忘的记忆

不审、不问、不刑地把我送进漳宜大牢，并不是对我手下留情或是特别宽容，更不完全是我前面所说的政治身份问题。事实上，他们早已把对付所谓马共嫌疑份子的一切酷刑施加在我身上。在他们的记录里，已是一名真正无料可取的“无产者”。他们不想在我身上多费功夫。

1954年初，我在中正中学租了的小档口，请厨师，卖叻沙、马来小食、粉面等……在此期间，社会上各阶层人民都在为各种不同的利益向英殖民政府提出诉求。有争取华文教育应有权利的各种建议；有进步刊物反映不满现实和涉及时弊的论述；有工人争取自身权力的形形色色大小组织和罢工；有学生参与和关注社会上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态，并在校内校外形成一股带有浓厚色彩的学政气氛。我是个小贩，又是长期打工，社会的不平已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也不例外地和大家一样，关注着自己在本职上的切身利益问题。

中正中学位于加东区月眠路，共有学生和教职员工三千多人。校舍围绕着中正湖四周，课堂和宿舍分离不远。经营饮食档的小贩却在两个不同地段，合共有三十多家档口。大业主是新加坡绿色巴士车董事长莊伟磷的胞弟莊德磷，他以高租和刻薄的条件不断向小贩索取额外费用。贼眼式地盯注小贩的收入。一发现哪个小贩生意好，他就迫不及待地猛加租金，把小贩压得透不过气来。

向着无理迫来的压力，谁也无法忍受。原来是各自为利的小贩也不得不团结起来，对准大业主开展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不影响学生的正常消费，小贩们搬到室外继续经营，并把营业收入全部捐给陈六使发起筹办南洋大学的费用。这一行动，得到全校师生和附近居民的大力支持。他们慷慨解囊，出钱出力，不少人当小贩帮手，加倍献捐，筹得款项数千元。但却引起大业主和校方的注意。他们向政治部告密，说学生利用小贩闹事，小贩当中也有闹事的筹划者。不久，政治部便衣人员不断出现在校外的周围，盯注、跟踪，把哪些活跃于支持小贩的同学和我都列入黑名单，作为马共地下嫌疑份子的追查对象。

接着不久，全新中学生为要求免服兵役而展开斗争。华中、中正，是全新男女中学生集中抗议该法令的两大汇集点。当时，我们中正中学的小贩已组成一个合作班，为小贩的互利而团结在一起。对于学生采取的抗议行动，我们无条件地大力支持。集中的中学生有男有女，人数几千人，来自社会的各阶层人士包括学生家长源源不绝的捐款并送来大批食品和粮食到学校。我们小贩自告奋勇，为他们三餐充当火头军。备粮买菜，煮炒做饭，乐而为之。我们成为学生们的知心朋友。

政治部的便衣人员像老鼠一样地窥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把我和学生的关系看成是和马共的地下活动有关。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有神秘的人物跟踪。我感到处境非常不妙，学校是一个政治非常敏感的地方，校内师生当中有少数原中国国民党党员和不喜欢学生

搞事的人，他们从中挑拨离间和进行威胁，企图破坏学生的抗议行动。有一天，校方的教务主任陈诗豪，据说是原国民党党员，到小贩档口亲自找我谈话，要求我们停止为学生当火头军，回复正常营业，否则大业主和校方会停止我们的租赁关系。我没有答应，对方却以政治部随时会向我下毒手为威胁。我已明白对方的来意，也自感力薄难为的处境。当学生的抗议行动得到全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胜利在望的时候，我在政治部的紧跟下接受承包焊接大油管工程，前往马六甲地榜村工地，避开了新加坡政治部的追踪。

约三个月时间，工程完毕，我又回到新加坡。只有几天，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凌晨一点钟，和朋友分手回家时，未到门口，就有七八名华巫印大汉突然冲到我面前，不由分说地把我双手往后一叉，像重犯地把冰冷的手铐扣住我双手。随即把我推到门口猛力敲打破旧不堪的大门。正在熟睡中的父母不知发生什么事，紧张地起来开门，一看到门外是一群武装警察和便衣人员以及自己儿子如罪犯似地被挟押在两个警察中间，几乎被吓呆了。父亲是个硬汉子，紧张过后，明白这是什么事，镇定以待。母亲未见过世面，几乎吓晕过去。稍醒时，她感到是灾难降临，流泪大哭，我为之鼻酸，默不作声。

警察进屋，厅房是破烂的木板墙，都是用旧报纸粘着盖住。警方怀疑报里藏有玄机，下令全部撕烂。木床旧柜，桌椅书架，全被翻开。屋里屋外，无一不搜，无一不查，形如劫匪，强盗行为。全屋搜遍之后，彻底无料。他们转向离屋的小厨房、柴房、猪栏、厕

所搜索。每一个角落，屋顶都掀开，结果终被他们发现了“证据”。搜出了十六本被禁止出版的月刊——《荒地》和一些改编的中国革命歌曲。他们前后骚扰了两个钟头，如获至宝地宣布收兵。全屋和屋外周围已不成样子，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怒不可遏，奋不顾身地拦住那些穷凶极恶的走狗们，要他们把被翻乱一团的大小物件整好。父亲的突然行动，激起他们蛮不讲理的回答：“别阻拦，否则对你不客气”。说完，把父亲大力推开，气势汹汹地把我带到停放在路口的大黑车后门。两个警方大汉分别把我压在坚硬的地面上，一个拉脚，一个拉手，像抛沙包似地把我丢上车箱。我感到一阵激痛，挣扎着坐起来，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场恐怖恶运。

车一启动，坐在我前面的三个便衣华警，似笑非笑地把我怒目而视的表情看成是一种挑战。速如闪电的一拳击伤了我左眼。我双手被往后扣，即无设防也无抵抗能力，俎刀之下，我为鱼肉。我的表情满是愤怒，不出声，咬紧牙根，任由对方轮流吠问打骂。一路上，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车一抵达政治部的大门，他们并不是把我拉走，而是把我从车上踢下来，然后把我抬进一间放满刑具的审问室。

室内淡黄色的灯光，灰白色的砖墙，墙上挂着绳子、手铐、竹架、木棍、电器和其它不知名的东西；还有几张所谓被击毙的“共匪”头目相片；地上放着一张长木凳，专为“犯人”而设。没有办公桌椅，没有书籍本子，只有进出铁门，没有小窗，没有通风之处，空气沉闷，血腥酸味，一进室内，几乎晕倒。这里是一个杀人不见

血的地方，不知有多少世间人杰枉死在这里。我们不时听到或看到一些被捕的抗英志士不明不白地死在审问期间，但英帝总有不能自圆其说的掩饰。

我被推进室内，被压坐在长板凳上，双手依然被扣住，闷气迫的全身流汗，以口吐气，全身无力。英帝的打手门都站在门口，轮流进来审问施刑，问一句，打一顿，只要摇头不答或说不知道，胸口就会被重拳或用膝盖猛击；脚的关节突然被木棍敲打；全身每个部位都要遭到酷虐，夹手架迫供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严审之后，我有几次几乎失去知觉，全身已不能自主，这时已是早晨六点钟。我昏昏沉沉地被抬进一间用铁栏做门的小房里，手铐已被拆开，里面空空荡荡，我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一动也不动地昏睡下去。

迫供无获，白费功夫，但他们以打人为业，施刑为乐。看受害人的痛苦和死亡，他们只会狂笑，觉得是胜利，是另一种收获。他们不会收敛自己对人民所犯下的万恶之罪。

当我稍微清醒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通过铁栏门口塞进了一个饭盒，一杯奶茶，那是拘留所的午餐。打开饭盒一看，发黄的米饭放着几只清煮的连头小鱿鱼和数条白菜，只淋盐水，无味。但我已被折磨了一整夜，昏睡了一个上午，肚子已饿得咕咕作响，饥不择食，少少米饭，一下子就吃得精光。精神稍震，全身酸痛，红肿伤印，处处可见。我挣扎着起身，看着三面墙壁刻着和涂满各种不同文字。印象尤深的是一首毫气十足的五言诗。内容是：“肉体打

得痛，心灵敲不动，敌人要口供，我都说不懂”。此诗正是自己经历的写照，我感谢这位素不见面的共鸣者，他是我心中永抹不掉的英雄。

第三天，我又被带到另一间审问室。这里有办公桌，桌上放着文件和纸张，还有数张椅子，墙上挂着不少具名马共分子的相片。室内坐在中间的是一位英国人，旁边坐着华语审问员和一位华人记录员，其他全是帮凶。我被令坐在英国人的对面，一开始就问我要不要和政府合作？又问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抗英同盟，是哪一组？成员是谁？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住哪里？然后又说：“你不说，我们什么都知道，看你老实不老实，这是给你机会的”。我心里明白，第一个晚上他们的“武问”得不到任何东西，今天改为“文问”方式，试探效果。我保持第一个晚上的态度，摇头和回答不知道。他们这次表现的很虚伪，用讽刺的客气话说，你在马共眼里是个无名小卒，你只是被利用的小工具，在你身边的马共分子都比你大的多，最后都觉醒了，跟我们合作了。如果你不识时务，顽抗到底，你就要倒霉，要坐牢，你的父母将会为你苦一辈子。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会为你安排一份好的工作。好好考虑，等你回答。说完，由几位帮凶把我送回原处，我身体的伤痛还没有消。

问话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我和马共的关系，地下活动的胡说八道，又把我在中正中学当小贩角色说成有背景，是受马共指使到学校进行活动的重要分子；还把我到马六甲承包焊接工程说成是到森林里接受马共秘密培训等荒谬透顶的乱套。问话反复无常，弄虚作

假，丑态百出，全是无赖的迫供，别无办法。但对我来说，却是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

第五天，两名便衣大汉又把我带到另一间新的审问室，坐着的是另外几名华巫印人员。华人为主，被介绍是什么官职，我不关心，也不注意，我只听他们叫我坐下。那位官员问我，你有没有考虑同我们合作？我摇头不答。“不合作没关系，你的同志早就招供了。你的情况我们了如指掌，我们会叫你信服”。我知道对方抛烂头，我轻蔑地说，我没有什么“同志”，哪里来的“招供”？对方即刻拿出一叠文件，夹着些相片。装模作样地读几段所谓同志招供的内容，又说些他们所谓掌握的地下情报，全是荒唐可笑。唯有一点捕风捉影的所谓资料和相片，就是有人跟踪我平时的去向和跟什么人接触，这些全是强加在我身上的怀疑，迫我承认这是地下活动的证据。手段无耻，白费心机，我拒不承认，也加以反驳。指出资料是编造出来的，相片反映的是我的正常生活和职业活动，无任何事实证明。对方转问为怒，面露凶相，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叠相片，一张又一张地拿到我面前，问我认识不认识。我略视了一下，多是和我有交情的中正学生免役代表团成员和一些活跃分子，但我都说不认识。开始悄悄地看一下，后来连看也不看，只知说不认识，不知他们耍阴谋。他们拿出一张和我自小在一起、小学在一起、长大在一起、两家密切交往的好邻居，同龄同学陈来发的相片大声问我认识不认识，我照答不认识。一声拍桌的怒吼朝我狂叫，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同学，又是你的同志。他被捕后，早已招出你和他的关系。

你敢对抗政府，和我们作对，我们就送个“礼物”让你尝尝滋味。说完，收拾桌上散乱的文件和相片，怒气冲冲地离开审问室，房里的成员也跟着出去。室内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干什么？（陈来发就读华中，53 年中被捕，后被驱逐出境）。

还不到三分钟，飞速地跑来几位还来不及看清楚他们面孔的恶汉，一个墨黑的布袋猛不防地套住我的头。我什么都看不到，我高叫问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把我拖到另一个地方，拳打脚踢，甚至用棍子打我的腰腿和身体的各个部位。他们边打边骂边笑以置我于死地而取乐。我痛楚难堪，怒火燃烧，想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或是同归于尽。但我连站起来的气力都没有，身体已经瘫痪在地上。天昏地暗，看不到打我的人，看不到同围的环境和物，一副残躯，不知什么时候，我躺在原来被关的铁栏门小室内。

醒来时，又是一天，身上的皮肉没有一处不受到伤害。青肿、血黑一片，皮开血渍处处，目不忍睹。我全身动弹不得，翻转无力，我用半躺着的身体自我调解。这里不会有医生，更不会提供药物为你治疗。痛不欲生，死无人问，伤愈死去听其自然。命大不会死，死了安上一个“自贱”的罪名完事，无需负上法律责任。

不知不觉我被关了一个多月，此期间，再也没有被提审问话。在他们眼中，我已是个“半残”的人，整天躺在室内，很少站立起来。问了三次话，苦了自己的手脚，费尽了精力，炸不出油来，空无一获。最后，他们把我移到欧南律监狱。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就以收藏十六本“荒地”当作非法收藏禁书的罪名交由法庭审判。也

许此劫已了，法官基于该刊物曾是合法读物，不宜入罪，当庭宣布无罪释放。

父母和亲友们得到这个消息，喜极欲泪，都走上来护着我离开法庭。回到家里，胸口和后背还留下不少青红的班块。父母和亲友早已知道我被打的重伤。经检查，医生说，我身体底子好，内伤可以调理，劝我父母不用担心。我依医生的方子喝了几服药，身体恢复很快。半个月之后，我又奔驰在求生职业的道路上。

1954 年下半年，炽热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各行各业、社会群体，为谋求自身的权益和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朝向更高层次的政治目标发展。英国的殖民统治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已处于非常危急的时期。还政予民的林德宪制企图苟延他们在新马殖民统治的残喘。马来亚共严党以武装抗英的战争唤起民族主义的觉醒。一场以民主宪制斗争的运动开啓了民族独立的尊严。各族人民自发和自觉地投入到不同战线上的反殖斗争，形成一股强大的连英国意想不到的对抗力量。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受英文教育的正义律师李光耀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正在罗集一些反殖人士共组 PAP，一时引起各方仁人志士的关注。我从好友方面知道这一消息，欣喜之余，深有感触。一个人的正义，是改不了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只有汇合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动摇统治者的根基，建立理想的社会。

我从魔窟里出来不久，遣痛未消、仇恨、愤怒聚集一身。听荆社会上已有高挂正义之旗，我乐于了解和加进这个队伍。因此，PAP

成立之时，我就是党的成员。

经历的过去和此次的被捕是同一性质，所不同的是秘密和公开的区别。不为人知的残暴酷刑可以置人死无对证并消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逮捕却能在民主的遮羞布里掩盖他们的狰狞面目。我把过去这段“不被遗忘的记忆”作为此次遭遇的连续体加以说明，把自己两次不同的经历在同一性质下有较深的认识。

（附二）

怒对镇压行动

当我被送到漳宜大牢，看到我心中一直惦记的众多兄弟，还有一些不是很熟的朋友。我们有如隔世重聚，相见之欢，溢于言表。我最关心的是 8-22 大镇压有多少人被捕，李光耀和 PAP 其他中委有什么反应，党有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支部和工会的处境如何，社会形势怎样，英方和林有福政府又会制造哪些虚假的谎言诬蔑反殖人士是“颠覆分子”，这些过时的消息是我急需知道的。负责狱中生活的才安兄把家人送来的一个月前的报纸都拿给我看。从报章上我看到大逮捕行动是英方和林有福政权刻意制造镇压反殖力量的阴谋。大逮捕的第二天就发表了所谓“有共产党进行颠覆活动”的白皮书，指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 PAP 最高领导权，颠覆活动已到了无法控制的极度危险时期，政府必须采取有效行动，制止共产党的全面渗透云云……

很明显，这是经过精密策划的一项阴谋。从各个方面罗集和编

造所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被捕者身上。大逮捕的第二天，新加坡各大报都在显眼的头版刊登，由林有福当局发布的所谓“马共颠覆白皮书”，把对付反殖力量转移到马共身上。无耻的谎言是他们一贯的伎俩。1956年10月26日的大逮捕行动和这次8月22日的大逮捕行动的“白皮书”如出一辙，不足为奇。

一场大镇压行动把火热的反殖队伍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PAP所谓“夺权派”的六名中委有五名被送进监狱，留下TT拉惹律师孤军在外。各支部主要负责人都在被捕之列，所有左翼工会领袖、群众组织，还有维护新闻自由的新报编辑和记者也无一幸免。现在唯有以PAP中央名誉为代表的李光耀前秘书长可以公开发言，避重就轻地指责英方和林有福政府的镇压行动是对付左翼运动的阴谋部分；另一方面，又要“亲共分子”为这次的镇压行动负责。

PAP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打击，李光耀不能坐视不管。他迅速重组和改善党的建制。TT拉惹律师在孤军无助的处境中自动提出辞职，“亲共”的中委从此消声绝迹，没有被捕的支部干部和党员全部进行改编，PAP进入了全由非共领袖控制的新局面。

林有福在他的主子指使下对PAP“亲共”势力进行拆骨，并横扫一切被视为“亲共”的左翼运动领袖。林有福以为PAP的阵脚会大乱，左翼队伍会迁怒于李光耀和他的非共领导，会把他们当作是出卖自己同志的罪人，从此分崩离析，一蹶不振。林有福的劳工阵线就可以乘虚而入，骗取群众的支持。

PAP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干部党员是党强大力量的坚实基础。左

翼运动始终是站在反殖民地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最前线。他们不会因为任何血腥镇压和暴力统治就被吓跑了。从抗日到抗英的道路上，他们早就看到不少血淋淋的事实。敌人越是压迫，越激起他们的愤怒。我们的被捕，在人民的心目中，就如他们自己的亲人遭受迫害一样。他们时刻牵挂着我们，打听和关心我们被捕之后的狱中遭遇，对我们的安全和健康十分担心。林有福政权以为通过高压手段，可以使人民从此屈服于他们的统治，结果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逮捕行动牵涉到 PAP 五名中委：他们是陈从今、陈贡元、王才安、陈世鉴、吴文斗，还有许多支部的重要成员，以及左翼工会的主要领导，共有四十多人。左翼反殖力量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但并没有因此倒下去。人民没有放弃对 PAP 的信任，他们以加倍的不满去对抗林有福政权的残暴镇压。在两个议会的选举中已充份证明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李光耀以 PAP 名誉和律师的身份，对林有福政府旨在打击 PAP 的大镇压行动提出抗议，另一方面更加强调新加坡只有实行非共民主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亲共”的冒险行动只能自食其果（大意），决不可能取得完全的独立。他把这次大镇压行动归罪于“亲共分子”的盲动。

但是这次的大逮捕行动不仅仅只限于对付 PAP 和左翼工会的反殖重要人物，而且还向知识界的知名人士下手。当中有中正中学校长壮竹林博士、新报社长傅渊炯、编辑郑西田和采访主任易润

堂……他们到底为什么被捕？发表亲共文章？言指时弊？颠覆政府？得罪当局？总之，我们并不很清楚。只能说明英方和林有福政府欲盖弥章。逮捕不满政府的知名文人充作淡化对付 PAP 的色彩，欺骗社会人士，他们对付的不只是 PAP 和工会领袖，凡是有“颠覆政府”的言论和行为者都不能例外。

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和林有福政府对即将到来的市议会、立法议会选举有可能落在“亲共”的手里而充当清道夫和刽子手，为劳工阵线在“两会”的普选创造优势，也为 PAP 内再三强调非共的李光耀清除异己，嫁“出卖同志”之罪名予李光耀，搞臭 PAP，使 PAP 在群众中的威信一扫而光，劳工阵线便可坐收渔人之利。

林有福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面对着 8-22 狂风扫落叶的摧残，人民群众把镇压 PAP 视为专制独裁残害人民的暴政，引发出来的不满和愤怒成为支持 PAP 最巨大的力量源泉。劳工阵线更加孤立了，PAP 强大到压倒一切，奠定了五十多年成为新加坡执政党的坚实基础。

我们被捕之后，什么名堂的罪名都被扣上了。夺权派、激进派、亲共分子、冒险主义……可就忽略了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兴趣接受这些乱扣帽子的罪名。相反的，他们对那些被捕的反殖勇士充满着敬佩和爱戴的深厚感情。林有福政府的镇压只能为他们自掘坟墓，新加坡第一届市议会选举，PAP 取得压倒性全面胜利，劳工阵线遭到彻底的失败，土崩瓦解，印证了人民的选择。

（十二）市议会大地回春

遭受到大镇压后的 PAP，在李光耀的操办下，秘书长 TT 拉惹辞职，中央委员会人选作了一些变动，李光耀重任秘书长，并作为被捕中委的代表律师。党内的关系，一切正常。全体党员更加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把反殖斗争的目标集中在市议会选举方面。

1957 年 12 月，一场空前热闹的市议会选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PAP 以压倒性的多数取得市议会的控制权，王永元从平地走上了市议会的宝座，当上了第一任的民选市长。这是 PAP 向权力机构冲杀的重要告捷信号。全体新加坡人民为此振奋欢呼，并对即将到来的立法议会选举充满信心。

虽然，市议会不是代表国家的统治机构，但她拥有管理民生、治理市政的权力。在民众心目中她是举足轻重的。王永元作为新加坡市议会第一届民选市长，他吸取了在 PAP 被党员摒弃的经验教训，非常清楚民心的重要性。他摆出比“亲共”更左的姿态向英殖民者发出挑战。把象征英殖民地统治者至高无上权威的权杖从市议会的大堂搬走，表示他领导的市议会再也不需要看英殖民者的眼色做事了。王永元所显示的勇气和胆魄究竟是 PAP 赋予他的权力，还是他自己的思想使然，我们并不清楚。但必须予以肯定的是：他能担任这样的角色，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市议会从英殖民统治的黑暗时期走向大地回春的新景象，PAP 全体党员和广大新加坡人民发出疯狂的欢呼和给予全力的支持。高度的赞赏使王永元的威信在一夜之间独占鳌头。但也因此在他的身上滋长了一股超越常人的傲气

和自以为是。他后来自立门户，创立“人民统一党”，和李光耀分庭抗礼，即是一个证明。

王永元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会计师，在 PAP 中委当任财政职位，是一位理财能手。但他很不喜欢接近最底层的工人群众，对各支部开展的、带有中国色彩的文宣活动有相当大的反感，不时对他们作出不负责任的批评。他最大的致命伤是看不起受教育不高的普罗大众，自负、骄傲成为他的包袱。市议会选举的胜利是 PAP 无数忠实党员付出重大代价换来的；是劳工阵线用他沾满双手的血腥镇压，为新加坡人民所唾弃的结果，决不是王永元本人具有什么魅力、才干和天然资源赢得人民的信任。

我对王永元个人没有任何成见，只觉得他在管理党的财务工作和对支部活动的干预方面有些过份，也许我对他有些误会。但后来他在市议会选举胜利后所展现出来的“平民市长”新作风，改变了我对他的一些看法。在反殖斗争的重要时刻，在 8-22 大逮捕后白色恐怖的气氛中，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位突出的人物，有勇气、有胆魄地去打碎一切邪恶的殖民统治的桎梏，建立起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英雄形象。

我们这一批在 8-22 大镇压行动中被捕的 PAP 中委、各支部重要成员、工会负责人、学生界和新闻界等的著名人士，都从市议会的选举中看到未来的希望，我们深信 PAP 将在来年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取得执政权，林有福领导的劳工阵线已经声名狼藉，马绍尔在政坛上名声也一蹶不振，其它一些微不足道的机会主义政党：如民主

社会党、人民联盟、马华公会、巫统、劳工党等，只能作为陪衬“民主橱窗”的花瓶而已。还能有什么作为？PAP 胜券在握，走向尊严的立法议会大堂的明灯已是高悬。除了英殖民者的残余势力仍在力挽狂澜于即倒之外，一切不涉及英国殖民者根本利益的内部事务的权力，已明显地在逐渐转移之中。

（十三）狱中的期待

我从中央警署的暗房转往漳宜监狱大牢，在这里几乎认识了所有被捕难友。苦狱共尝的生活，结成牢固和真挚的战友感情。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团结一致，一起学习，一起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也一起准备去面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被迫失去自由，失去和家人的团聚，失去亲朋戚友的同欢共叙，失去长期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各族人民的接触，但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一切都朝好的方面，去争取胜利的到来。我们非常相信这一天的到来很快就会成为事实。

在监狱的大牢里，我们都被视为政治拘留者，早上六点钟打开房门，如同犯人一样，被令排队蹲下点名、叫号、然后解散。大家分别自行完成早事之后再吃早餐，完毕，由我们自己安排活动节目。学习马来文是我们每天定时的主要功课，阅报看书随大家的意，开会或讨论问题由负责狱中事务的生活委员会召集，有备的文娱活动也是由生委会组织和安排。虽然我们已失去自由，但我们不会放弃一切可利用的空间，乐观的为革命的需要加强和提高自己各方面的

知识。

有了狱中活动的小自由，但随时都有可能召去问话。晚上八点钟，我们被强令关在只有四十平方尺的小房，内无半点用品，只有小睡床和水厕设施，似笼中鸟。我们不需穿囚衣，衣服脏了有犯人代洗，但我们并不欣赏这种待遇，觉得那是一种阴谋，在政治拘留者和刑事犯之间制造猜疑和矛盾。吃饭由狱中供给，饭菜十分粗劣、无味。我们虽有怒、有抗议，但不代表我们挨不下去，我们认为这是对政治拘留者人格的侮辱。我们要用尊严的行动揭开英殖民者监狱的黑幕。我们不时被当作殖民统治者开明政治的装饰品，常有太平绅士探监“关怀”，慰问寒暖一番的虚假表演，令我们看到一批奴才的嘴脸。每星期五是探监的日子，只有半小时与家人在隔着铁栏和严密看守的监视下见面。悲喜交集的情感燃起了我们无限的怒火。为了国家民族独立、摆脱英帝统治，为了民主和自由，为了争取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公平社会，我们付出正义无私的公心，我们何罪之有？

在监牢里，有无数可以记载的经历，这类事例已被许多为正义坐牢，甚至付出宝贵生命的可敬先辈，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遗作。我在这里记述的是个人短暂的、简单的、微不足道的体会，决不是全部的经过。

所有被捕的难友，开始是被引用“公安法令”进行无限期拘留，后再加上一条“驱逐法令”，把非新加坡出生的被捕者列为“非公民”，强行改变为“驱逐法令”，肆意把这批忠贞爱国、为马来亚民

族独立事业献身的反殖精英迫出自己的国土。我们决定用抗争的行动去阻止剥夺我们已有的公民权的行为。对于这种迫害的野蛮法令和阴谋手段，我们一定要向世界公布。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两点钟，狱里突然出现了十几名彪形大汉，大部分是印度警察和辜克兵，另有几位看似文职的华籍警探。手里拿了一叠叠文件，面无表情，冷如动物，眼看着文件上列出的名单，宣布这些人是“非新加坡公民”，应在“驱逐出境”法令下离开新加坡。然后命令这些人都要盖手指模，证明自己无条件认同和接受他们的随心所欲。当宣布完毕之后，狱中所有难友群情汹涌，高声呼喊，愤怒的抗议声此起彼落，强烈的反抗行动一触即发。说时迟，那时快，暴力的强迫性盖手指模由武装警察当任刽子手。他们把手无寸铁的狱中难友分开。“非公民”的难友已被严密地包围起来，迹象表明，一场大搏斗已是不可避免了。没有被宣布驱逐出境的难友被看守着。凶神恶煞的大个子警察怒目以视，等待着一声号令，即可施展雷厉风行的杰作，向被驱逐者发威。小小的监狱，气氛十分紧张，大家都在激荡的口号声中迎接即将发生的武力进攻。我们不会反抗，但我们也不会屈服。我们要用顽强的斗志向人民宣告：我们是最忠于马来亚的真正爱国者，驱逐出境法令是英统治者及其代理人用以削弱人民反殖力量的长期阴谋。

一场强制性的暴力行动，在围墙内不为外界知晓的黑牢里惨烈地震荡着。每个被点名的被驱逐者在完全无反抗能力下被几名受训有素的武装警察用强力压在地板上，稍有反抗或挣扎的强烈行为，

就免不了要受皮肉之苦。警察的行动，不为外界知晓的牢狱，他们最有自由发挥残暴的潜能。当我被点名的一瞬间，我还来不及考虑采取相应的对策，他们已经冲到我身边，不由分说，就将我双手往后一叉，推着我到石台边，强令我盖手指模。我用尽生平的全身力气，想把对方拌倒。我身体的每一个有反抗能力的部位都动起来，双脚边踩边踢地向对方实施“反抗”。有没有把对方踢伤，并无感觉。但要对方明白被驱逐者的坚定信念——马来亚是我们的祖国！不容无理侵犯。

我个子大，力气不小，且做过码头苦力，两百斤的糖米我背得起，三两个小流氓也近不了我的身，警察要把我制服必须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如愿。我的全力挣扎，激起他们极大的震怒。他们动用了四个大汉，把我双脚抓紧，又把我双手拉开，然后将我扑倒在地板上。我动弹不得，但我紧握拳头，不伸五指，他们无法可施，动用残刑将我的头与地板相碰，只有几下子，痛极昏迷，拳头无力，手指松开，他们就这样地把我“奸污”（盖手指模）了。

奇怪的事发生了。第二天即接到一张通知书，要把我送到法庭审判。内容写着我把一名印度警察的脚踢伤了，他告我打警察伤人。随后，我就被带到法庭，由几名警察看守着。我站在被告席上，法官扫了我一眼，不怒不威的发问：“你把警察打伤了，你认罪不认罪？”接着那位自称被打伤的警察掀开了裤脚，露出了青肿的大片伤印，说是我把他踢的。我感到莫明其妙，但不否认有可能在混乱中踢了几脚，他是倒霉受了伤，并没有故意打他、踢他。经过一

轮的激辩，法官终算“公正”，宣判无意伤人，罪不成立。一场闹剧就草草地结束了。

为了表示我们坚决反对英国政府和林有福傀儡政权把我们强迫驱逐出境，我们全体难友邀请 TT 拉惹律师到狱中共商反对驱逐出境法令的对策。在群策群议中，我们决定将此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宪章的黑幕公诸于世，争取国际社会的正义支持。我们委托 TT 拉惹律师致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英国反殖自由运动委员会主席怡峇，亚非团结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外交部。严正声明我们是马来亚的真正爱国者，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我们不惜用自己鲜血和生命与祖国共存亡。英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任何阴谋都不可能得逞的。我们呼吁所有维护世界公义的国家 and 国际组织重视我们遭受的迫害。我们致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信件的重点是：强调马来亚华族是马来亚国家三大民族之一，华人爱国者不是海外华侨。中国没有义务接收英帝国主义把马来亚爱国者赶到中国的土地上，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外交部支持我们，坚决拒绝旨在削弱、打击马来亚反殖斗争的行为。我们致给国际组织的信，在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情况下，英政府和他的代理人林有福政权，已迫不急待地将我们驱逐出境了。

监狱是一个大熔炉，它既考验着人们的意志，也燃烧着人们的反思能量。PAP 执政的时机快要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是被捕的 PAP 中委、各支部成员、工会负责人和社会进步人士，在狱中盼望着 PAP 执政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就可以跨出铁狱的门坎，回到自由的社会，重新高举反殖大旗，为争取完全独立，为新加坡

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继续努力奋斗，为实现建党时期提出的纲领英勇不屈的战斗下去。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坐牢算什么？我们满怀豪情地期盼着这一个光辉时刻的来临。

李光耀在新宪制下的“自治邦”立法议会选举举行之前，明确地向全世界宣告：PAP 若获得广大选民的支持而执政，首先一定要把那些和 PAP 中央有密切关系的党员释放出来，并对“公安法令”作出检讨，否则 PAP 不会接受执政。李光耀的公开承诺，说明他并没忘记那些与他有政见分歧的 PAP 重要成员。当然，他更清楚，人民把被关在狱中的反殖人士看成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不释放这些人，人民对 PAP 就会失望。

1959 年 4 月，PAP 终于取得新加坡自治政府立法议会的执政权，李光耀下令将在狱中的八名 PAP 前中委和重要党员有条件地释放出来。他们是：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曾超卓、陈从今、陈世鉴、兀哈尔、詹密星。李光耀实现了他在选举中的承诺，为自己的政治诚信获得美誉。但对被驱逐到中国的三名中委：陈贡元、吴文斗、王才安，却只通过党内同志到中国广州做不公开的接触，并提出回国的苛刻条件，作为安抚我们内心的不平，让我们心存感激，并把拒绝接受有条件回国的责任推给我们。

（十四）被驱逐出境的一幕

1958 年 9 月，在被迫离境前的三天，父母一早就来探监，如往常一样，带来一些家常自做小食，父亲和母亲深情的凝视着我身体

的每一部分，不时地听到他们慈祥的悲声：你身体太差了，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睡不好觉？是不是没有东西吃？是不是受到虐待？是不是……多少个是不是流露出爱子之心的父母情。我忍住了泪水，只轻轻地说了一声，身体结实不会有病，请二老放心。会见在短暂的时间内结束。我看着铁窗外的父母，他们缓缓的离开，走了几步，父亲突然停下来，转身用充满着哀伤和泪水的目光直视着我。父亲是个硬汉子，从不轻易掉泪。一年多来，到狱中探望我不下二十次。正常的交谈，严肃和温情的父爱，支持和激励的言语，使我感到没有后顾之忧。这次探监，情似反常，父亲面部的表情，似有余言未叙，难舍亲情之别，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的见面。不禁悲从心起，泛出汉子泪光，抑不住内心之难受！这种情景，直至今天仍历历在目。

1958年9月16日上午六时正，往时狱卒已打开小铁门让我们从独囚的牢房里出来。今天清早六时到中午十二时，阳光早就被掩盖在云堆里。阴霾灰色的上空布满着散不去的浓雾，大地一片昏暗。独囚在狱房里的难友兄弟，从早上六时过后就不停地敲门高喊，叫狱卒开门，互问难友情况，互作鼓励，同声抗议和强烈呼喊，口号和战歌汇成排山倒海的巨响。我从小房的小窗眼看出去，只见全副武装的辜克兵木无表情地站立不动。我开始意识到这突如其来的不寻常戒备，势必会有大事会发生。忽然，冲厕里发出了嗡嗡的尚可听得清的浊声：请把冲厕里的水掏干，即可通话。不知是哪位聪明过人的难友在这危急关头想出这个绝妙的通话办法。一时间，各房之

间的通话声连成一片。得到的消息是：“驱逐出境就在今天正式实施了”。

愤怒的难友声音嘶哑，但并不能影响他们高声呼喊。沸沸腾腾的章宜牢房，这是我们最后离开的不归途，我们要把它铲平，把它彻底的粉碎！从此宣告“永别”！

到了下午三点钟，大队戴铁帽、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紧张和有序地行动起来，各就各位地站立在被驱逐者独囚牢房的铁门两边。开锁的门声咔嚓、咔嚓地响，门一打开，迅如闪电的警察就冲进来，不由分说进行人身侵犯。囚房只有一个人，他们却动用了四名警察，如临大敌，强力制服，三两下子就把人的双手紧紧抓住，扣上手铐，抱起双脚，抬出门外，不由你挣扎，不由你高叫，即使声嘶力竭也无济于事。我们被抬出房外，分别被强行押走，约两百米外，停泊着三辆大黑车，两边站着荷枪实弹的警察，个个凶神恶煞，严阵以待，把我们当作是万恶不赦的“反叛者”。我们上了黑车，已到了晚饭时间，虽然我们一整天没有进食，但肚子却没有饿的感觉。我们没有忘记，这是祖国和人民赋予我们的战斗使命。

我们被押上警车，坐在硬板凳两边。押送警察，一副冷酷的恶相，是天生？是装的？还是职业使然？总之，令人不喜欢。

在警车上，大家心里明白，被驱逐者都是无罪的，我们即将离开自己的祖国，我们开始要踏上新的征途，去迎接一个陌生的未来。不知数的命运可能还会遭遇到种种辛酸苦辣，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无论如何，我们有决心和毅力去面对一切。并对马

来亚（新加坡）人民反殖斗争的必胜和走向完全独立充满信心。暂告别离，重返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期望。

昏暗的夜色已落幕了，黑车直驶武吉的吗六英里的火车站，周围的气氛一如在狱中的情况一样，到处布满武装警察和一些便衣警探，所不同的是多了几个洋人。他们不放心我们，担心我们会反抗，担心与我们从此结成深仇大恨，因此他们既来预防我们，也怀着恐惧的心里来“欢送”我们。

武吉的吗六英里火车站，停在那里的长长列车早已处在戒备深严的状态，每一个被驱逐者都被视为有可能发起攻击的危险人物。他们神情紧张地把我们从警车押到列车上，方敢把我们的手铐解除下来，改为两人共扣一个手铐。虽然双手得到舒缓，但仍觉得是一种耻辱。

在列车上和我扣在一起的是新加坡艺术研究会主席黄玉清兄弟，他是1956年10月大镇压时被捕的，我们彼此认识不深，后来却成为知交好友。

列车在晚上9时启动，开向柔佛州直往吉隆坡，经过一整夜的颠簸，终于到了吉隆坡大山巴监狱。这是一个陌生的牢房。只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用完早餐，就被匆忙扣上手铐，强押上车，赶往巴生港口。一路上，看到排排商铺，市面冷清，路上行人不多，汽车更少，只见工人赶班，不见有好景的气氛。还没有到岸，就看到持枪的军警紧张地守在指定的岗位上，如临大敌、严阵以待。随车的警察行动迅速，紧张和恐惧地从监狱到巴生港口码头，约半个

钟头左右的路程。下车后把我们手铐解开，交由两名武装警察和便衣的政治人员亲押至船上，完成最后使命。

一艘英国租用的运载量三千吨货船——福英隆号早就停泊在巴生港口的码头，当我们被分别押上船时，早站在码头周围的工人和大批得到消息的邻近居民自发地涌到码头来向我们“告别”。他们眼含热泪用愤怒的口号来表达对英殖民者驱逐马来亚爱国人士的严重抗议，也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不绝于耳的口号声和感人的歌声震荡着每个人内心的激情。“团结就是力量，”“我爱我的马来亚，”还有别离豪情的“毕业歌”等大家所熟悉的歌曲，凝聚着大家内心共鸣的革命强音，夹杂着是愤怒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英殖民统治！”“马来亚独立万岁！”“你们要回来！你们一定会回来……”，愤怒、期望和信心迸发出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站在甲板上，迎来声浪，挥手回应，配合他们一起喊，一起唱，触情所动，摧人泪下，别离之感，百愁不哀，难过之余，乐观以待。虽是泪别国土，却是心系于此。祖国的苦难，反殖的英雄人民，一定会用加倍的努力及牺牲精神去换取祖国的新生。

船缓缓地移动，向着大海启航，口号和歌声逐渐消失在大海的上空，站在码头的人民未见离开，直到我们的视线模糊至终极为止。

船离开巴生港口，到了傍晚行至新加坡，濛濛中看到红灯码头，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微弱的灯光，闪亮在沉睡的黑暗中。船摇曳在海上直向北方不停地行驶，我们带着人民的使命感远离祖国的怀抱，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告别了马来亚（新加坡）人民。再

见！我们一定会回来！

（十五）船上黑道掀凶浪

离开新加坡，船在大海上航行，风不平，浪不静，难友们的内心更加汹涌澎湃，愁情伤感、乐观抱负交集一起。大家分头走向自己临时的落脚地。船的底舱没有床位，是用草席和帆布铺在船板上的大面积场地，男女稍作分开，坐睡任由其便。在漫漫的长夜里，多数难友都站在甲板上的栏杆边。望着广宇的星空，看着茫茫的大海，脑海里浮起万般的感触——一个被统治的国家，一个被欺压的民族，反抗者为了国家的自由，为了民族的解放，没有理由将自己的命运任人摆布。我们现在已在公海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呼吸着寒风吹来的新鲜空气，我们有理由去做好新的准备，在新的阵地上展示我们顽强坚持马来亚籍的不屈精神。

整夜没有睡觉，天未亮，东方已现红云，西方上空一片惨白，天如锅盖，海如圆盘，水天相连，一望无际。难友们都涌到甲板上，带着万千情怀观赏着海上晨曦阳光升起的一刻。彤红的异彩映进轻涛细浪的海面，闪耀着金色的水波，射下来的阳光，不寒不暖，却是温柔雅气，令人迷往。被这美景扣住思维的神经，似乎已忘记了昨天的一切，生命也坠进随波逐浪之中。

船上的难友，共有四百多人。新加坡约六十人左右，除了十几名私会党人外，大多数是觉悟较高的从政者，其他有三百多人分别来自马来亚各地，有不少人自称是马共党员和游击队员，但多数为

民运物资支持马共的群众，另有小部分黑道人物也参杂其中。他们当中有被判死刑的，有受伤的，有残废的。他们经过长期坐牢之后，英国“大生慈悲”之心，把所有不受欢迎的人都驱逐出境。

船上三餐是按量供应，比牢狱里好的多，同船被驱逐出境者的家属多有带罐头干粮。吃饭时，他们多了一些美味，那些没份分享的人并不眼红，反是为他们高兴。经过劫难的磨炼，大部分难友已铸造出海的胸怀和思想的更高境界，不会因小事而计较得失。

全船四百多人，需要成立一个生活管理委员会，把船上所有难友和少数家属作出安排和管理他们的生活。首先由我们新加坡狱中已有的“生委会”成员主动向马来亚难友中的负责人联络，请他们派出代表和我们共组一个临时“管委员”，为船上难友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安排生活、学习以及一些必要的活动。经过大家磋商之后，一个船上“管委会”由新马两地的政治难友代表很快地建立起来。船上所有难友及家属已经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整体。

“管委会”成员主要是由新加坡狱中负责人组成，他们是陈贡元、王才安、方小浪、林戴伟、梁再明、邢福源；马来亚方面有张苟、廖福昌、徐耀光、毛水良、彭廷週等。由于大家相处只有短暂的日子，不很了解，他们都自称是代表马共的。当船开出大海不久，他们就挂起早已准备好的马共党旗，大声高喊：凡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候补党员，以及所有忠心党的游击队员，请都站在党的旗帜下集合。声音刚落，即刻有不少人列队走向挂旗的面前，严肃地站立着。他们以部队的口令：“举拳敬礼！我们很快就要回到自

己的祖国，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祖国宣誓：我们要为革命战斗终身！”我们万万想不到他们所说的祖国，原来就是中国。以马来亚为祖国的观念并没有在他们思想上扎根。他们站立着的队伍，手握拳头，齐举在右脑边，力劲并用，显示出他们训练有素，惯于举行这种宣示仪式。新加坡政治难友没有任何人参加，只是站在一旁观看。其他黑道人物，民运群众和家属也不涉及其中。但令人疑惑船上马共组织到底是谁在领导？

白天，我们除了安排开会、学习、排演各种节目外，大部分时间是自由活动。到了晚上，我们在甲板上圈了一个小舞台，四周打扫干净，难友和家属都坐在平板上观看表演。节目多是新加坡难友们的杰作，也有马来亚难友表演的森林游击战歌舞。难友“演员”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演艺精湛，惟妙惟肖，一点也不逊色。看得台下“观众”拍手叫好，赞不绝口。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各有特色，表演者的演出天才，反映出他们从事社会正义事业的政治素质。表演往往要到夜里 12 时才结束。

船在海上乘波逐浪向北前进，到第四天晚饭后，又有晚会的安排。负责通知船上难友的马来亚管委会，不知哪位成员主张不让私会党人参加观赏节目，消息传至同船黑道难友，即时怒火中烧。绰号黄梨头和九龙纹的两位黑头目，把约三十名私会党人迅速召集在一起，在船仓的最底层储藏库开会。大家磨拳擦掌地大声叫骂，脏话连篇，目标指向马来亚难友管委会，说他们看不起私会党人，侮辱他们的人格和尊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被歧视，他们会采取最暴

烈的行动来教训这批自命清高的人，有的人甚至穷凶极恶地叫喊，要把他们当中的主要人物扔进大海，让大家认识他们的厉害……说着马上动员大家打开仓底的工具房搬出水管、木头，作为攻击性武器。他们毫无掩饰的大叫大喊，惊动了船上几位在仓底休息的难友，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快向新加坡管委会报告。我们一听，知道情况严重，即刻由戴伟、小浪和我一起到船仓最底层的储藏库去了解情况。只见滚沸暴躁、一片混乱的场面，群情汹涌，暴烈呼叫，大声高喊要冲向甲板上的晚会场所，把它打散打烂，来个彻底破坏，并声言要将马来亚管委会某些人扔进大海。其情之凶，其心之狠，可见当时黑道人物战斗江湖的真实一面。我们面对这批黑道难友掀起的狂风凶浪，只能用偏袒和缓和的口气平息他们爆发出来的怒火。我们用最诚恳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理解和同情他们内心的感受。我们也为马来亚难友管委会的一时疏忽、怠慢邀请他们观赏晚会节目活动表示歉意。我们还晓以大义地讲，他们是被英殖民地统治者迫得走头无路，才走向与社会对抗的道路。他们原本就是善良的老百姓，是一群最无奈、最底层、最被歧视的草根阶级。我们指出：你们本身没有犯罪，是英统治者把你们推上犯罪的囚车。你们应该认识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把一切仇恨的干柴烈火烧在英统治者身上。你们是否想到，你们的勇敢和火拼的无知，只会被英统治者利用来对付我们这些受苦受难、同舟共济的兄弟姐妹们，对付和你们一样带着别离父母、妻儿、兄弟姐妹的痛苦离开自己成长的土地的难友们。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但又在不同的环境里寻找出路

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为一点小小的误会把英统治者压迫我们的一切罪恶全部忘掉，去向那些长期以来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在各条战线的抗英难友们发洩不满，甚至要把他们扔进大海，岂不是让英统治者看到我们之间互不信任、发生冲突而拍手称快吗？我们希望经过这次的误会，使我们更加进一步了解彼此的想法和加强我们之间的友谊，让我们在未踏上伟大中国土地之前先考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珍视自己现在最艰难的时刻和未来如何去适应面对新的环境。为了小事而做无谓计较的暴行，决不是江湖好汉坦荡开朗的胸怀。我们说了很多，谈之道理，申之大义，诉之真情，言之恳切，流露出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同情、友谊、关怀和鼓励，使他们感到有愧于心而有所动容。开始他们不服，怒气难消，但仍表示敬佩我们，说我们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要他们做什么都可以。唯对马来亚难友管委会侮辱他们，是绝不可忍的。他们要施以颜色，予以教训才能解心中之恨。在我们把马来亚难友抗英杀敌，为解放所有被压迫人民作出伟大牺牲的事实和意义告诉他们之后，才把杀气冲冲的满腹牢骚慢慢地缓和下来，也许还有心结，但表示感谢和诚意地接受我们真诚的劝告。由黄梨头和九龙纹召集他们的兄弟，跟随我们一起上甲板参加晚会活动。就这样，一场既紧张又惊险，可能发生严重惨剧的船上事故终于避免了。戴伟、小浪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没料到在对待黑道人物的思想工作方面能这么快取得如此成效，他们又能如此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说的话对他们是一种良药，为他们解开长期醉死在为一己之利而危害社会的劣性

行为，当然这不可能是长期有效的真正良药。

晚会启幕，在热烈的掌声中，我走向舞台的中间开始发言。首先表明我们全船的难友，不分是政治或是其它原因，所有被驱逐者都是被英帝国主义迫害的苦难兄弟、姐妹，我们热烈欢迎以黄梨头和九龙纹为代表的难友兄弟们参加今天晚会活动。话音刚落，难友们报以热烈掌声，那些黑道难友们也喜极滴泪，似有感动，他们以大力掌声和欢呼声作为感激的回应。接着我将化解难友之间发生误会的过程简单地作了介绍，并重复在船仓底层和他们交谈中带着友善和义正言词的话语激励着大家的情感，当我的话讲完之后，很多人都走来跟我热烈握手。庆幸大家都能度过这个化凶险为愉快的晚会。

（十六）在中国领海议国籍

到了第五天傍晚，船已缓慢地进入中国领海。隐约可以看到远处零星散布的几艘中国大轮船和一些中小货轮。在濛濛的晚昏夜色下，看不清海上船只的行动，只看到星星点点的微弱灯光，但已知道我们的船很快就要在黄埔港口靠岸了。

也许由于国际海域法有所规定，外国船进入中国领海，必须先停泊在离岸多少海里以外，接受边防和海事部门的检查方可靠岸。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这艘由英国租用的客货运轮船是挂着外国旗帜的。它进入中国领海后，缓慢行走不远就停泊下来，然后再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

不到十五分钟，就有约三艘小气艇从同一个方向驶来。首先登上大船的是穿着解放军军装的官兵，接着是一批穿干部便装的行政人员，我们不懂得是哪些单位和部门，但我们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巡逻队。那些穿便装的干部先找我们的代表，然后自我介绍是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招待所的吴所长和其他几位负责人。他们代表侨委，到船上转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我们第三十七批难侨的关怀和问候，他们是代表侨委前来接待和安排我们上岸的。我们一听这批被驱逐出境的新马难友是“第三十七批难侨”，才知道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三十六批被称为“难侨”的新马政治难友被驱逐出境。我们心里明白，“难侨”是中国侨委会对遭受驱逐迫害的新马华人的总称。我们新加坡政治难友管委会对此称呼觉得有所不妥，即行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把难侨改为难友，因为我们是马来亚国家的华人，不是中国侨民，但马来亚政治难友管委会却认为这称呼完全符合他们目前的身份，他们同意侨委会对难侨的定义。在对待国籍身份问题，新马两地政治难友观点不一，无疑地给侨委会招待所的接待工作增添了困扰。他们从未接触过华侨以外的籍别，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也未曾有过规定和作出指示。他们非常客气地对我们说，你们提出的新问题，我们要向领导请示。请我们到大船的会议室作进一步讨论，看我们还有什么建议和要求，他们一定会关心，并为我们考虑一切。

解放军巡逻队也许就是边防军，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向每一位在场的难友打招呼。他们巡视船上船下各个角落，作了一些笔记，两

个钟头后即乘原船离开。

会议室里，侨委会招待所吴所长、秘书黄慧晶、负责人陈女士和另外两位干部坐在一边，另一边是新加坡难友管委会的代表，方小浪、林戴伟、王才安、梁再明、邢福源和我。一开始，我们就提出，新加坡所有被驱逐出境的政治难友，要求中国政府答应和支持我们已作好准备抗议英帝迫害马来亚爱国者的野蛮行动。我们要求的是：第一，马来亚难侨可以自由选择归属中国侨民的决定，而新加坡华族难友要求中国政府，坚决拒绝英帝国主义无礼把马来亚革命者驱逐到中国，让原船把我们送回新加坡；第二，若是非接受我们上岸不可，那就允许我们在广州市面列队举起布条和标语作短暂游行，以示抗议英帝无理驱逐我们出境，引起国际和中国人民的注意；第三，允许我们保留马来亚国籍，随时准备重回新加坡。我们告诉侨委的接待代表，新加坡的政治难友，有很大部分是 PAP 的中委和各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支持 PAP 的工会和学运领袖，我们还对新加坡 PAP 反殖斗争进入决定性胜利的有利形势作了分析和介绍，我们相信明年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PAP 必定会成为第一届自治政府的执政党。届时我们将会回到自己的国家。

我们所说的一切，侨委接待代表都感到很新鲜，更不可能理解，还觉得我们似乎很荒唐。三十七批和在此之前的所有“难侨”，除我们这批新加坡难友之外，没有一个人对侨委的接待和安排提出异议，他们很自然地而且本来就认为中国就是他们的祖国，对于我们坚持马来亚籍的思想是匪夷所思，并被视为是叛逆的愚蠢。侨委接

待代表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却对我们提出的三点要求作了简单的回答：第一，我们若不上岸，英国可以把我们送往台湾，我们会遭受到更残酷的迫害；第二，有关在广州市面列队举布条、标语抗议英帝的迫害行动，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不会允许的；第三，保留马来亚国籍，要请示领导。我们所提要求，没有一条被接受。

但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关心和尊重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至于保留马来亚国籍的身份，我们以极有说服力的论述，来说明马来亚华人的历史背景、他们的特殊组成以及社会功能和地位，还有更为不同的是马来亚华人已构成马来亚三大民族中的一个民族。华族已是马来亚（新加坡）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抗日战争到抗英的民族解放运动，华族所担当的角色是把一切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赶出我们的国家，建立一个以三大民族，即华族、巫族和印度族为主体的独立民主自由的马来亚共和国。我们强调，新加坡华人和华侨是有区别的。但他们有一脉相承的感情，把中国视为血肉相连的亲缘。他们的意识差别是把马来亚看作是第一故乡还是第二故乡。这是早前已引起华人社会不断探讨和争论的课题。但华侨思想将随着反殖斗争的深化和胜利有所改变，他们不可能不认识到，用自己血汗灌注在这块土地上才能得以安居的第二故乡是他们的长居之地，他们已在这里深深地埋下依依不舍的感情。投身反帝反殖斗争早就有他们的一份，只是不明白到底为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还是为自己意识上的祖国而战。经过这些年，明显不过的是新马人民反殖斗争的各个领域，华人是革命运动的主力，华侨思想已逐渐为争取

新马独立的国家意识所代替。长期以来，英殖民统治者一直把反殖斗争的华人，宣传为中国的侨民在他们统治的殖民地进行颠覆活动，动辄把他们驱逐出境，用此毒招把中国污为唆使侨民或派遣间谍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们陈述了这种本质上的利害关系之后，侨委接待代表在认识上仍然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是中国人的后裔，无论怎么说，回到祖国就是华侨。保留马来亚国籍那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大事，他们只能向中央反映和请示，由中央决定再作传达。

我们还告诉他们，在我们被驱逐出境前，我们已致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英帝及其傀儡政府驱逐马来亚爱国者到中国，我们希望得到中国政府最有力的支持。从今而后，杜绝再有同样华族被驱逐出境的事件发生。

我们认为接受被驱逐出境的马来亚华族到中国是上了英帝国主义的当，还帮了他们的大忙，把强有力的华族反抗力量轻而易举地赶出马来亚，削弱革命队伍的力量，增强镇压反殖的声势。尤有甚者，把我们的反殖斗争说成是颠覆马来亚政府的中国人所为。此外，还会为华族革命者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留有逃避现实的后路。我们所举之弊，颇有说服之力，接待代表只是点头不言，我们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接待工作，不会轻易发表意见。

我们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道理，他们除了细心听取之外，还通过快电不断和上级领导联络，使到我们提出的意见和看法很快得到回应。我们急于及时获得肯定的消息，但中国政府慎重处事的思

维决定了此事事关重大，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作出答复的。因此他们传达的领导指示是：先上岸，看法和意见可以保留，问题还可继续讨论。中国政府会尊重和理解我们的要求，容后再作研究。

互相之间交谈的内容很广，对于保留马来亚国籍的讨论，我们是严肃的，表现出非要中国政府承认不可，但他们并不介意，却很有耐心，很亲切和非常关心地认真传达我们的意见，然后又把中央领导的指示转达给我们。新加坡难友都急于要知道我们讨论的结果，当大家知道中国政府答应探讨华人和华侨之划分和定义之后，大家同意上岸以后继续反映我们对保留马来亚国籍观点的重要意义。

马来亚难友并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所以代表难友的马来亚管委会不参加我们和接待代表的讨论。他们无条件地服从祖国，即中国的一切指示和安排，我们不反对他们的选择和决定。但我们新加坡难友坚持华人的立场，在后来中国制定对海外华侨和华人双重国籍的政策上，证明完全是正确的。

整整一个晚上，双方在座的代表没有丝毫倦意，气氛十分友好、亲切和热诚，互为获得共识而高兴。不知是什么时候，船已开进黄埔港。海关上船检查，跟解放军的巡逻队一样，从船头到船尾，无处不作细察，他们非常认真和负责，他们知道船上的“乘客”都是被英帝驱逐出境的马来亚“难侨”，因此对他们随身带来的简单行李瞭目而过，不作为难，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身正在执行公务。

为了不负新加坡难友所托，始终不移地坚持我们既定的观念，

但也要为中国的对外政策着想。权衡利弊，区别轻重，非是一方面的考虑，也不是一谈而成。达成共识，来日方长，唯有先行上岸，双方所持见解，再行商议。

（十七）接受锻炼 坚持马籍

第二天一早，难友们有序不乱地列队上岸，地点是广州长堤前面三层楼的西式旧大屋，旁边是新建的南方大厦。我们进入海关大厅接受一般的检查之后，就乘坐华侨招待所早已准备好的大巴士车直往广州三元里招待所。这里是一个有围栏的大面积园地，前面建了几排二层楼的简易砖屋和一幢较像样的办公楼，夹在这些楼屋的中间，还有一个可容纳几百人的大饭堂，开会、吃饭、看电影都在这里。招待所里的二层楼砖屋，间隔简单，每个房间约四百多平方尺，放置着二十张双架床，上下可睡两人。难友们都被安排在这些房间里住下，并发给每人一床新棉被和一个枕头，此外还给每人发九十元人民币作为安家和零用费。我们未曾想到，这些被驱逐出境的新马难友并没有被中国政府看作是一种负担，反而如此关怀备至，令我们深为感动。

我们初到贵境，一切陌生，更觉新鲜。看到处处红旗招展，毛泽东主席的肖像高挂厅堂，各式各样的豪迈标语和振奋人心的激励性口号宣传，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小朋友个个天真活泼参与街上的扫盲活动，工人成群列队高唱雄壮又非常熟悉的歌曲奔向各个工作岗位，干劲十足和热火朝天地开展大跃进竞赛。使我们真正感觉到

自己身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沐浴着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阳光。此情此景，令我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们坚信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招待所，新马难友管委会各自为政。为保留马来亚国籍身份，我们几位负责人原封不动，仍肩负起原先在船上所担负的责任。招待所几位负责人只是充当中介传达的任务，他们不会擅自提出任何意见。中央和省外事办、侨委的重量级人物不断有人下来和我们接触，态度非常亲切和认真，对我们的生活和想法十分关心。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但也不作肯定的答复。据我们所知，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北京国务院的领导，而且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

有一次，省侨委一位专事外侨工作的科级领导亲自找我谈话，她被称为邓大姐。她问我有没有新加坡或是马来亚护照，我感到一阵愕然，随即回答：“没有”。“既然没有，怎能是新马国籍呢？”邓大姐似乎对新加坡难友坚持马来亚籍的政治意义并不十分清楚，提出置疑的询问。我只能不客气地回答：“殖民统治者会给反抗他们的人民发护照吗？反过来说，我们也不会承认他们的护照，除非作为工具使用”。我还理直气壮地告诉邓大姐，殖民地的护照将随着马来亚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而作废。作为支持世界革命的伟大社会主义中国非常清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决不会让与它作对的革命斗士拥有合法的政治权利，这是全世界革命者的共同认识。几句话，邓大姐只有点头默认，不作反驳。

在三元里华侨招待所住了几天，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周年国

庆。一片欢腾的气氛，红旗飘扬，国旗高挂，“欢度国庆”四个大字红幅悬挂在政府各个部门和公共场所的显眼处。大喜节日带来的不是吃喝玩乐的热闹，而是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高潮。这时期的中国为了振兴国力，奋发图强，把节日的喜庆化为建设国家的动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不管是多大的夸张，却给我们这批初到中国的“难侨”注入了多大精神剂？我们得到了启发性的强大动力，对新加坡人民的反殖斗争很快就会取得胜利充满信心。

国庆节过后，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国家干部更加意气风发地发出总动员，所有机关干部要到最艰苦的生产前线参加劳动。华侨招待所接待处贴出宣传动员令，我们新马难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激情澎湃，谁都不甘落后，纷纷报名参加，决意要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献砖添瓦。第二天上午，一份光荣榜贴在布告栏里，列出了参加前线劳动的名单，我和李桂珍、吴文斗、陈国伟、邢福源、张文友等十几位新加坡难友及马来亚多数难侨榜上有名。没被列入名单的新马难友都感到失望，他们热烈祝贺我们光荣上阵，创建功绩，为马来亚人民争取荣誉。参加前线劳动的队伍，旗号打的是“广东省干部大炼钢铁师”。师长由广州市朱光市长当任，省侨委吴风主任是副师长之一。我们已列为干部队伍，属广东省侨委参加前线劳动的干部。队伍来自全省各个政府部门，以军队化编制组织一个劳动师团。目标直奔粤北清远县矿山地带。我们隶属于某团第三连，连长是一位处级干部的湖南军人，讲话带有浓厚的湘音，我们这些来

自新马的难友，几乎没有一个人听懂他的活，但略可了解他的意思。我们来到矿山，正值初冬时节，到处一片荒凉，秋叶已落，青草变黄，遍地稻禾未曾收割，垂倒在广阔的田野，工农商学兵都奔向大炼钢铁的洪流里，农副业生产几乎都要服从大炼钢铁的需要而未受到重视。人们可以看到的是矿山脚下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分散在各个空地，把从矿山爆出来的含有矿铁的石头猛力敲碎，再运往高炉用焦煤和石灰石把它炼成含炭量很高的原始生铁。为了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伟大号召”，年产量壹仟捌百万吨钢铁的超英指标也包含着这些土法炼钢的“成果”。参与大炼钢生产的每一个人都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长期生活在热带的新马难友，寒风吹来，感到格外冰凉。我们的劳动，主要是敲打碎石、烧煤、搬运、挑砖等重活。每星期五晚上九至十点钟我们还要步行到深山里挑炭到炼钢工地，路程五六十公里，山高路窄、崎岖不平，来回要走三十多小时，干部们根据自己的体力，能挑多重就多重。工作从早上做到晚上才休息，除三餐外，没有规定上下班时间，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和工种，什么时候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所有苦活、重活都要干。还好，我们新马难友本就有一股革命的干劲，经历过苦难人生的磨练，在大炼钢的阵地上都表现得很出色，受到师总部和连队领导的赞赏和表扬。不过，我对大炼钢的成效有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不少和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掀起高潮的大好形势相左的意见，引来了内地干部和共产党员（极左思想）的严厉批评，甚至把我的看法上纲为右派言论。我初到中

国，对中国共产党和干部的思想认识不深，对全社会各个方面的认识更是肤浅和无知。但我非常清楚，这种扣帽子式的批评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那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不作反驳，也不作解释，最后的结论必有分晓。

整整一个月，参加大炼钢的所有干部都要写劳动体会的总结，我也没有例外。在总结书的尾段我写了两句话：大炼钢的群众热潮只有政治意义，大炼钢所造成的浪费已失去经济价值。没想到两句话换来的评语是：“干劲很大，觉悟不高”。“觉悟不高”意味着要再接受教育。果然不出所料，参加前线劳动的绝大多数干部受到表扬或政治思想改造已合格，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新马难友几乎也都回到华侨招待所接受庆功祝捷。我，还有几位马来亚难友继续被留在矿山一个月，接受更加艰苦的劳动锻炼，到山沟里去搬运堵塞溪水的大石头。但谁也没想到，这些留下来的“觉悟不高”的少数人却有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他们不是驯服工具，他们是一批有独立思考和敢于说真话的强汉。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不需再作总结，经受考验已算毕业，终于回到招待所。

招待所里已不像离开时那么热闹，显得冷冷清清。所有新马难友已被分配到各个不同工作岗位。小浪、戴伟、石君、美娜等新加坡学界难友按他们自己的要求分赴到各不同学校继续深造；其他新马难友一部分留在广州；吴文斗、梁再明等少部分难友被分配到福建；大部分都被安排到广东省北面英德华侨农场安家。PAP 武吉的吗支部秘书朱秀兴同志也被分配到该处，过着一生中认为最难忘的

苦况生活。王才安、郭大英、邢福源、林振兴、陈国伟、蓝勇东等和新加坡其它工会的重要成员早先已被分配到广州各个工厂，有一技之能的难友都能获得较优的待遇，没一技之长者只能被安排做学徒，每月只领十八元人民币，收入低微，但未闻不满的怪话，足见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品德。

我和李桂珍（当时未婚的妻子），还有染业工会主席杨高锦是最后分配到同一间工厂的。我是烧焊技工，李桂珍和杨高锦是普通工人，待遇有所不同，条件也不一样。我有创新和烧焊的技巧，为厂方解决了不少难题。吃苦在先，不受当时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严重饥荒所影响。克服困难，接受考验，以冲天的干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不到半年，就被派到武汉传授氧切生铁技术，接着又参加全广东省焊接技术比赛，获得第一名，因此得到特别重视，受到历次评比的嘉奖。中国共产党组织严密，从下到上有汇报和下达指示的纪律。我的表现很快就被汇报上去，省侨委吴风主任和罗毅处长特约我见面，并派秘书黄慧晶定期到工厂关心备至的嘘寒问暖。更令我感到不寻常的是：从北京下来的中侨委和国务院外交部主管新马泰事务的领导，一到广州就约我和才安兄前往共餐，对新马形势非常关心，对我们坚持马来亚籍的革命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表示赞同，而且还表示有这种认识的华侨，如果能认定居留地为自己的长远居所，对中国和居留地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友谊、和平共处和外交往来都是很有益的。他们的话对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我相信我们的意见已受到重视。

在讨论华人和华侨的问题上，我们也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在不同国家居住的华人和华侨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自己的国籍。但新马华人已是当地一大民族，除了自己放弃本身的国籍——马来亚籍，否则就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他拥有公民赋予的选举和被选举权，他完全有资格参政，反对外来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驱逐出境法令对我们来说完全是非法的。我们要求中国政府采取相应的对策，拒绝接收那些被指为参与颠覆当地政府的新马华人出境。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内政，与我国无关”。

当然，中国政府不能无视海外华侨像孤儿一样地受人欺凌。往往因为海外华侨的悲惨遭遇，发出无限关爱的温暖和出手搭救，华侨都会感到祖国是他们强有力的靠山，由衷地感谢祖国对他们的关怀。他们身在国外，心系祖国。我们的祖辈父辈身为华侨的爱国热诚，我们是深有同感的。然而新马华人已成为当地主要民族之一，又是作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主力，英殖民统治者早就把华人视为洪水猛兽，大肆宣传华人是中国人，华人的反殖斗争是外来者颠覆政府，他们应该被驱逐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进行这种宣传的目的：第一，挑起民族分裂；第二，诬蔑中国干涉新马内政；第三，削弱反殖力量。一举三得，阴险毕露。

总的来说，华人和华侨是依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做出分别，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却是血浓于水，差别是思想上对国家的认同。

（十八）遥盼佳讯回祖国

新加坡文化次长易润堂、立法议员陈翠娣同志突然来到广州，代表李光耀总理对我们回国一事进行试探。条件和释放蒂凡那、林清祥等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但我们身在中国，情势特殊，不能等同相论，故无法接受。

1959年5月30日，新加坡自治政府在新宪制下的立法议会正式产生了，PAP在这次立法议会竞选中的52个选区取得43个席位，成为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任民选政府的执政党。李光耀为实现其在竞选中曾作出的承诺，即PAP如果在大选中取得绝对性的胜利，一定要把在公安法令下被拘留的与PAP中央有密切关系的同志释放出来，否则不会组阁执政。为把承诺付诸实现，李光耀宣布首先有条件释放在狱中的八位领袖。接着宣布组阁，李光耀成为新加坡有限度自治政府首任总理，为新加坡开创了以宪制斗争取胜且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建国的目的，受到世人褒贬不一的评价。

新加坡有限度的自治政府，并没有权力废除公安法令，许多被拘禁的PAP基层主要干部和工会领袖仍然没有被释放的迹象。我、才安和文斗是被驱逐出境的PAP第四届中央委员，与PAP关系极为密切，重回新加坡是我们迫切的期待。李光耀并没有失信，他没有公开表示如何对待我们，但却通过党和政府的老同志到中国和我们接触，试探我们的反应再行考虑，此举已使我们深感慰藉。

1959年秋，南粤大地初凉时分，我们突然闻到一股来自新加坡的浓郁乡情气息。不知是偶然的相遇，还是特意的安排。在狱中与

我有患难之交的文化次长易润堂同志和立法议员的党妇女部主席陈翠嫦同志忽然来到广州。事前并没有通知，但很快就和我们联系上了。一见面，我们就如久别重逢的故亲，激动并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大家紧握双手不放，以互相问候的世俗关心来表达别后的思念。过了一会儿，我们才谈彼此过去的情况和党执政后的新形势以及我们的期盼。正如我们所料，他们来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传达李光耀对我们回新的试探，提出与在新加坡释放八位领袖相类似的条件作为回国的前提。即：第一，在新加坡各报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和拥护 PAP 非共民主社会主义声明；第二，在电视台重复该项声明的内容；第三，必须接受被指定的党内工作，不得参加其他政党活动；第四，每月要向内政部报告自己的行为。

回国条件不算苛刻，但个人尊严和政治生命又如何看待？我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离开自己为之奋斗的党和事业，党已经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掌握了政权。作为 PAP 前中央委员，和 PAP 有着密切关系，无条件返国是正当的权力。因此，回国的条件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唯有希望来访的老战友，能把我们重回新加坡的正当权利转告李光耀总理并向他表示敬意，也希望他能理解我们的处境，并能为被驱逐出境的新加坡反殖者早日返国尽一份力。我们相信，PAP 决不会忽视我们这些曾经为她的胜利作出贡献的被驱逐者要求重返国家的期待，我们似乎已在南粤初秋的濛濛雨雾中看到新加坡国向我们招手的曙光。

PAP 的执权力，只是管理有限度的自治政府，国防、外交和内部安全，仍然掌握在英国人的手里或者还要看英国人的脸色行事。刚刚走向自治的新加坡，看不到有英国人留下来的繁荣景象。城市、郊区和乡村一目了然地可以看出殖民统治下的落后面貌。百业不兴，工人失业，经济复兴要从头开始。PAP 政府在百废待举的殖民地时代，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开拓发展国家经济的重任。那时候，新加坡自治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民间社会的互相往来，更谈不上什么经济、文化、科学和其它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新加坡华裔人士（华侨在内）如果要来中国探亲或旅游，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易润堂和陈翠嫦两位同志在 PAP 执政后不久就来到中国广州，令人猜测这是新加坡政府有意打开和中国接触的大门，进一步和中国建立某种经贸关系和其它领域的往来，使新加坡从殖民地的掠夺资源经济结构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道路。易、陈两位同志不完全否认含有这方面的可能，但易却暗示说：“贡元、文斗和才安是有条件回新加坡的”。所谓“条件”，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我们具备了和 PAP 有密切关系的“条件”；二是 PAP 是“有条件”让我们回去的。易还说：这是李光耀总理的意思。这个条件的内容，就是上面所说的四点要求。我们很想回去，但身居中国，感受不同，尊严和人格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既要対得起 PAP 的召唤，也要为我们的原则立场考虑。我们不能背叛，回去是我们应有的权力。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赞赏李光耀总理没有忘记他在竞选前的诺言——释放那些与 PAP 有密切关系的成员。

✓
子
2

易润堂同志也是在 1957 年 8 月 22 日大镇压行动中被捕入狱的《新报》名记者，在狱中和我有一段共患难的交情，彼此相处甚好。谈活内容，多不涉及有争论性的政治问题。他为人谨慎，对自己的处境非常忧虑，他的妻子和家人非常关心他，常送好吃的东西到监狱里。他是知识分子出身，曾当任过李光耀的华文老师，对生活物质要求较高，与我们这些贫困家庭出生的人完全不同。但他为人敦厚老实，谈吐斯文，在狱中除了看书写文章之外，甚少参加其它活动。他和我相处只有三个多月，就被转移到中央警署暗房去单独囚禁。临走前，他还特别向我了解，我在中央警署暗房的恐怖经历。我把情况大略说了一下，他表现的非常无奈，而且忧心忡忡地离开了漳宜监狱。在两名狱警和一名政治部便衣人员押领下，带到那个被喻为鬼狱之地的中央警署拘留所，不久，就听说他被释放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陈翠嫦同志是 PAP 妇女部主席，也是丹絨巴葛支部最早期的党员之一。她出身于贫穷家庭，受中等教育，待人处世斯文有礼，言谈有序，举止大方，颇有涵养，有知识女性的气质。在当时那个年代，像这样的女性参政者为数不多，可称是一位杰出的女活动者。

我和她分属不同支部，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交谈。但每次 PAP 举行的群众大会或是中央和支部的联系会议，她总是跟着李光耀、杜进才、王邦文等人一起到达会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有说有笑。既是轻松愉快，又是严肃认真。在追求共同事业的道路上，大家都不会有陌生之感。

这次广州相见，我已说过，绝非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易润堂不说，陈翠嫦不表态，但我心里已明白。两年不见，别后如故，彼此的命运却各不相同，我们流落他乡，他们已贵为政府官员，身份可说天渊之别。我们不可能把心里话全部抖出来，只有向易、陈两位同志再三强调：希望 PAP 重视我们重回新加坡的权力，无条件地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易、陈答应会尽一切努力和办法把我们的意见转告给李光耀总理。

易、陈在广州逗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到广州站坐火车前往香港，再转飞机回新加坡。在广州时，他们住在长堤路和平宾馆。说起这间宾馆，还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著名星级酒店。当晚，易兄特别留我和才安同在酒店一起过夜。文斗兄因分配在福建，没法联系上。在房里别无他人，只有易兄、我和才安，陈住在另一房间，她也参与我们的“私会”。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我们听易兄谈 PAP 执政伊始所面对的各种困难。他说：PAP 虽然取得自治政府的权力，但还要继续争取新加坡完全独立。摆在面前的严重威胁是来自南北两个回教国家的干扰和敌对情绪，内部安全事务不能自主处理，《公安法令》的更改或废除要获得马来亚和英国人的赞成。我们这批被驱逐出境的同志除了和中央有密切关系的人外，其他人只能在废除《公安法令》之后才有希望回新加坡。新中两国的建交还言之尚早，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或会有些改变和发展，经贸关系一定会有所改善，因为对新加坡来说解决经济困境是非常重要的。一切的一切，还要靠新加坡人民继续努力，还要依新

马英三方面的合作关系以及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而定。我从他的话中感觉到回国之路困难重重，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我严正地向易兄说明，无论如何，我们这批被驱逐出境的新加坡反殖人士，真诚地为 PAP 的执政和李光耀秘书长出任第一届自治政府总理感到由衷的高兴，期盼能早日回返新加坡，在建国的新里程碑重新起步。

一夜的共聚，时间虽短，但交谈甚欢。涉及的内容范围甚广，大多是共同关心的国事，天南地北的国际形势也无所不谈。我们对社会主义中国遭逢的大困难时期和所见所闻的描述，更刺激了易兄的神经。他似乎想从中打听到一些神秘的故事，但我们到中国不久，对这个被西方国家喻为“铁幕”的中国，我们对她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不宜多评。

易、陈两位同志对此话题兴趣甚浓，一意想知道的更多，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也知道中国事不易明的事实，故也不作多言。陈翠嫦同志甚少说话，偶而插言几句关心我们这批同志的近况。她的含蓄突出了共同理解，真诚共鸣的语音，为短聚长别的惦记留下深刻不灭的印象。

十几年后，传来一个不幸的噩耗，陈翠嫦同志与世长辞了。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太令人吃惊、难过。不想在广州一别，即成天地之永隔。我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先生王邦文同志，他是 PAP 总部最早的党员之一和受薪秘书，也是当时政府的内政部长。我向他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赋诗一首表示哀思。诗的内容已记不太清，情谊却永

埋心里。

继易润堂、陈翠嫦两位同志回新不久，PAP 中央委员陈维忠律师也来到中国访问。中国外事办林沙南处长和另外一位副处级官员从北京到广州热情接待他。我和才安、大英有幸被邀请陪同陈维忠同志到省内几座大城市参观。他的见闻不少，无所不谈，而且十分风趣。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初学走路的小孩，对中国这个巨人的伟大风采甚缺认识，一切都要从新开始。陪同他参观各地的林沙南处长，是一个学识多才的外交家，对陈维忠律师的谦虚言谈，报以感谢之意。我们每到一处，都有当地领导出来热情接待。足见作为外宾的身份，所受礼遇多么不同。“外宾”是国际关系的统战对象，也是体现国家对外关系的礼节，中国在这方面是做足工夫的。

陈维忠同志对 PAP 执政后的形势谈得很少，倒对中国社会的各种新鲜事物感到莫大的兴趣。对于我们最关心的回国问题，他却表现的非常轻松，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困难，他的态度和表情，我们明知这是随口而言，但也给我们一些安慰、鼓舞，有了希望和信心。

（十九）新中友谊现曙光

“五一”劳动节，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喜见蒂凡那同志和他带领的职工代表团。他们是应邀前来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我们久别重逢，心中有说不完的话，看到那座阻隔新中关系的厚墙已经爆出裂痕，我们为之高兴。我们希望这道厚墙的裂

变成通往新中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1960年4月30日国际劳动节前夕，我、才安、郭大英三人受邀到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兴奋地见到来自新加坡的老朋友蒂凡那同志和他率领的职工总会代表团。他们是应邀前来北京参加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的。

蒂凡那是一个稳重和成熟的政治活动家，经验丰富，处事老道，为人有情有义和见多识广，是PAP建党发起人之一。他曾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成员，在紧急法令下坐过牢。他的反殖历史和社会活动背景已为他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这次率团来华参加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对我们来说，正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畅所欲言，大谈PAP执政后的内外政策和发展方向，李光耀总理对林清祥、方水双和他本人等的安排以及各人所持的不同态度等。他十分健谈，分析时局非常清楚，对新马左翼运动存在的老问题，认为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应该彻底改变，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策略。他强调：“团结在PAP周围，支持李光耀的施政方针。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反殖斗争要继续，经济建设更刻不容缓。左派应该自律，不要动辄就反对PAP和李光耀。要体谅那些被释放出来的政治领袖在他们被安排的工作岗位上的难处，过于不实际的要求会弄巧成拙。要顾全大局，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希望自己能在在这方面尽力而为。

蒂凡那谈到这里，流露出他对左翼运动的无限忧虑，对国家发展前途的忠诚。我们和蒂凡那相见之前，已在中国住了一年多，同

中国管外事的相关部门不时有交换意见。通过思考和结合自身的经历，体会到蒂凡那对时局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深有同感，团结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是政治稳定和兴旺国家的强国之道。PAP 执政，李光耀总理初掌大权，党内团结，政之完善，民安社稳，至关重要。我们很赞同蒂凡那的意见，左翼运动应该调整自己的步伐，在新的不同历史时期，在 PAP 获得民众广泛支持且取得执政的有利条件下，一切都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配合。争取主动，沿着民主的程序缓步前进，这才是明智之举。

和蒂凡那代表团在北京游览名胜古迹的几天中，与日俱增的感情使我们有说不尽的内心话。在这些日子里，北京有几位同时被驱逐出境的新加坡学运好友方小浪、林戴伟和郑敏娜等也亲访了蒂凡那代表团。蒂凡那还带领我们到他的老师沙尔玛先生家里和他的家人见面。师生相聚，格外兴奋，不在言下。我们初次见到这位早期反殖的民主运动老前辈更具敬仰之心，因有共同的理念，很容易把我们亲切的感情溶化在一起，我们很快就建立起真诚和亲密的友谊。

沙尔玛和他的夫人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上午十时左右我们就到达他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外宾宿舍住所。这是一幢有电梯的高级大楼，每单元约 1500 平方尺，三室一厅，墙壁和地板全是木制板，傢俬和所有设备是国家免费提供的。这幢大楼的外观和内部装修在当时的北京可算是一流的。我们在沙尔玛家里做客，中午在电台的华丽餐厅用餐，过后，和沙尔玛全家一起合照，以资留念。我们的

欢聚总有说不尽的话。蒂凡那凭其多年从政经验，大谈对新马形势的看法和各种猜测、预见，还谈论到国际形势的发展等。其话锋犀利，语出精彩。他说的是马来语，但也用少量英语交叉谈话，我们多能听懂他的大意，但不明他的全部。幸有懂华语的沙尔玛夫人代为翻译，小小的隔阂也就被克服了。

沙尔玛先生是前马来亚民主同盟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蒂凡那同是一个组织的同志。在紧急法令下被捕后被迫离开新加坡，前往印度，再转往英国。不久又被中国国务院聘请为中央广播电台英语专家，专职英文翻译工作。相同的命运，共同的信念，铸就了我们之间天长地久的友谊。我在北京居住长达八年多，常有来往。每每在一起的时候，都离不开对新马大事的关注和畅抒各自的政见。我离开北京到澳门之后，不久他也移居湖南。其间他和家人也到澳门找我叙旧，并在我家住上数日之后才返回内地。中国和新加坡建交之后，他因长期患有糖尿病，在得到新加坡内政部的特许之下，回到魂牵梦萦的国家。但非常不幸，由于糖尿病引致其它并发症，回到新加坡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至今我和我的太太及子女们还经常有联络。每年圣诞节前后，我照样接到他们寄来充满友情问候和祝福的贺卡，我也同样寄贺卡给她并祝福她及家人。

蒂凡那同志和他的代表团结束了北京之行。在经广州回国之前，由全国总工会通知了广东省总工会，转告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负责人，特约在广州工作的新加坡 37 批难友到和平宾馆宴会厅聚会。分散在广州不同单位的 20 几名难友一听到这个消息，都雀

跃万分，踊跃赴会，无一缺席。这时候，蒂凡那不但是新加坡职工总会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而且是难友们寄予回国希望的“通天使者”。大家欢聚一堂，互相拥抱和热烈握手，有说不完的别离思念和患难之交的深厚感情。平时，在广州的难友，大家各就各位，很难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如今借蒂凡那同志和代表团的光，在广东省总工会的领导人面前，显示出新加坡难友的战斗友谊和革命激情。看到这感人的场面，省总工会的领导赞叹地说：“难得见到大家，你们不愧是新加坡革命的优秀战士”。蒂凡那同志当即感谢回答说：“谢谢中国政府对我们这些兄弟的照顾，我们这些兄弟迟早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的”。他的这句话，激起大家的热烈掌声。大家心里明白，也非常相信。蒂凡那兄弟的话是出于真诚的，没有任何虚假的谎言。他说出了每一个被驱逐出境者的热切期望，发出对难友们的关怀和鼓励的声音，再也没有比这更珍贵的心照相应。

更令人难忘的是蒂凡那同志出色的外交才华。宴会刚刚开始，作为东道主的中方总工会代表照例致词敬酒，说些有利于中新两国政府和人民友好关系的赞语和结尾的习惯祝词。省总工会领导读完讲稿之后，高举酒杯大声请在座的宴宾共饮：“为祝愿中新两国政府的友好关系、人民友好的往来；中新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密切合作；贵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健康；以蒂凡那先生为首的新加坡职工总会代表团和在座的新加坡朋友们的身体健康干杯”！话音刚落，同声共饮，只见蒂凡那同志轻轻地再举着未喝完的酒杯，带着温和友好的口吻向东道主说：“请允许我向东道主表示小小的抗议”。在场的

中方人员和每个与会者都感到很愕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大家还来不及怀疑，只听见蒂凡那向主人的祝词作了补充，高举酒杯用宏亮的声音说：“让我们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身体健康干杯”！此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同声高举杯中酒一饮而尽。接着掌声不断，整个宴会充满着振奋人心的欢乐。大家都赞叹蒂凡那先生在外交场合的急智和敏捷反应，把主人漏说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十分重要的话作了完善的补充。中方总工会负责人对此也许感到一丝尴尬，因为“为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身体健康干杯”本应由东道主自己来说，蒂凡那的补充只是幽了东道主一默，并无损大雅。

蒂凡那代表团一行结束了在广州的访问，我、才安、大英和大多数难友到广州火车站送别。在即将别离的短暂时刻，他热情地和我再次拥抱，分别的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热泪盈眶地用马来语激动地向我们保证：“Kita mesti boleh berjumpa lagi di-bawah matahari tanah ayea kita”（我们一定能够在祖国的阳光下再见）！他的话犹如一股暖流透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似乎看到在浓雾密布的祖国已露出一线曙光，正向期待回国的难友们招手。约十分钟后，他们登上前往香港的列车，安坐位子又把头伸向窗外，一再重复已说过的话：我们一定会再见面！一定……列车缓缓地向前移动，我们依依不舍的挥手告别。再见，祝一路平安！祝一路顺风！在祖国阳光下再见！列车的窗口露出代表团亲切的脸孔，手在挥动，脸影渐渐地隐没，我们怀着一股说不出的期望、惜别和真挚的感情

离开了火车站，茫然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二十）调往北京受益多

不到半年，就是 1960 年伊始，南方春寒不觉冷，但北京的冬雪却送来了喜讯。我和怀着身孕的太太、才安、文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以新加坡客人的身份调往北京另作新的安排，约定第三天启程，不需带行李，只需带随身御寒衣物便可。广东省侨委和外事办的接待人员亲自到我和才安的工作单位帮助办理离职赴京手续。时不待人，第三天，接待人员很快地把我和才安送到火车站。省侨委和外事办的负责人早在车站等候和亲切地欢送我们。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正式告别广州，踏上新的人生旅途。

直通北京的火车向北奔驰，一离开广东之后，寒气逼迫而来，火车虽有暖气，但不足于抵寒，需不时加衣，方不觉冷。在火车上，我们无暇观赏一路上的美景大好山河，我们只是思考着到北京之后我们要担当什么角色。经过一天一夜的火车劳顿，第二天早上九时正，我们乘坐的火车终于到达北京——那个被誉为是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崇仰和寄予希望的革命之都。

我们一下车，感到酷冻难忍。原来这一天是北京入冬后最冷的一天，零下十七度，七级寒风猛力吹来。我们穿的是南方御寒衣物，只能适用于中秋初夏。当我们还来不及走动时，双脚已经僵化。幸好中央国务院外事办的有关领导早就在车站的贵宾室等候我们，他

们的接待人员在列车刚停下来时，就向我们下车的门口热情地走来，把他们手中捧着的大毛衣披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迅速拥簇着我们到最近的贵宾室和几位领导见面。室内暖气如春，负责马泰菲办公室主任李华先生等热烈地和我们握手，并代表国务院向我们问好，非常关心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更为我们的未来说出个大概。有关领导说出的话，是代表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器重和期待。使我们感到格外的温暖和鼓舞。毫无疑问，我们将会登上新的人生舞台。

李华主任在谈话中明显地告诉我们：“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客人”。朋友加客人，正是中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我们一年多来坚持马来亚籍的明确答复。我们也清楚知道，这是 PAP 执政不久对外关系的突破。自治政府利用有限的施政权力，敢于冲破英方和马来亚的封锁，以半官方的形式向中国政府表示友好往来的取向，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重视和赞赏。我们作为 PAP 前中央委员，中国政府以朋友和客人相待，正是对 PAP 执政的最大支持，对李光耀总理寄予厚望的一种表示。我们感谢中国政府，也为 PAP 取得执政的自治政府初获战绩而感到高兴。

短暂的欢谈之后，由郑宏处长和林沙南处长亲自送我们到北京华侨旅行社暂住，然后再作安排。在我们到达之前，文斗兄已先我们进住了。分别一年多的我们，梦想不到又能在一起，内心的激动，难以抑制的狂喜，使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只归结一句话：感谢中国政府的安排！

为了先安置我们的居住，外事办接待人员提出几个较为高级的

住所，都被我们回绝了。我们知道，在当时，北京住房非常困难。一般有家庭的处级以上干部，住房不会超出五百平方尺，有家庭的普通干部也只能住上二百平方尺左右，这已算不错了。相当多干部都没有这个条件，他们都在等待单位按条件分配房子。我们作为中国客人，不应该也不能够享受特殊的待遇。因此，我们统一思想认识，决心向中国表明心志：“我们愿意同中国人民共甘苦，不求特殊照顾”。我们的坚决态度，得到外事办的多方赞赏。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得到优越的照顾，我们被安排在中侨委干部宿舍居住，家居设施具备，不需劳神。就这样，我们既有固定的居所，当然也就要开始翻开人生的另一页——在自己的生平写上另一段小史。

外事办已为我们做好了学习的准备，安排我们在北京张自忠路人民大学学习社会科学理论。包括马列主义学说、革命运动史，还有政治经济学、逻辑学、哲学等，我们只学习了两年时间，有了一些基本知识之后就告结业。

但我们并没有就此终止学习，外事办征询我们的意愿，为我们的学习再作安排。为充实自己的知识，为配合新加坡政府李光耀总理一再强调以马来语为国语的长远民族政策考虑，我们选择学习马来语。外事办非常支持我们的选择，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它是沟通民族情感和相互了解的一道桥梁。学习马来语，是有利于促进马华民族团结和融合民族感情的，是对推动新中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于是我们被安排在北京魏公村外语学院学习马来语。

在北京，我们得到国务院外事办的热情接待。他们把我们当作新加坡客人，对执政的 PAP 表示友好感情，希望通过我们和 PAP 的关系，为中新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微尽帛力。尽管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中国政府仍然一如既往地各个方面一直关心着我们，从不改变热情待客的态度。

对于客人，中国政府向来是有所保留的。国家大事，世界大事，除了报章上刊登的消息之外，他们不会和你谈论其它事情。同样的，他们也不会向你作出什么指示。他们尊重客人的意见和自由选择，并为客人的需要尽力而为。

总之，我在北京八年，犹如在一个藏宝的深洞里探宝，但自己不是鉴宝专家，不会取得一生享用不完的珍宝极品。只能说，没有白过，不会毫无收获，也不会大有收获。归结一句：受益非浅。

经过五年，在完成马来文课程的最后一年，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破坏，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混乱引起我对中国政局的忧虑。作为客人，我置身度外，又无所事事。中国对我作出的保护，令我感激有加，但一般老百姓并不了解，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特殊身份，猜疑成为社会的风气，我不得不考虑离开中国。

1969 年上半年，我写信给国务院主要领导人说明我想离开中国的想法。不久就得到回复，先以挽留相劝，后尊重客人之自由选择。于是，1969 年 6 月 1 日我携带着家眷离开我居住和学习达 9 年的北京，展转于港澳之间。

在我离开北京之前，正是文革造反派得势乱政的时期。他们怀

疑一切，打击一大片。不少党内的高层领导被打成反革命、叛徒、工贼、里通外国、特务等。那些和外国有较多接触的各界人士都成为特嫌分子。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处境微妙，随时有被监视和跟踪的可能。作为中国的朋友和客人，只要我们安份守己，我们不会有任何麻烦。当我要离开北京时，他们要按“革委会”（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办事。强调要有敌情观念，为我的安全起见，不宜用真名在澳门居住。只能改名，否则，便有危险。所以到澳门的通行证，我改名为陈力。

在澳门我住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困守在一个不到八平方公里的半岛，人口只有二十几万，一种单一赌业的经济形态，带动其它与旅游行业有关的商业发展，是不可能解决当时澳门社会问题的。我到澳门，除了自寻生活出路之外，也希望能有机会见到新加坡朋友，更希望能创造条件回到新加坡。但澳门如此闭塞，半年多来，几乎与世隔绝，希望成空。因此，我反复思考之后，决定到广州请求国务院再给予帮助，申请全家往香港定居的通行证。老天不负人愿，广州有关部门的“革委会”，不久就来见我，转达上级会尽量给我方便。同时再三强调，香港不同澳门，香港的现在和新加坡的过去同属英国统治的殖民地。他们有互通情报，对过去反英人士都不会放过。你要到香港，一定要考虑安全，改名换姓也许是有保障的。一席话把我镇住了，“文革派”警惕性高，敌情强，一步一惊心，草木皆是兵。我要到香港，只为生活，并无任务。中国政府给我方便，只因我是中国的朋友和客人，为了我的安全着想，也在情理之

中。但“文革派”却为我出主意，确实令我意料之外，但无论如何，我不能拒绝他们的好意。转往香港我用母亲的杨姓，加上一个新字，凑成一个名字——杨新。这就是我现今的法定名字。

（二十一）在北京的日子

想起在北京那段日子，除了学习之外，应该有些事值得一提。中国待客之道，热情有加，礼义为重，关怀备至，无私帮助。居住在北京的世界革命人士，所受的政治待遇尽是如此。我以自己深受的体会，写下一些段落以作回味。

我、文斗、才安以新加坡 PAP 前中委的身份受到国务院外事办的接待，生活和学习都得到妥善的安排，经常组织我们参观名胜古迹，革命圣地，风景名城，偶而还让我们到外地看看，并安排当地政协委员和爱国民族资本家和我们见面。吃饭谈活都离不开颂赞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

一年里，有四个节日，即：元旦一天、春节三天、五一劳动节一天、十一国庆节两天。每逢节日，国务院、政协、统战部、侨委、侨联等中央单位都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有盛大国宴、宴会、茶话会、游园会、精彩表演等；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检阅极其壮观的百万游行队伍等。所有这些庆祝活动，我们都会荣幸地被邀请参加。发给我们的请柬上都写着先生两个字，“先生”代表着不是共产党同志，是局外人。我们在北京的身份是反帝民族主义者，是中国的的朋友，不是兄弟党的同志。李光耀一直错误地把我们看成是马共地

下组织的活动分子，中国共产党是最清楚我们的背景的，他不会轻易把我们列入同志的称号。

居住在北京达九年之久，有八年的时间被邀请参加盛大国宴和观看天安门前的庆祝大游行、放烟花，还有各单位举办的茶话会等。由国务院周恩来总理邀请参加国宴的外宾有来自世界友好国家的元首级人物和祝贺代表团、有兄弟党的同志和国家的首脑、有各国驻京使节、反帝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运动者、在京的外国友人，还有中国各民主党派、大资本家、文化界、演艺界名人、华侨、华人和港澳知名人士……多数是一些老迈健壮、神彩奕奕的社会贤达。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国民党高官和起义军人，具有名望的是福建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他高高瘦瘦，谈吐举止像个文人。他的起义事迹早已被传颂。在茶话会上我和他有过交谈，留有印象。其他与会者，也多有接触。国宴盛况，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旧朝特殊人物出现。1961年国庆节，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席上，有一位令人惊奇的特殊“国宝”被安排在我、文斗、才安身旁，他就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

他的出现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皇帝”难得一见的龙颜，封建统治的一人天下，四品大官也不易亲近其身，而今他却和我们同桌共宴，畅叙身受，谦恭有礼，看不出有帝皇之相，毫无帝皇之威，平民一个。我们谈笑风生，对皇宫的清规戒律，对皇帝的起居饮食，都无所不谈。我打趣地问他，“像我今晚坐在你的右边，应属何种官职”？他随口而答：“右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品大员，不

管是真是假，那是趣谈。他还告诉我，他已写了《我的前半生》一书，还没有出版。当晚的座席，是国务院领导安排的。溥仪“皇帝”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大赦战犯刚被释放出来的伪满州国第一号人物，如今受邀参加国庆盛宴，坐在他身边的人是来自新加坡的客人和相关部门的领导，溥仪心有何想，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却感到事非寻常，意义重大。

谈话中溥仪非常感谢共产党对他的改造。他说，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把他从腐蚀霉烂的寄生虫生活，改变为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过去连穿衣吃饭都要上百内侍和宫人为他服侍，动辄骂人、打人、关人。他高高在上，唯我独尊，满朝大小官员和下人就是他的奴隶。做什么事都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他和历代的封建君主没有两样。他自感对不起人民，他是罪人，他还要继续努力改造，争取下半生能为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他的每一句话，都引发我们的深思。一个封建王朝的帝皇，残暴无情的统治者，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罪恶累累的战犯。在中国人的眼里他十足是个大汉奸，但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把他关了一阵子，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思想教育，使皇帝变为平民，使旧人变为新人，让敌人感谢自己，替自己作宣传，说好话，唱赞歌！为我所用。足见共产党改造人的功力是何等之深！

节日大庆，各次宴会、茶话会和其它任何集会，我们都有机会和不同阶级，不同层次各类不同人物接触和交谈。类似溥仪皇帝

的国民党战犯，被改造好的大资本家和一些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他们大部分是被视为从反动、右派改造过来的统战对象。除此之外，知识界、文化界、演艺界全是社会上层的知名人士。我们被邀请参加大庆节日的盛会，让我们更多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统战政策，同上层社会不同类型的人士打交道，有利于对他们的认识，了解他们的思想，反思自己的过去，改变自己因长期生活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队伍中产生的狭隘的偏左意识，及脱离了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广面认识。事实上，我们正在接受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改变，而我们也在有形无形中自我改变。

席卷全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眼看着成千上万的群众高喊着功歌颂德和怒气冲天的口号，不知所谓的横冲直撞。中共中央除了毛泽东主席和站在他身边的某些高举派的“战友”之外，从上到下的各级领导干部无不受到莫名其妙的冲击。那些接待我的领导干部、与我有交情的民主人士、开明资本家也不例外地被斗得死去活来，而冲击领导干部和打倒一切的那些被利用为工具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和图谋不轨的战友，最后也落得悲惨下场。看到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动荡，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翻滚。我是新加坡客人，外宾身份。我可以看，但我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会议，更不能随便说话。内外有别，理在此中。看到老革命干部被斗；看到好朋友被戴上高帽；看到他们低头弯腰的苦状、被揪打罚跪和严重受伤的惨叫；甚至看到个别人被折磨至死，我禁不住要想冲上去打抱不平，但我完全无能为力，我不能在狂人恶棍

的肆虐中盲动。

我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极左派对人性的严重侵犯，对国家、人民、建设，以及全国的经济、生命财产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损失是惨不忍睹的。我深深地感到，新加坡 PAP 内部的“夺权”事件，固然是人为所谋，但和极左思想的分裂活动是分不开的。它对 PAP 内部的干扰，对反殖斗争横冲直撞所造成的破坏，决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般的错误，要对其本质作出正确的分析。

政党内部都有派别之争，共产党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比任何政党都要团结，没有理由会在自己的队伍中造成如此混乱的局面。我经过在中国十年的生活，在北京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使我在感情上完全与极左思想决裂，正如我在新加坡与极左派有严重分歧一样。当我来到港澳之后，人生地不熟，无根、无颜、无关系，我离开北京之前，外事办的朋友告诉我，你在中国境外的生活自行作主，中国再也不能给你任何帮助和支持，一切全靠自己，请好自为之。我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终于来到第一站澳门，随后再到香港居住。

我经过艰辛和长期的努力，以刻苦耐劳的拼搏，终于为自己打下经济基础。所以我对创业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新的观感和见解。资产阶级为社会生产的开发者和推动者，付出的代价高于工人阶级，为自己的事业操尽心思，废寝忘食，能为而成，不能为而败。他们依靠的不仅仅是脑力劳动，最重要的是靠他们的勤奋、毅力、不屈的坚持精神。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动用所有的资源，创造性地为自己和社会制造财富。对国家和人民是有

贡献的。

当然，有不少人发财致富后，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残酷剥削工人的劳动价值，形成社会严重的阶级矛盾。

资本家有剥削的一面，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拥有大量的财富。但他们所付出的一面，我们不能小估，我们只希望他们把大量的财富用之于社会。为社会的公平分配作出贡献。

富有阶级的复杂性为社会制造不少麻烦，引发出阶级斗争的仇恨和社会的不安，这是社会必然存在的一面。一个开明、廉正和能干的政府一定会把社会上一切不安的因素减到最低的程度。

（二十二）往事如云

人的一生，往事如云。从呱呱落地时起，人的一生就开始了。

日本攻陷新加坡时，我刚好九岁。在防空洞里伸出小脑袋，看到一些分散的日军一面高声喊叫，一面冲锋追赶惊荒失措的印度兵。有几个印度兵跑不动，丢枪举手跪地投降，日军不加理睬，枪尖的刺刀直插其胸，印度兵惨叫一声倒地。这种残暴的惨状，一直深刻留存在脑海里。三年八个月在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新加坡成为一个人间地狱。奸杀烧抢，几乎都被我亲眼所见。心灵深处长埋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日本投降，英国取代日本重占马来亚（新加坡），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切的苦难根源都是来自外来的统治和掠夺。他们只有窃取，并不管老百姓死活。我们只有挣扎、反抗、最后投入反帝反殖民地统治的革命队伍里，也就是积极加入和参与

成立 PAP 的首批响应者。

孩儿时期，无知幼稚，在我身上，只有苦难，未尝幸福。日治年代，在污泥中打滚，在火炉中烘烤，童年天真，为求生存，做出万中无一的奇业。肌肤留痕，泪水藏心，苦难的境遇，不想太多渲染。只讲日治孩儿时期，父母自顾不暇，只能浪迹各处，苦求生计。凡有求生之道，如何辛酸苦辣，如何惊心动魄，力所能及，什么都做。记忆中：食档、咖啡店、饭馆酒家、街市小贩小商、从打杂到学徒，受尽欺辱，受尽折磨，此外还在各种手工业小作坊学做面条、切亚答叶、剥椰皮、做椰绳、开椰壳、炸椰油、捡海菜等，还有在武吉的吗美世界赌场端水和派牌、为潮州戏班挑水、为果园挑粪施肥，赚取不够一餐的零用钱。业余或抽空时间，在家干农活，种菜、种番薯木薯、养猪喂鸭、挑粪施肥、卖粪赚钱，一天至少做二十小时，长期睡眠不足，只有小睡和打盹补充体力，成为我一生中最苦脑的后遗症。有时候还要被日军强迫去做苦不堪言的童工，推油桶、捡碎石、清垃圾、为兵营打扫卫生、开沟搬泥，没有工资，只发给一小罐发黄的粗米，还要遭到日本兵肆意打骂，为了偷拿一点食品，差点死在日本哨兵的枪下。直到日本投降，我已十二岁了。幕幕苦难惊险的过去，历历在目，但并不是童年的全景，只是生活的简历而已。

战争结束，正适少年时期，父母穷困一生，儿女成打以上，死的死，送的送，只留下一女四男，我排行第二，延续着日治时期的挣扎，穷困到无以为生。父亲找到一份最劳累的在石山场打石搬石

的苦工，后又在裕廊蔡源丰胶厂背湿胶，日做十二小时，还赚不到一家人的饭钱。我的读书，成为父母最大的压力，不给读书，父母心里有愧，供读书又无能为力。我受尽苦难磨练，思想较早成熟，自告奋勇地自己找钱交学费。一早四点钟，就去街边帮助炸油条。五点钟未到，人们还没起床，我就提着两大篮油条到居民区叫卖，把人吵醒，但更受欢迎，人们不需为自己的早餐繁忙。六点钟后，基本完成任务，约赚取一元几角，既可交学费，又可帮补家用，为父母分忧。

小学只读五年级，因没钱交学费，自告停学，改读夜校，偷闲看书，略有收获。父母深感内疚，无钱给孩子读书，又不能让孩子一无所长。为了我的将来，他们千方百计请求亲戚帮助，学习一门谋生技能，以备长大之用。经过送礼、上门讲好话，母亲的真诚，感动了亲戚，终于把我领到武吉的吗八英里的谦拜铁厂当烧焊学徒。烧焊亦名电焊，易学难精。我在这方面颇有天份，不到一年时间，就可以完全独立操作，两年后，我已是驾轻就熟的名焊工。修船、驳油管、焊油库、切坦克钢板和各种大小工程的焊接工作。至此以后，我就是名符其实的焊接工人了。但是除了焊工之外，我还从事不少其它行业。如：码头工人、地盘搬运、挖鱼池、开小店、做小贩……总之，只要有工做，不会作选择。

我的工作，是苦活、重活，多数人不想干的活。在 30 几度的大热天，顶着猛烈的太阳，蹲在烫脚的铁板驳接油管；戴着氧气瓶在船底层修补油箱；挑着百斤以上的砖块从地盘运上二、三、四楼

供砌砖用；在炎热风雨中像泥人一样地挖掘鱼池；背着百多两百斤的糖、米和水泥赤着脚踏着发热的木板从驳船运到货车上。总之，是重体力的苦工。

从孩儿、童年、少年到青年，所经历的年代惊险重重，道路崎岖不平。苦难的折磨，无情的命运，敲打着断裂的心肺度过青春年华，锻炼出顽强不屈的性格，接受着来自不同势力的挑战，逃过了多灾多难的种种迫害：有黑社会的威迫；有富人的欺侮；有被人看不起和歧视的耻辱；有被英国政治部密探跟踪和追捕的危险；有因阅读禁书被秘密逮捕和受刑坐牢三个月的遭遇。在生死线上奋不顾身地挣扎求存，奠定了自己寻找真理的理念，为国家和民族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

经历之路，临深履薄，难以描述。微不足道之世俗，平庸无味的世间事，多不可数。我不可能也不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在这篇文章里。《人生路短话往事》，并不是一生的往事，而是在一个特定历史环境里被圈进是非漩涡的不幸者不能不慎重声明的历史。很可惜，知道这段历史的许多参与者和老朋友部分已不在人间，虽还大有人在，但也都已步入老迈之年，对失之已久的陈年旧事也只能一闻而过，再无往日之热忱。

而我！只要一息尚存，见证了自己在政治史上的伤痕，也见证了反殖历史的纯正洁白被涂得面目全非，我不能置之度外、守口如瓶、无动于衷、视之不见。我得讲话，把自己参与和最了解的那段暂短的历史真相讲出来，不要为后人留下遗憾的错觉。

（二十三）小结

《人生路短话往事》，把自己值得一提的一些被历史无情卷进漩涡的短暂经历、生活片断略作记忆，澄清那些恶意加罪的传说和一些被误导的错误，也揭露那些别有用心者采取不择手段嫁祸他人的可耻行为。我们是一批最纯真、最坚贞和最无私的反殖青年，我们除了不向压迫者、剥削者低头之外，我们别无野心，更没有丝毫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一切欲加之罪，一手遮天掩饰历史真相的制造者，他们在心灵上将不会得到安宁。

从 PAP 成立就为党的筹办工作日月不息地奔走，广泛地联系人民，接触群众，在市中心、郊区、乡村和最贫穷的聚居处，哪里没有我们的足迹？为了扩大党组织，我们选择区域，联络觉悟和积极性较高的被压迫者共建 PAP 支部、分部。在火热的反殖斗争中我们站在最前线，没有畏惧和退缩的丝毫妥协，只有一心一意为反殖的胜利和实现新马早日独立而全力以赴。

当英国人和他的傀儡政权向国人的反殖运动施展魔爪横加摧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可敬同志英勇入狱，但他们并没有忘记斗争还在继续，还要面对更加严酷的考验。事实上这一切在随后的乱局中得到充份的证明。

一场“夺权”的谎言引出无数疑团的困惑，不少人不理解，只能人云我云受误导，不作思考全信不疑，或是半信半疑，也有完全不信。但那些别有用心者，横加诽谤、污蔑，醜化反殖队伍，制造

混乱，破坏团结和统一，转移斗争目标，置“夺权派”于死地而后快，保护自己，自圆其说，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们虽蒙上这个罪名，但并没有气馁、松懈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各种努力已耗尽的无奈之下，我们都是从全局考虑整体的利益。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我们都会作出反击，任何党遇到的困难我们都敢于去承担。在来势汹涌的狂风恶浪中我们顶风而上，终于我们遭到了“没顶之灾”。

我们坐了十三个月的牢，接着被英殖民统治者和他的代理人强行驱逐出境。离开了孕育我们成长和我们为之战斗的新加坡，到一个我们完全陌生和未曾到过的国家。但我们并不后悔过去所做的一切，我们感到骄傲、安慰和坚信自己的信念一定会获得实现。短短未到一年的时间，在中国广州我们就听到祖国传来的捷报：PAP 在立法议会的选举中获得大胜，李光耀组阁执政，成为新加坡自治政府第一任总理。

这只是胜利的第一个响音，面对的还有许多未知数。我们深深地感到，兴喜的现在，不是既定的未来。深度和全面的思考，明白的告诉我们，一切未来的不知数，只能寄托在形势的发展和人为的决断，不应存有任何幻想。我们对 PAP 执政后的形势作了充份的估计，早已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进行了分析。我们对回国继续参与政事活动抱着热诚的期待。我们不求恩赐，只讲尊严，坚持等待不是我们的性格，但我们会坚守下去。

一年之内，从易润堂次长、陈翠嫦议员、陈维忠律师，直到蒂

凡那职工总会代表团，都是 PAP 中委会和政府的重要成员。他们的到来，毫无疑问，决不可能是纯属私人感情探访，那只是一种尝试。一方面，与实现李光耀竞选承诺释放那些与 PAP 有密切关系的同志有关；另一方面，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不稳定情况下，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向那些一直关注我们被驱逐出境的人民发出团结的讯号；第三方面，自治政府初建伊始，社会民生压力如山，国家经济发展迫在眉睫，内忧外患不时威胁自身的安全，依赖、寻求大国经济上的支持和开拓市场的积极努力是执政党面对的不容忽视的急务。

李光耀向来对中国没有好感，执政不久后来个 180 度的转变，确实让人另眼看待。主动派员到访中国，固然象上述提到的与我们的事有关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向中国示好，并试探中国对 PAP 执政后的态度，寻求开拓中国市场，以利于新加坡向南北两个不同民族回教国家对她的夹击作出布署和回应，向拥有 80% 以上的新加坡华人派发“定心丸”。

国与国之间，决不会有永远的敌人，也决不会有永远的朋友。同样的，也决不会有永远的友善和不友善，一切都基于双方的各自利益出发，任何一方受损了或是小小的争议都会引起事态的变化。PAP 从自治政府走向和马来西亚合并，再到脱离马来西亚，另建完全独立的新加坡这个历史过程，足以说明这个道理。李光耀对中国的态度时而攻击，时而批评，时而说公道话，时而表示友好，这些话到底是否本意，还是权宜之计，令人难以捉摸。我们希望促进新中两国友好，不愿听到一些不利的言论而感到失望。

新中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不涉政治层面，在经济贸易、文化领域开展合作。中国出于广交朋友的诚意，一再向我们提出为推动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共同努力，希望我们能起桥梁作用。我们也愿意做搭桥匠工，为这项工作做出微薄贡献。但新加坡的政局风云难测，无力辨别方向，虽有心插柳却全无收获。

我们确实失望了，但我们并没有愧对新中两国人民。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新两国不但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在各个领域都有了广泛的合作和良好的发展。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更乐于见到这种良好的发展不断延伸，不断扩大，不断地为两国的永恒友谊焕发光彩。

深藏心中的话

离开新加坡已有半个世纪了。在中国以一个新加坡人的身份住了整整十年。在那段时间里，我不断地关心和注视着新加坡（马来亚）社会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把自己放在新加坡公民的位置上去思考新加坡的未来，为新加坡的兴衰有着分担责任的使命感。

随后，来到港澳居住，一眨眼就四十年了。在中国做客悠然惬意的心情已经完全消失，摆在面前的是为自己和家庭未来生活的忙碌。这里没有任何时间、空间由你选择，现实就是要面对，要解决。已经脱离的往事再也比不上现实的重要。新马形势的千变万化只能悄悄地勾起我的注意，但并未引起我的重视，充其量我是把他看作一项重要的新闻。

很自然，现实生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但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对我来说，还有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当地消息的来源，不是抬手就有读物。很难看到新马报纸和一切传媒资料，过去的消息多已逝去，过去的资料更无保存，一切全靠记忆。写下的这篇往事，没有引用任何资料来源。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不一定很准确，不少共事的志同道合者的名字有的已记不起来，看法和评论难免有瑕疵。但无论如何，忠于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一点也不含糊。

把“夺权”的虚构历史，五十年后再掀开来，到底有什么意义？真实的一面早已被掩盖了，还能有多少人相信？对于写这篇文章的当事人来说，除了老一辈之外，中青年一代应有对历史求知的探索。我们的时代是一堆废墟，经过几番翻新之后，已进入了新时代和新的人生。社会没有辜负我们，但社会的不平依然存在。我们这一批曾为清除废墟做出努力的老人，不但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还要背上历史罪名的包袱。往事如云，一切已随之而去，但心中的重担一直没有放下来。历史迫着我去揭开这个盖子。

作为 PAP 早期的老党员，其真正的党龄也只有三年。从党创建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三年和五十多年那只是党十八分之一的的时间，实微不足道。但那三年的时间，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年代，是同黑暗进行激烈搏斗和烽火朝天的年代，是新加坡社会大变动、在政治上处于更替的阵痛年代，是最值得 PAP 大书特书的历史记载、最光辉的年代。那是不应该被遗漏的历史空白。

社会是进步的，只要回头看看过去和面向今天，我们会发现自

己的渺小，不应为自己受到的委曲而耿耿于怀。正因如此，通篇文章除了对那些造谣、说谎、诬陷、诽谤和无中生有的言论进行反击外，主要集中在对“亲共”和“夺权”事件的扭曲作出平直的说法。对伪造历史的醜行不能文过饰非，我们可以像耶苏一样，钉在痛苦的十字架后再复生，但原则的极限也只能至此为止。

三年的短暂历史，并没有太多的记忆，可要写的东西却不少。所经历的事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只有受历史洪流冲击的那一部分，才会感受到切身的伤害，才会有治伤痊愈的需要。默不作声的忍者，也会在极端痛楚的怒火中发出吼声。

不少人以为，被歪曲的历史已经被写成事实，一切的辩解都无济于事，最好是让它消失在你的记忆，忘了吧！当生命告别地球之后，所有万物都已成空。

但别误会，这不是辩解，是严肃对待人生的处事原则。时间消逝，历史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借镜，忘记它就等于背叛。

半个世纪以来，每想往事，有无限的感慨和叹息。在自己生命已近午夜之际，回想过去，问心无愧。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这就是生命的价值。看到新加坡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过得富裕，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兴盛，科技千里飞跃，建设万里光辉，我们心愿已足，何需悔怨？

评李光耀

一个普通人物，有什么资格对李光耀进行评论，说东道西？但

普通老百姓就喜欢对大人物，尤其是对那些头面人物品头论足。古今中外，史记丛书，民间传说，伟人名人，无不上榜，无不被说得天花乱坠。世间本就如此，反映了老百姓与大人物是何等息息相关。

在李光耀眼中，我是“亲共”分子之一，他会认为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为自己的历史辩白。但我必须声明，这不是辩白，是真相。涉及到李光耀在 PAP 担任的历史角色不得不提到一些可能不中听的话，也必然会刺激到旧事重提的敏感度。不管怎样，历史发生的事只能如实说出，一切起因和结局绝不是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历史本身并没有错，经历历史的人也没有错，错在写历史的人——错在那些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历史撰写人。我不希望这篇文章引起误会，只希望它反映的真相能得到认同。

不讳言地说，我对李光耀成功的立国、建国和创造出奇绩性的成就非常赞服。但也不违心地指出李光耀在反殖斗争中潜意识的排共思想给左派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这种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使众多的人感到事出有因，有必要对此作出探讨和分析。

我把年青旺盛、最具拼搏的精力献给反殖斗争的大业，包括在 PAP 那段时间。PAP 最后取得反殖胜利、立国和建国的辉煌大业，我们只有高兴，不求好处，李光耀和 PAP 也不需要给我们好处，不需要我为他做粉饰工作，我也没有必要做美容师，美其言而得其欢心，讨点补偿。

既没有得到好处，又不讨补偿，还要为他说好话，照理是怨言满腹，何来公道？“李光耀先利用我们，后攻击我们，打下江山他

已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他当总理，我们靠边站，阶下囚，我们有说不完的委曲，无处可泻，还有什么理由值得我们为他唱赞歌？”不屈的反殖斗士，还带有恩怨分明的原则立场。

但我不这样想，一个人的功过先看其大节，再观其全面。也就是说，取决于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反殖的残酷岁月已成过去，胜利者启动国家的职能正是人民期待新生活的开始，一切利民的施政措施都理所当然地受到拥护，国家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民居民生、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是和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他的成败，人民会给这个政府作出最公正的评价。

反殖时期的李光耀在不同形势的激变中有许多令人感到失望之处，但其基本反殖的立场是应该肯定的。他不会像印度的甘地、加纳的恩格鲁玛、南非的孟德拉等一样付出几乎陷入绝境的代价换取国家的独立，不管 PAP 受到多大的破坏或是人民作出多大的牺牲，他都能独善其身，最后成功地掌握政权。

PAP 执政以后，以李光耀总理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大刀阔斧地全面性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用很短的时间开创了没有农业的小工业城市，解决了一大批失业工人就业问题。

当国家面临着政治的和种族的严重危机时，李光耀以悲痛欲哭的神情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走向完全独立的道路，从此而改变新加坡多灾多难的局面。

李光耀以他独特的政治手腕，把自己认为新加坡不可能独立生存的谬误改变过来，独创性地把新加坡从殖民地的废墟里建起一幢

光芒宏伟的大厦。

从此之后，新加坡全面性的经济发展为国家各个领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益民实惠，人们只能向前看，过去的辉煌和耻辱只能作为历史的印迹。

能够把人民的视线转移到追求生活的单一目标，施政者是有他治国治民的绝妙之处。不能否认，社会安定是现代人的共求。

强行独断的绝对权力，压制和排斥不同意见的干扰，隐定政局，加强专制，推行其一手操办的施政计划，成功地把新加坡建成亚洲四小龙之一。

充满活力和生气的执政者，仍有求进的毅力和恒心，在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仍不断地迈向高科技发展的道路。

各族人民已成为国家的整体，政府机构、工商企业、科技学界、劳工商贩，所有求生和活动的场所，都可以看到他（她）们和睦相处，互相交融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李光耀把民族团结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最高原则来实现他的理念，成功地减少和避免了民族冲突的隐患。

在充满贪污腐败的世界政权中，新加坡获得众口皆碑的廉政美誉。李光耀深知贪污为祸国殃民的毒药，他毫不留情地严管大小官吏收贿和严惩一切贪官污吏。新加坡成为一个相对清廉的政府。

居有其屋，学有书读，人有工做，事有人为，各行各业，各从其事，各尽其责，各施其能，隐忧虽在，却无碍事。从这方面看，新加坡在新兴国家中享有一定的地位。

一个政党和他的领导者能持恒不息地与时代并进，历久不衰的奋战精神，各族人民熔成一炉，和谐相处，共创美好生活，社会安定的大环境，执政地位不受动摇，五十年的业绩得到肯定。

李光耀有资格可以津津乐道这些伟绩。并为此感到自豪。

另一方面，在同左翼共同反殖的合作中，他潜意识排斥共产党的细胞非常活跃。他是绝顶聪明，思路敏捷，强悍主观，果断敢为的领袖性格。他怀疑一切，排斥异己，偏执成见，胸无大度的权势思想。他有雄才大略，运筹自裕的本事，但尚缺以理服众的容忍精神。他不断地观察周围每一个人的言行表现，并对他们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最后把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怀疑是“亲共”。实质上他是为马共非法活动找到一个代名词。不直接说马共，只说“亲共”。绕了一个圈子，由“亲共”分子去承担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

李光耀错误地把矛盾扩大化，把多少优秀的 PAP 精英推向绝境。使后来一些对 PAP 失望的左翼进步力量日渐消沉下去。回头看，这些人也是立国和建国的财富。李光耀若能充份地团结和把他们派上用场，对李光耀的一生将是辉煌中的辉煌。

因此，对李光耀的看法：反殖有功，功在联左。反左有过，过在攻左。独立建国，功大于过。为民施政，攻盖于过。

李光耀是受英文教育的资产阶级左派，在反殖队伍中他是中间靠左，他得到左派的支持，他也利用了左派，但他对共产党的反感较之对殖民统治的痛恨，他是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他不会把英殖民统治赶出去，他会把他们请出去。他以强烈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作

为他排共的武器。他喜欢英国，喜欢西方某些国家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他把讲英语的高层人物、政府公务员、受英文教育者、马印族的知识分子争取到自己身边，视他们为“非共”力量的基础，专门对抗“亲共”势力。

他的政治技巧登峰造极，先物色左派精英，以共同理念为号召，反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结束殖民地强加给人民的一切罪恶，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多少人在苦难中挣扎、呻吟，多少人渴望已久的民族自决和民主自由，已经有人为他们高挂希望之光，这怎能不叫他们喜极若狂？马共也许认为这是大好时机，主动出击，利用有利形势，强力推动和参加这个运动。把长期支持马共反帝反殖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全力投进支持和拥护李光耀领导的 PAP 进行活动。但他们只能是隐蔽，不能公开的，而且人数不多。李光耀心里有数，为了利用这股力量，明知人民是“亲共”的，但他在各个方面还没有建立根基之前，他不轻易表现对马共的不满。反之，他和“亲共”领袖合作愉快，偶而有政见上的分歧，也是短暂和容易解决的。他善于依靠和利用左派，在这历史的特定时期，他灵活地为自己开辟广阔的道路。联左反殖，是他的战绩。

另一方面，他冲破英国人和反共国家的疑纲，使自己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开明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实际是左派）的合作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久。他获得英国人、马来亚东姑阿都拉曼和许多反共国家的信任。他也尽量借用左派拥护他的影响力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国际的知名度，为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竭尽全

力。他成功了，他知道那些疑网已被打破，人民也相信他，他无后顾之忧之忧，他可以怂恿和肆无忌惮地怀疑和指责持不同政见的左派为“亲共”，并把他们加以排挤和打击。他反殖姿态不变，但他排共却如烈火。他认为英国人不会对他不利，共产党却会从他手中夺取权力。为了对付马共，他把大批忠心耿耿的 PAP 党员和左翼人士列入“亲共”队伍，把他们送给敌人当礼物。虽是如此，我们也不抹杀李光耀为新加坡从自治走向独立、建国利民所作的贡献。个人的牺牲已变成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若能换取人民长远的幸福和国运的兴旺，那才是生命的光荣，无怨可言。

新加坡已经成为举世颂赞的一个小国。他的成就已不需要通过任何宣传去抬高自己，李光耀的功劳也早有定论。我这里要说的是李光耀的政治思想，他充满着自信的胜利。但他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深恶痛绝，把社会上发生的政治骚乱或是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动都归于马共制造恐怖的暴力行为。我并不否认这些事实，但暴力的产生并不是单方面的，往往是由于拥有绝对权力的一方向弱势的一方施加暴力之后才发生冲突，造成场面混乱，发生动乱，以暴易暴，双方都有伤亡。对事件的起因和结果，应作具体分析。马共采取暴力革命，严重摧毁英殖民统治的基础，但也给人民造成很大的伤亡和痛苦以及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因此，PAP 主张和平宪制斗争走向自治独立的道路是得到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

人类社会的抗争，自古以来，就是压迫和被压迫之间的抗争。民族之争、派别之争、权力之争，利益之争，离不开有压迫和被压

迫的性质。一切的抗争都离不开双方武力的战斗。自从西方资本主义成熟，民主社会党人纷纷提出完善社会财富的均等分配关系，通过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政党以议会作为争夺权力的手段，采取和平方式掌握政权，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的政治制度，使社会革命可以避免暴力的抗争。

有如此优势的夺权条件，实行君主制的大英帝国早就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施政模式，欧美有些国家也相继模仿，瑞典是最成功的国家，社会民主党人长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使他成为长期执政的不倒政府。英国为保住他在殖民地的统治利益，于 1950 年开始就赋予新加坡以宪制斗争和平过度的政治让步，这是国家走向自治独立极其有利的新途径，但我们并不认识它的重要意义，视为这是一场骗局，错过了我们利用议会作为跳板，跃进政权的神坛。

PAP 的建党纲领就是要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后来李光耀对马共地下强大的活动能力感到惊慌和恐惧，为了划清和马共的关系，他在民主社会主义前面加上“非共”两字，成为非共民主社会主义。使民主社会主义加上了一层色彩。

“非共”只是表明自己的立场，谁都没有疑议。问题是突出“非共”的对立面——“亲共”。错误地把党的一大批忠实同志推到无所适从的地位。使包括 PAP 在内的从中央到支部的左翼面目都模糊了。但在李光耀方面仍不能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把“亲共”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又把这种矛盾公诸于社会，使党陷于困境，左翼受挫，历史涂上一层发霉的酸气。

“亲共”广泛存在，但很少是共产党人。抗英同盟的地下组织，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真正支持和拥护 PAP 的反殖队伍应该是占大多数。一概把他们说成是“亲共”，无疑是壮他人之势，瘦自己之身，毁自己之志。李光耀思想上的排共，我很理解。但怀疑一切，扩大矛盾和对立，却会把支持他的朋友变成反对他的敌人。他可以不在乎，但我们却为他可惜。

他怀疑党内受中文教育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亲共”分子。林清祥、方水双是他眼中的马共地下公开活动人物，凡是和他们在一起的人都是马共的同路人。

很遗憾，武吉知吗议员身份的林清祥，在参加该区竞选时，我和他见过几次面。谈话中，他是一个谦虚、诚实、易于亲近的人；他很健谈，有知识、有才华、有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力、对形势的分析很透彻和非常愿意听取意见的人；他品德高尚，不为己利，献身人民事业，关心劳苦大众，和人民打成一片，从来不涉共产党的事。说实在的是一个值得深交的好朋友。我择善、好、优、良的品德为友，决不会错。我不管他的背景，也许是心照不宣，我不能因为怀疑他是共产党而亲近或是远离他。我对共产党知之不多，但对共产党的抗日反英的奋战精神我是很钦佩的。“亲共”或不亲共，我是 PAP 的一员，我没有理由跑到别的队伍去反对自己的党。所谓“亲共”，只是合作关系密切，共同对敌，但不会也没有资格参加共产党。

李光耀也很清楚，但他比共产党更坚定的原则思想是：凡是朋

友交上他的敌人，他就不是自己的朋友；凡是敌人交上自己的朋友，他就是敌人的同路人。他把“亲共”当作敌人，不愿意把朋友同敌人区分开来，宁可打击一大片，纯洁非共队伍。

李光耀对马共一举一动的敏感度异常超温，举目所见，那些坚定反殖的劳苦大众无不显露出“亲共”的味道。尤其是那些受中文教育和讲方言的华人，只要他们敢大胆反英、反傀儡、反一切压迫和剥削，又敢于出面带头冲锋陷阵、揭时弊、讲真话、大声疾呼、号召人民，他们必是马共无疑或是“亲共”分子，李光耀的敏感度不只于此，而是处处设防，把真正的朋友拒之门外。

李光耀有很多很多的优点，这些优点是他取得一个又一个政绩的体现。人们感受到的是实惠的功德，已把李光耀对“亲共”战友的冷酷化为暖流。时过境迁，一切已被淡忘了，人们再也没有兴趣评述李光耀的过失。

但他功劳之大，众所公认。他走的是英国式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混杂的改良发展道路。他在被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废墟上建起一座显著清美的花园城市。在政治上他用铁腕的统治手段对付反对他的政敌；在经济上他把新加坡建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施政方面善有可陈。政府廉政，工商业发达，劳资关系良好，人民收入高，居者有其屋，人人有工作，社会安定，教育普及，科技发展，福利益民，种种成就，享誉世界，应是李光耀五十多年来感到最自豪的建国功业。

我们除承认这一事实之外，也得指出他在政期间的一些令人

失望之处。作为前中委的一员，不管是站在哪一个角度，李光耀的一些自以为是的决策不能不从实践证明中看到他的错误。最明显的实例就是在对新马的统一和独立方面没有一贯的宗旨。先反对分离后被迫独立建国，证明了他想借马来亚在英国施舍下的独立分一杯羹，结果错了；对华文教育的一系列讳忌排斥只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强大影响，华校学生的悟性易以识破政府的弊端和激发反抗权势的情绪。因此，断华文教育之延续，扶英校为拱柱，李光耀把新一代的新加坡华人从传统的母语教育中彻底改变，成为与亚洲价值观格格不入的黄种西方人。

另一方面，李光耀崇尚民主社会主义，但他并不主张走西方“民主共享”权力的道路。他把民主视为权力的私有财产，任何轻微刺痛民主的外皮都会视为是向他的权力进行宣战。他会像那些罔顾人权的专制国家一样，为巩固他紧抓不放的江山而不顾一切代价地向挑战者施加镇压。也许这是他认为在强化国家走向高度发展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采取的重要手段。

他提倡孔孟之道，儒家学说，就是要他的子民变成顺民，成为驯服工具。行孔孟之道就是和平抗拒民主要求的最好方法。

总之，对李光耀从政创下的功业作出肯定的同时，也要对其在掌权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予以揭示。要作细说，需要对李光耀有更多的了解。在这方面，我只能说出浅知，决不全面。众有疑议，在所难免。但无论如何，只是当作个人对李光耀一些看法。

悼战友

——林清祥同志逝世十周年

陈贡元于 2006 年 2 月 10 日作

十年的时光在我的记忆中还是昨天的事，
一位知心的战友——清祥同志在久病中与世长辞。
接到这击碎人心的消息，
战友们顿觉肠断肺裂的痛苦！

十年前经过了一段前仆后继的漫长道路，
您已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付出。
一生的功绩从黑暗走向光明，
鸵鸟也为您昂头张目。

用您的铁拳击碎长空의恐怖黑幕，
用您的鼓声化人民的恐惧为愤怒。
猛击群魔凶残的血腥镇压，
赶走百年罪恶的殖民统治。

分享胜利的果实没有您的名字，
正义的骄傲不会贪图高官厚禄的恩赐。
鄙视一切无耻之徒的奉承，
英雄的本色最忌被美化所羞辱。

恶犬的狂吠向您张牙露齿，
高大的形象不会被小人所涂污。
鲜血写下人生最壮烈辉煌的一页，
永远是不灭阳光的颂诗。

轰烈的一生，灿烂的归宿，
您已把人生最美好的高风亮节留存青史。
十年匆匆过，您在国人的心里永远不会有丝毫的孤独，
安息吧，战友！魂已归去，名留千古。

补充 1

回答老朋友的询问

刚写完此草稿（后经修改），新加坡几位老朋友忽从“天降”，他们经香港到广州，再转珠海、澳门，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见见久别的老朋友，叙旧、畅述、欢聚，充分表现出老友情深的可贵友谊。

来到珠海，对于这些久别的老朋友，看上去似有些面生，但却心乐。大家已年达古稀，却都神采奕奕、老当益壮，不减当年战斗“政坛”之勇，令人心身感慰。

才安兄夫妇陪同大家畅游广州，和老朋友度过几天愉快的日子，来到珠海，似是有点疲累。但大家都有故亲之感，为了不浪费每一分钟的欢乐，留住酒店，吃饭、游车河，一箩箩的友情往事，

都在同一个时间畅所欲言。

他们只预订在珠海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到澳门，再转香港返回新加坡。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谈话不少，涉及往事更多，提及 50 年代反殖斗争的历史真实，被遗漏、被歪曲、甚至被抹黑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将事情弄个清楚，要将存在的疑问做出澄清和解答明白。把历史的真相重新摆上舞台，让大众从事实中去作出客观的评论。

恰好，我在一个月前从文灵兄的《田流回忆录》读到这段历史，使我思想滚动不已。不实的内容、错误的观点、评述的不公、误导的后果，如果不是特意的描写就是有难言之隐。为此，我着手写了《我有回忆》后改为《人生路短话往事》这篇粗糙的文章，内容是亲身经历、体会、事发起因、过程和结果，着重事实，以自己的观点作评述，正确与否，不加妄论。但肯定地说，这决不是一篇谬误的虚构。

老朋友陈仁贵律师、前工运的杰出人士邱有才、黄炳煌和卢苗萍等一行约十来人聚在一起，相续提出备受同时代所有参与政治活动或关心政治活动的人最关注的 1957 年“奎笼聚会”、“夺权阴谋”而导致 PAP 分裂，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有关这事件的过程，我已将亲身经历部分写在《人生路短话往事》的文章里。但仁贵兄和有才兄提出很多问题，其中不乏非常尖锐的问题。为了回答仁贵兄和有才兄的提问，另写一段答问，作为《人生路短活往事》的新补充。

仁贵兄和有才兄提出的问题，我给予回答，下面就以一“问”

一 “答” 作为我们的对话：

问：“奎笼会议” 是谁组织和召集的？

答：为缓和左派和 PAP 之间的关系，各支部主要成员在花拉柏支部举行座谈会，选出从今、文斗、才安和我同极左派联络。为反殖求共识，化对抗为祥和，补分裂为团结。为此目的，我自告奋勇，挑起组织和召集“奎笼聚会”（不属“奎笼会议”）的工作。

问：“奎笼会议” 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他的背景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

答：“奎笼聚会” 是公开的，参加聚会的 PAP 党员为援救党处于分裂的紧急时刻，约定三位在反殖队伍中起分化作用的极左派人士一起前往“奎笼”，听取 PAP 有代表性党员的意见，并严加阻止他们在统一反殖的活动中盲干。如果他们是马共地下党员，他们不会自认是共产党员，而且是被动地接受我们严正的劝服。由此可见，“奎笼聚会” 的背景不是共产党领导，是 PAP 中宣委和支部要员的聚会，不会有共产党人参加。

共产党早就被禁止公开活动，所有左翼运动，都被指为“亲共”分子或是共产党操纵的外围组织。但这只是一种怀疑，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明。有一点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是时代进步的思想理念，是大多数人所向往和追求的奋斗目标。PAP 也全力以赴地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共产党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前提，并作为进入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和 PAP 所提出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是截然不同的。有人故意混淆是非，把 PAP 的民主社会

主义左派套上“亲共”的帽子，然后一网打尽。

“亲共”不等于共产党，参加“奎笼聚会”的每一个成员都

是 PAP 支部的骨干，只有被称为极左派的三名外来者他们不可能，也不会自认是共产党代表或是领导，充其量只能是在理论上或反殖斗争的口号上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我们并不以为然。党处于存亡关头，我们采取必要的行动，所造成的影响和反效果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我们很告慰，恰恰是“奎笼聚会”使 PAP 免于落在极左派的手里，左翼运动总的来说没有被完全分裂。

问：新加坡马共全权代表方壮壁，曾和李光耀谈述，还在他的回忆录里特别提到“奎笼会议”是与马共无关的，他们搞的那一套马共是不赞成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影响反殖和 PAP 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一双无形的手不断在反殖前进的道路上瞎做指挥，这是谁都可以感觉到的。我们搞的“一套”是不需要谁赞成与否，为顾全大局、为时局需要、为击退一切干扰、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念，正确的事，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还要用实践的行动去做，成功了，我们为国家、人民、PAP 作贡献。失败了，我们问心无愧，历史的误会，也将还我们一个公道。

马共全权代表方壮壁，他是我的老邻居，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是世交的穷朋友，我和他家的弟妹也很熟络。自小他就有一股除强扶弱的心，日治时期，他大约十六、七岁，就用他的勇敢保护住几位澳洲军官免于被日军杀害。日军投降以后，那几位得救的澳洲军

官亲自到他家里道谢，并把日本占据的 BOD 货仓打开，里面所有的战略物资“请方先生任由取去”，可方壮壁无动于衷，谢绝而别。从这件小事，可看出他当时的高尚品德。他在华中运动场上是一位猛将，紧急法令以后，他消声匿迹。不知道他是转入地下，成为后来马共的“全权代表”，若不是李光耀透露，并给他这个名衔，谁也不知道有这一位传神人物。而今，他却对 PAP 支部“奎笼聚会”也妄加评说，证明他是十分关心 PAP 第四届中委选举的始末。说“那一套”，那是贬义；说“无关”完全是正确的，说不赞成，证明“奎笼聚会”是 PAP 中宣委自行组织的活动，不需由外人，尤其是马共来赞成或不赞成。

问：共产党在 PAP 内部起什么作用？

答：无形的影子，只起影响，难有作为，领导一切，力不从心。在英殖民者为政时期，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只能是扩大组织，发挥影响，服从统战的需要。不顾一切，公开暴露自己，任谁也不愿意充当傻瓜。因此，马共在 PAP 内部的作用只是一种隐蔽的作用，影响力不小，但一切的作用只有通过公开活动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

问：李光耀认为“你们早就有夺取 PAP 领导权的野心，但你们不承认，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答：当我们没有机会作解释时，李光耀可以如此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已开始明朗化。“推测”已模糊了许多事实，谁也看不出“夺权者”的“野心”，更看不出“夺权”的实质行动。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强化党内矛盾，突出“夺权”焦点，那是政治

手段，我们对担任中委领导的谦让，最后被迫临危受职，李光耀比谁都清楚。我们早已察觉到李光耀甚少再重复这件事情，但不等于他已改变了这个态度。

“夺权”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的秘密活动，把“奎笼聚会”当作是共产党的秘密活动，那实在是太荒唐了。参加该次“聚会”全是 PAP 各支部的重要成员和两位中委，都为大家所熟悉的。如果不是有人捕风捉影，它只不过是一次简单的野餐会，或是支部的座谈会。没有特别组织、没有所谓“计划”，不存在阴谋、秘密，更谈不上“野心夺权”，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陈志成、钟文灵还有大部分没有被捕的支部成员（包括与该“聚会”完全无关的徐绿娣女士），只要稍作打听，真相就可大白于众目之下。

我们从事政治活动，只为理想而斗争，建立什么社会或什么形态的国家，人民过怎样的生活，那是以后的事。我们只做好本份工作，别无他图，还有什么“野心夺权”，又有什么能量“夺权”？一派胡言，其用心何其险毒也！

问：李光耀提到：第四届中委选举，你们把王永元踢出局，那是有意显示你们的力量可以左右 PAP，你认为有没有道理？

答：我认为王永元出局，第一，和我们无关；第二，是他自己造成的；第三，我们的力量是来自 PAP 中委和各支部的支持，我们对李光耀是采取敬重和支持的态度，有什么理由要用踢王永元出局的方法威胁 PAP！

我们对王永元在党内的表现有意见，但并无恩怨。党员不选他，

把他踢出局任谁也阻挡不了。他的严重缺点：第一，看不起受教育不高的基层干部，把他们视为“无知”；第二，他是党内的财政部长，用钱有计划，但对有求经济支援的支部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引起部分支部不满；第三，发牢骚，指责支部活动与共产党有关。诸多原因，使他在第四届选举中落选。

我们对他的落选，既不反对，也不同情，只有感到可惜。他是党的发起人和第一届中委，是个人才，他的落选是自己造成的。在 PAP 内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必须有亲民的形象，这是起码的条件，王永元先生缺的正是这一点。

问：第四届中委选举之前，PAP 总部发给各支部的“入门券”，有很多在工会的手里，到底是什么原因？

答：任何社会群体组织，除了共产党外，不可能有那么严密。PAP 各支部的党员群众，大部分是来自草根阶层，有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学生、小商、小贩、农民、失业和半失业的劳动者；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负有“特别”任务的人物隐蔽在各支部进行“特殊活动”。这些“入门券”到底落在谁的手里，我们也说不清，一句话，“复杂的政治黑手”所为。但不能小视，它包含着一个扰乱和破坏 PAP 第四届中委选举大会的政治大阴谋。

工会有入门券，不奇怪，PAP 从总部到各支部不是封闭的。总部发下去的文件，有时候也会丢失。入门券被偷或是被冒名拿走，然后交给工会或非党员的其它组织，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只要用显微镜再透视一下，就可略知当中奥秘。但无论如何，

这件事在没有找到真正证据答案之前，胡猜或是推测，都是无理智的，秘密是阴谋的保护者。

问：你们的被捕，是不是和李光耀不做秘书长有关系？

答：李光耀把党内分为非共和“亲共”两个对立性派别后，就隐藏着左翼队伍面临着被镇压的危机。李光耀辞去秘书长职位，部分旧中委也步骤一致，形成温和、激进两派中委各占一半的局面。

“亲共”受到公开的暴露，引来外界无中生有的大事宣传，加速英方和林有福当局提早镇压的良机。由此而论，李光耀辞去秘书长固然引发出社会的不良反应，但镇压阴谋迟早总要发生的。

除了仁贵兄和有才兄提到的那些问题外，还有其他老朋友用不同的口吻试探我对 PAP 执政以后，李光耀在治国方面的看法。

我的回答很简单，PAP 执政以后，拥有控制国家机器的大权，左右分裂以后，李光耀动用国家机器，大肆镇压左派活动，详细情况不甚了解，不便发表任何意见。但可以肯定：这是继我们之后，由于矛盾的激化，掌握绝对权力的一方决不允许另一方向他提出任何挑战，即使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你不说，可放你一马，你要说，把你置于死地，永不翻身，几乎所有统治者就是这样蛮不讲理。

李光耀在治国方面，这里要说包括治民在内，我对李光耀的看法，是从新加坡社会的稳定发展，国际声望的评价以及新加坡人民生活的状况提出个人见解。李光耀无论做错了什么事，历史会给他做出公平的定论，但任何成功的事业，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任何一个统治者，不管他是好是坏，总有他的支持和反对者。重要的是

看他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我们的评价就是从这个基点出发。

新加坡国家发展如何、社会的管理和秩序如何、人民的生活如何、国际的声望如何、国际社会的议论等（涉及到外交关系的灵活应用），从这些问题做出观察和深入了解，就不难得出一个客观的判断。

论述过去，涉及当今，无数事实的发生都有其历史背景。对人物的评述要用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客观细微的分析，不把个人的不满化为政治的偏见。历史人物历史分析，政治行为要看到正负两面的作用 and 影响。用肯定或否定的简单概念不可能透视出事物本身的性质。我们可以原谅一个犯错误的政府，因为我们不会忘记他给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同样的道理，我们会记住一个给人民带来无限幸福的政府，我们决不可能同一个与民为敌的政府说好话，一切要视其性质而定。

上述补充，都是在闲聊中整理出来的，大意如此。

补充 2

护李还是倒李？（2009 年 9 月 20 日）

本文正近完成定稿阶段，突接梁荣锦先生电邀前往新加坡参加其撰写并出版的 PAP 党史发布会，我因忙于厂务一时无暇分身，未能成行，但十分感谢梁先生的邀请。

2000 年，梁先生特来港澳约才安兄和我作一次专访，为纪念 PAP50 周年撰写一本较客观和较全面的党史而向我们了解党第四届中委选举的前因后果。梁先生来意明确，诚切可信，我和才安兄非常乐意接受梁先生的采访，并提供他所需要知道的一些事实，澄清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种种误会，尤其是李光耀秘书长在当时不明情况下对所谓“亲共”左派不由分说地归为一统，全面否定左派中拥李的强大支持者，使许多人对李由抱崇敬的心里变为怨恨的疙瘩。

梁先生说，该书先以英文版面世，可惜我看不懂英文，未能先阅为快。告知数月后会译成中文，并会赠我一本，我正期待能看到一本最具真实党史的不朽之作。

日前接到朋友从新加坡传真一篇联合晚报刊登的新闻，又再重弹陈年旧事的老调，特意为第四届中委选举制造无的放矢的恶意中伤，什么“李光耀感慨当年‘太傻’，左派‘骑劫’党员投票书”。还有奎笼聚会密谋“倒李”等。9 月 9 日，又看到联合早报大篇幅新闻——“一见泯恩仇”，指的是李光耀和过去共事过的“离心”朋友重聚欢叙。从相片上看，李光耀精神奕奕，和蔼可亲的露出笑容和方水双等热情握手和亲切叙谈，重显过去并肩作战的友谊之光。前后两段消息，截然不同的反差如此相距甚远，怎能不叫人怀疑那些暗藏鬼胎的人用心之良苦，把被扭曲的历史责任继续推在李光耀身上。

我不相信，李光耀还会为这些陈年旧事再谈自己的感慨，也不

会相信李光耀会重提有人在背后策划倒李的阴谋。报章登载的是旧闻的渲染和夸大，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

谈到“‘骑劫’党员投票书”一节的新名称，我并不觉奇怪。奇怪的是投票书怎样被“骑劫”，党员又如何心甘情愿的被“骑劫”？为什么投票书一定是左派骑劫？我被视为左派，我没有入场证，更不知道什么“骑劫”投票书，只为党的全局利益着想，在那充满白色恐怖的年代，被视为“亲共”的左派，参选中委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当中选成为事实之后，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向李光耀和所有中委表明心迹，一切以党的利益为依归，恳请李光耀等继续为党的掌舵人，我们没有任何留恋或分享权力的要求。我们被迫挑起党领导核心的重担之后，我们没有向党发出任何指令，默默地去面对一切严重的威胁。

“骑劫”和“夺权”是同义词。不同的是“‘骑劫’党员投票书”即是夺取党员的投票权力。也就是说，将“夺权”一体化。党员的投票权被“骑劫”、被剥夺，投票不是自愿的。这样，就可强化五十年代那荒唐“夺权”的假设。

民主程序的选举制度，党员神圣的一票，投给他所信任的候选人，任谁也没有权力去阻止或被无理剥夺。“骑劫”是不可能的，拉票、劝票，或是贿票则是每个候选人的行为所决定的。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反殖的队伍深得人心。谁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谁就能得到人民信任的一票。宪制斗争的议会竞选如此，党内选举领导人也如此。所谓骑劫，完全是无的放矢。

奎笼聚会“倒李”之说，更是旧瓶换新装。PAP 第四届中委选举之后，“夺权”之诬陷甚嚣尘上，漫天灰暗，有很多人受到模糊。但大多数人不会相信，充其量只有少数人以为有“夺权”之可能，但没有人会相信“夺权”者会打倒李光耀。

李光耀是党的发起人和掌舵人，深得全党的敬重和爱戴。党成立之前，他已为劳苦大众和学生的合理要求发出正义之声；党成立后，他和反殖的同志站在人民一边，共举反英殖民统治的大旗，争取新加坡从自治走向独立，并为实现星马的统一不遗余力。在反殖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政治斗争的深化和形势的转变使李光耀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的主见，但并不影响共事的同志对他的支持和拥护他领导的反殖斗争。当政见分歧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刻，共事的同志更以团结为重，千方百计排除一切干扰，把所有的敌意都化在共同对外的刀刃上。

“倒李”的制造者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李光耀和共事的同志的反殖历史甚缺认识。李光耀对左派“亲共”有戒心，视为是 PAP 的一隐患，与之合作，定受牵累，不与之合作，党亦受损。李光耀抱着这样的心态对待左派“亲共”分子，至与“亲共”正式摊牌之后，他仍坚持党一旦取得执政，必将释放与党有密切关系的党员。他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他竞选中的承诺，赢得各族人民的赞赏。

无论李光耀如何对待左派“亲共”力量，他比谁都明白，这股声势浩大的反殖队伍站在他背后，就是他能迫使英国作出让步的雄厚的政治资本。因此，在反殖斗争的整个历史时期，在英国人还没

有作出让步之前，他和共事的同志即使有纷争，但仍保持着合作的关系。

被称为左派“亲共”的党内同志，除了极少数受到外来反李的煽动之外，绝大多数是拥护和支持李的。表面上看，这些讲华语方言的党内骨干，无私勇猛，坚定不屈，掀起翻山倒海的狂风暴雨，动摇英殖民统治的根基。他们有此能奈，必是和马共有关。英国人煽风点火，李光耀深信不疑。为了嫁祸给马共，就必然要找 PAP 为代罪羔羊。被视为左派“亲共”的同志，必然要首当其冲的受到迫害。

尽管如此，“亲共”的同志从 PAP 成立起到反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不同历史阶段一直认为，李光耀是党核心的最高领导，是我们反殖宪制斗争的一面旗帜。我们不仅要大力支持他，而且要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支持他，我们的行动从来没有改变，事实也得到证明。

李光耀是 PAP 的最高领导，既是我们的同志，同我们并肩作战，也是我们的战友。即使他有什么想法，也是我们的朋友。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是我们的敌人。

敌我关系的分水岭，我们是非常清楚的。英殖民统治和他的追随者以及欺压我们的那些有背景的势力集团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在敌人的队伍中，也有主次轻重之分。英殖民者是罪魁祸首，其追随者却是帮凶，我们和李光耀有共同对敌的目标，我们没有理由不是朋友，更不可能有结怨不解的“长恨歌”。

奎笼聚会成为“倒李”的神活。我是奎笼聚会的推荐人和负责

人，一切责任应该由我承担。背上了黑锅，所有的参与者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自己知，怪谁也不得。我们只能从中得到教训：政治上的善良换来的是人生的悲剧。

奎笼聚会的起因，正是因为一颗善良的心，不忍看到 PAP 被少数极左派肆意干扰和破坏，党处在危机弥漫的包围中，我们不去设法突破这种看不清方向的严重关头，我们怎能自认为是不愧于做一个老党员的资格呢？

奎笼聚会的参与者只是中宣委召集各支部重要成员自己报名参加，没有报名也可以临时加入。聚会除了约定三名被认为对 PAP 诸多发难的党外极左派之外，参加者多是李光耀认识的支部重要成员，甚至是亲信。

聚会主要内容是联络感情，欢乐畅叙，借此聚会讨论如何制止当时一股反 PAP 的不正之风。我们非常严肃地为李光耀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反殖的一些有争论性的言论作辩护；我们坚决反对借与李光耀有政见分歧的矛盾进行分裂和打击 PAP，影响和动摇李光耀在党的领导地位和威信；我们反对那些企图另起炉灶成立新政党的窃党阴谋；我们为党反殖的统一团结与极左派分庭抗礼，坚决拒绝他们插手 PAP 第四届中委选举；最后我们免为其难地被推出作为第四届中委选举的候选人，身不由己地为党的统一团结和反殖重任挑起重担。一切怀疑这场解困党危机的光明磊落的聚会是为夺权密谋的倒李行动，那是怀有目的的诬陷和恶毒挑拨离间我们和李光耀的团结关系。

必须再三强调：奎笼聚会参与者的支部重要成员和原中委陈从今、吴文斗同志全是护李的主要骨干。极左派的倒李阴谋被击退以后，第四届中委选举当天出现的不正常场面，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代表英国利益的林有福当局和那些投机政客利用极左派的无知和愚蠢向 PAP 放射暗箭最成功的收获。我们因为在党内的左派身份，毫无疑问地被暗箭射中，成为最无辜的牺牲者。

奎笼聚会没有错，团结护李反殖没有错，击退倒李的极左派没有错，敢挑重担作出牺牲也不错。错在我们事先没有把情况告知李光耀，使他先入为主地相信了一些人的谗言，加重了对我们的误会。

事已过往，一切烟消云散。留下的事迹，仍在记忆之中，还有人心怀叵测地旧调重弹，我不得不作出一些补充的说明和回复那些不实之旧事。评述事件真相的来龙去脉，已在前文多有所涉。空白的短暂史篇已作了交待，一切是非对错，邪正善恶，历史必有公断。

《全文完》